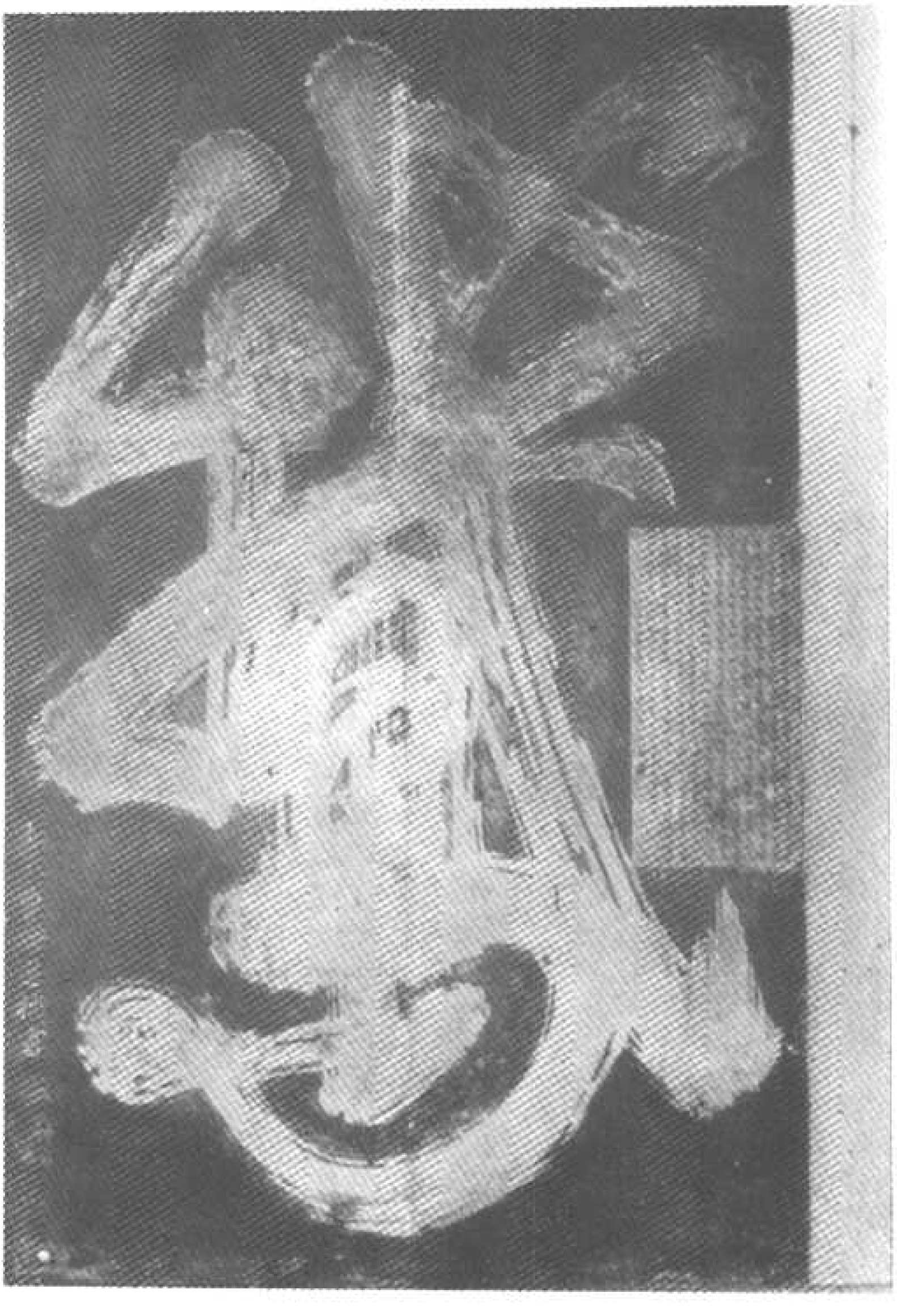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碑石文化的缘起及与之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介绍了历代有名的形形色色碑石，蔚为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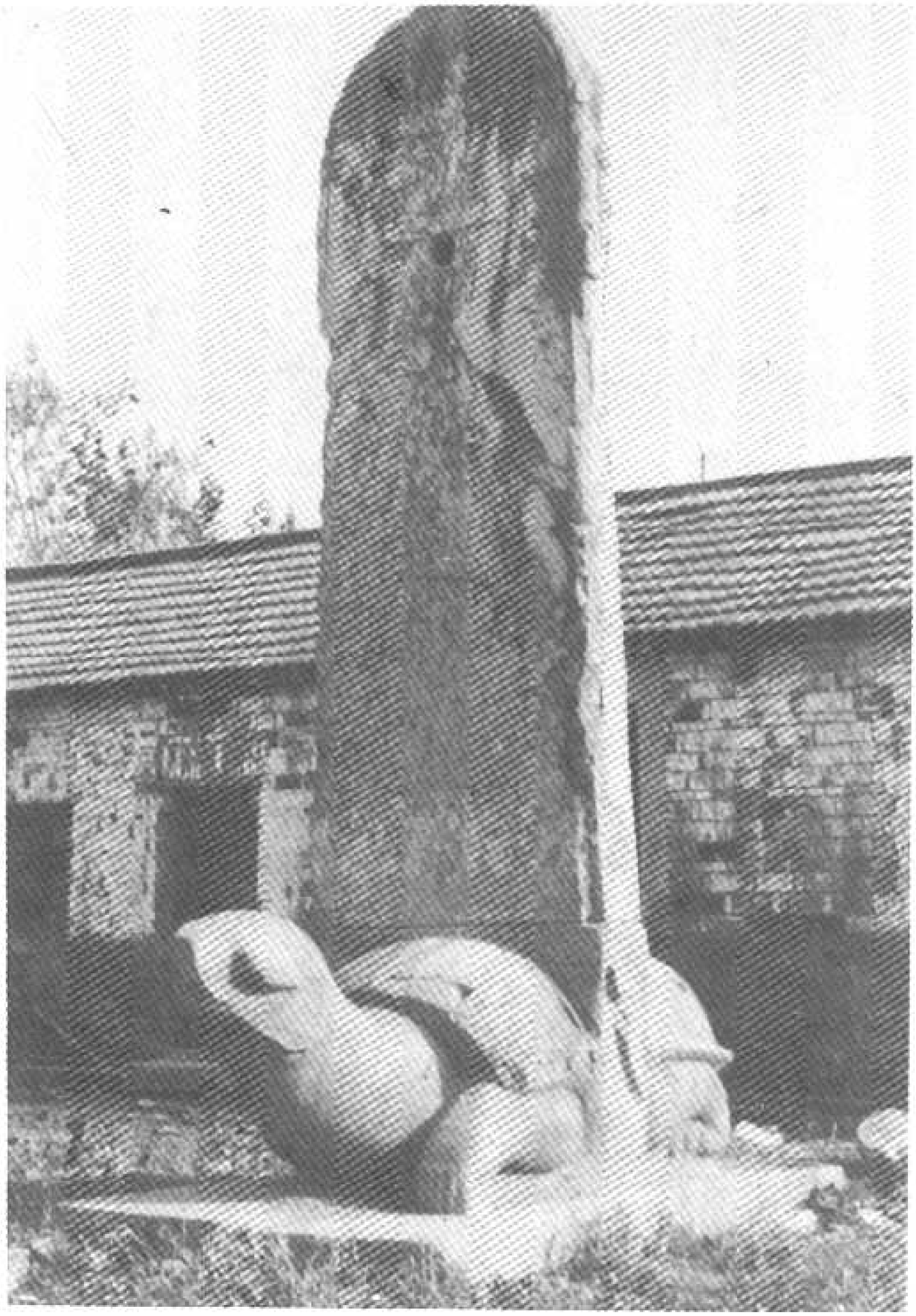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
编委会

主编：陶思炎

编委：萧　兵　叶舒宪　周　星
何　勇　万书元　姚宝瑄



晋・王羲之“鹅”字碑



梁・蕭白英墓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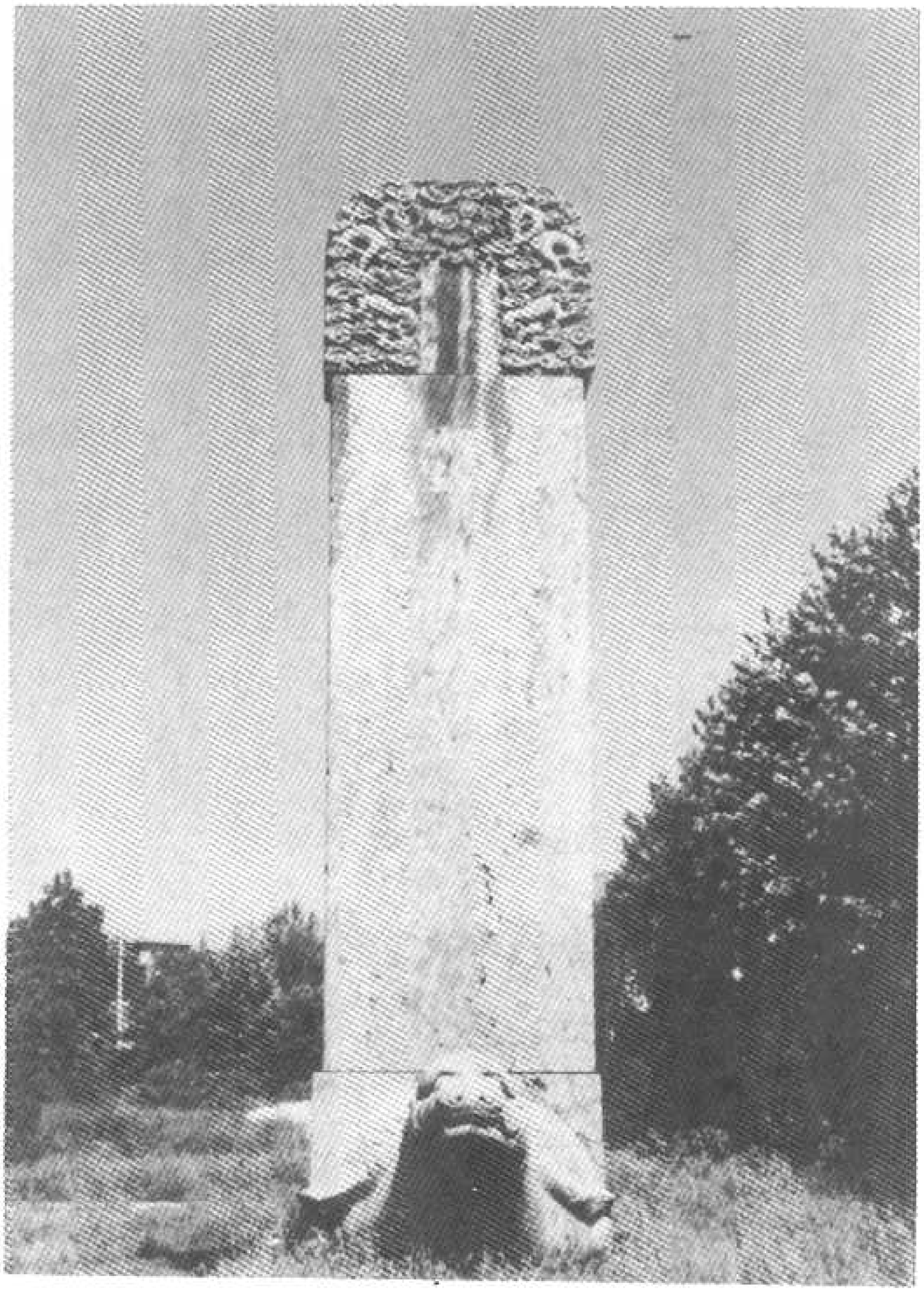
梁武帝为莫愁女写的德碑

北魏·张玄墓志

唐・乾陵无字碑

宋・墓志拓本

明・蔚氏墓志盖拓片



明・中山王徐达碑

总　序

民间文化是一方丰饶绚丽的园田，人类文化艺术史上一切引以自豪的奇葩、巨树，大多根植于它的沃土，并因其内蕴丰厚、基础深广而葆有无尽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

民间文化是集体的创造，是民族的或地方的生活传统的组成部分，它全面展现在物质的、社会的与精神的层面上，满足着人们的各种实际需要。这些需要不仅体现了文化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导向新的追求，推动了新文化的创造。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民间文化正是伴随着民间生活的需要而发展的，由于生活本身的不断更新及其与上层文化间永不停息的交互作用，故而不断产生着新的形态，并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类型体系。

民间文化是在一定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具有突出的社群性、功用性和传承性的特点。所谓"社群性"，即指民间文化依存于一定的人群，并以集体的认同与习得为存在的前提。所谓"功用性"，即一切民间文化事象都有其内在的功能，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着人们的需要，只要它还见存留，总有其实际的作用，绝不存在毫无功用的文化事象。所谓"传承性"，即民间文化作为集体的创造，已融入了民间的生活，并作为"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具有易于传习的共性，其中既有共时性的因素，又有历时性的成分。

民间文化究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工具，即在主客体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所谓"主体"，指创造并享用文化的人类；所谓"客体"，指被人类改造的自然、人类的社会群体以及人的自我精神，它们之间的沟通需借助文化的手段，或者说文化消除了它们的隔

膜，使人类在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精神的“对立”中找到了和谐。民间文化正是具备了这一“和谐”才现露出醇厚的韵味。

民间文化的范围广泛，它包括民间风俗、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技、民间组织、民间宗教、民间文学，以及其他民间知识等。我国学术界多以“民俗学”的学科概念统领民间文化，其范畴常常超出“风俗”之外。近年来，我国民俗学界泰斗、恩师钟敬文教授曾多次提出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的名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

由于民间文化多以象征的、类比的、联感的方式，透过外显的符号系统传导潜隐的功能意义，因此其事象虽多浅近，却又有不少奇奥难解之处。其中，某些源于远古的神秘物象与事象虽至今仍略可见，但因其潜含的心象或意象的淡化与变易，其真义变得更其隐秘和模糊。这样，人们对身边的民间文化事象虽可感而见之或习而行之，却难明所以，周身缠满了莫解的谜团。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的编纂，就是要对人们熟视无睹或莫知其详的民间文化现象作出源流或隐义的揭示，既揭谜破译，又阐释解析，以展现中国民间文化的丰厚精深及其无穷魅力的奥秘，同时普及民间文化知识，唤起人们对自身生活的关注与理解。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由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内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分头撰写，首批推出《风俗探幽》、《祥物探幽》、《碑石探幽》和《神话探幽》。本丛书以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主旨，以普及中国民间文化知识为追求，在选题上注意从专题入手，在写法上则注意从具体问题落笔，以求单刀直入地对问题作出深入浅出的探析，从而服务于全社会的广大读者。

中国民间文化既是一方绚丽的园田，又是一座尚未充分发掘的宝库，它不仅具有认知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同时也能加以开发、应用，使之为当代生活增色、添彩。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和热心的人们来到中国民间文化的神奇宝地，

一同来探幽寻胜，并在这百花吐艳的园田中洒下辛勤的汗水。

陶思炎

1995 年 1 月

于三通书屋

目　　录

绪　论

形制篇

碑型探原（15）　墓志（17）　巨碑（20）　袖珍碑（24）　卧碑（26）　四面碑（30）　双色碑（33）　石刻文字（34）　毁碑（37）　碑林热（40）　现代碑石（44）

风土篇

官箴碑（49）　法典碑（52）　路规碑（54）　水则碑（57）　学规碑（59）　界碑（62）　环保碑（64）　养生碑（66）　告示碑（69）　药方碑（71）　教坊碑（73）　石经碑（75）　计时碑（77）　画像碑（79）　植物碑（83）　戒碑（86）　记灾碑（88）　巨字碑（90）

人物篇

音乐家纪念碑（95）　尊师碑（97）　爱情碑（99）　感恩碑（101）　海外华人碑（103）　异国使节碑（106）　埋入地下的墓碑（108）　供奉在家的墓碑（111）　遗嘱碑（113）　豫让碑（115）　记错碑（117）　记罪碑（119）　虚假碑（123）　墨碑（126）　耻辱碑（128）

奇珍篇

改革感恩碑（131）　无字碑（133）　书法碑（138）　证史

碑（142）　奇字碑（145）　诗碑（148）　“丘八”碑（151）　对话碑（153）　三绝碑（155）　一字碑（157）　集字碑（159）　图碑（161）　有句读的碑（164）　化石碑（166）　雾碑（167）　动物纪念碑（169）

后　记

绪　论

中国碑石文化

沈利华

“碑者，悲也”。近世所谓的碑，主要是指墓碑和追颂先贤功德的纪念性刻石。其实，最早的碑是极其简单的，其原始意义不过是先人特意树立的石条而已。《说文》石部“碑，竖石也。”其上并没有刻字，用途也与后世的碑石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先对碑石的源起作一简单的考察。

《仪礼·聘礼》：“上当碑南陈。”郑玄注云：“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从中可知，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宫室及宗庙的庭院中都竖有这样的石柱、石条。其用途一是用来观察日影，推断时间；二又可用来拴系东西，在宗庙里用来牵拴祭祀的牲畜，以便宰杀时取下毛和血去献尸。《礼记·祭义》中载有系牲于碑的礼仪：“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丽”通“俪”，即拴系。君主亲自牵着祭祀用的牛羊牲畜，进了宗庙门以后，就随手把它系在院中的石柱上。此外，当时贵族殡葬时，因墓穴较深，在墓坑边上竖立一些木桩，下棺的时候，用绳索将棺椁的四端系结在桩上慢慢放下。这种木桩古称为“丰碑”，其为木制。《礼记·檀弓下》郑玄注云：“丰碑，凿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绠绕。”可见，所谓丰碑，其最初的形制不过是墓穴边上所竖的木桩，作用为牵引棺椁以便稳稳地放入墓穴。当时，这木桩的数量也有严格规定，以示地位、等级的不同：

“天子六绤四碑，诸侯四绤二碑，大夫二绤二碑，士二绤无碑。”殡葬结束，有的丰碑也就留在墓地，当时的人或后人就在上面顺便刻写一些有关的文字，作为冢墓的标识。如今存东汉《左元异墓石》上刻有“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的字样。其质料也逐渐以石代木，成为真正的“丰碑”，后世又称为神道碑。正因其最初是用来悬棺下墓，所以，直到东汉，墓碑的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称为“穿”，并刻有数道阴纹贯通于“穿眼”，“尚存古制引绋之意”（王惕甫《碑版广例》）。如今曲阜孔庙碑林中，有一块东汉的《孔谦碑》，形制就与其它古碑不同，碑的中上部有一个圆孔。赵翼《陔余丛考》“碑表”中解释说：“古碑皆有圆孔，汉去古未远，就有丰碑之遗像。”

由上述可知，最初的“碑”，形制不一，材质有别，其作用大致有三种：“一是立在宫中，用来标志日影，推算时间；二是立在宗庙，用来拴系祭祀用的牲畜；三是立在墓地，用来悬棺入墓。第一种碑后世逐渐发展成为“日晷”，即一种借助日影来记录时间的标识仪器。第二、三种碑，后世人们就在其上顺便刻写一些记载宗庙世系、追述死者功德的文字，逐渐演变为后世习见的庙碑、墓碑。龚自珍《说碑》云：“庙有碑，系牲拴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为窆也，刻文字，非古也。”清楚地说明了庙碑、墓碑的由来。

在墓碑上刊刻赞颂文字，纪述墓主生平事迹，替墓主树碑立传的习俗，大概产生于两汉时期。其实，早在先秦时就有刻石纪事铭功的做法，但其时人们并不称之为碑。目前，我国发现最古老的有字刻石是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墓中的石磬，上面刻有大篆 16 字：“天子匽喜，龔趄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鼎。”另外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时的石鼓。“石鼓文”即因字刻在高与直径

约二尺[1]的10个鼓形石上而得名的。字体为籀文，四字，记载了周宣王游猎之事。到了秦朝，秦始皇东巡，好大喜功，刻石颇多，有《峄山》、《泰山》、《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文字皆为李斯所书，内容则多为歌功颂德的赞辞。自从墓碑刻文兴起以后，这类刻石也都统称为“碑”，形制虽有不同，但其内容倒也与碑辞相似。

两汉时期，树碑立传以求不朽的风气渐开。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汉碑中，比较著名的有1957年在陕西兴平县窦马乡西汉大将霍去病墓前发掘的二碑，在山东省平度县出土的东汉光武六年的《王舍人碑》等。在汉碑中，东汉碑较常见，西汉碑则极为罕见。个中原因，除西汉时风气渐开，刊刻较少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位以后，因他恶称汉德，将西汉所立之碑皆令人拉倒，并将碑文铲除干净，使得西汉碑毁坏殆尽。

进入东汉，由于书学之昌盛和铁制工具的普及，顺帝以后，树碑之风盛行。祝嘉《书学史》云：“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章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可见当时盛况。东汉初年，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发明了水力鼓风机，这对冶炼技术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此时冶铁已开始用煤作燃料，并掌握了层叠铸造技术。因此东汉时期铁制用具普遍应用到人民生活各个方面，为碑碣的大量制作提供了物质工具。再加上东汉时谶讳迷信之风广为流行，也对碑碣的制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上层贵族十分重视上冢礼俗，讲究坟墓的建筑、碑碣的雕琢。风气所尚，不仅达官贵人死后须树碑立传，即使百姓庶民也立碑，甚至连孩童死后也不例外，如《蔡邕集》中就有一篇《童幼胡根碑》。所以在《隶释》等记录古代碑刻资料的书中，载有大量东汉墓碑刻文。东汉墓碑的形制也一变西汉的素朴而趋于华美，不仅

---

① 按现在计量标准，一丈＝3.33米，一尺＝0.33米，一寸＝0.033米。但古代计量单位丈、尺、寸，各朝标准不一，请根据当时计量标准换算。

遍体打磨得十分光滑平整，而且碑首和碑体的四周都布满了阴刻和浮雕花纹。

虽然东汉的墓碑多于西汉，形制也更为成熟美观，但并不因此可以断定墓碑始于东汉。欧阳修《集古录》云："至后汉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朱剑心《金石学》中亦云："冢墓之碑，始于后汉，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二人的看法都是失之偏颇的。

东汉以后，碑的作用已发展为纯粹的叙功述德、记载世事借以传世，所以原先碑上实用的圆孔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于是便从石碑上逐渐消失了。后世的石碑，一方面日益讲究碑文的内容和文采，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对碑身碑座的美化修饰，成为集文学、书法及雕刻造型艺术于一体的古代艺术珍品。碑石文化也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门类，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

碑大都是由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碑的上端称为碑首，也称为碑额，其形制有尖形、半圆形和方形。尖形的又称为"圭首"，半圆形的也称为"晕首"，雕以龙纹的又称为"螭首"。碑首形状的不同，碑的称呼也有别。一般碑首方形的称为"碑"，圆形的称为"碣"，也有将尖形的称为"笏头碣"的。《后汉书·窦宪传》中班固《登燕然山铭》："封神丘兮建隆崛。"注云："方者谓之碑，员（圆）者谓之碣。崛亦石碣也。"《隶释》中著录汉延熹时《江原长进德碣》，称其碣上窄下宽，顶方平。后世一般将"碑"与"碣"连称，呼之为"碑碣"。碑额上除刻纹饰外，一般都有碑题，字体为篆书的称为"篆额"，字体为隶书的称为"隶额"，此外，后世也有以楷书、行书作碑题的。专为纪事铭功、歌功颂德而立的碑，还有在碑首之上加以屋形盖的。一般的墓碑则无之。

碑身多为长方形，高六尺左右的石块。正面刻有碑的正文，反面一般刻立石之人的姓名，也有刻与墓主有关的文字的，如东汉延熹三年的《费亭侯曹腾碑》，其阴面则刻有与墓主有关的诏策二

道。碑身的形制也有特别的。如今存西安碑林的唐《石台孝经》，其碑身近方形，四面都刻经文。这样的碑一般不作墓碑，专用于纪事刻经。刻碑的方法，在唐代以前，多由书者以红色直接书写于碑上，再行刻石，称为书丹。唐宋以后则改为先书于纸上，再勾勒上石，最后再行刻石。碑上刻写书碑者的姓名，现在所见最初为东汉延熹八年《华山庙碑》，其时多为书佐、小吏所写。至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常亲书碑文，并常降敕旨，命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与显者书写碑文，开风气之先。自后，书碑者多为高官显爵和著名书法家。碑石也使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得以保存，碑刻文字的拓本——碑帖，也成为后世习字者的范本。

碑座的形制有方形和龟趺等。方形的碑座汉代尚无花纹，南北朝时，在碑座上雕刻绕花纹饰，后世沿袭，渐成制度。同时出现的“螭首龟趺”的碑式，也为后世墓碑的常式。明清时，龟趺的头部雕得似龙非龙，称为“赑屃”或“霸下”。传说“赑屃”为龙属，是龙的儿子，因不成龙形，又好负重，故用作碑座。明杨慎《升庵外集》称：“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龟下趺是也。”

墓碑的形制自其产生之初就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不同的社会等级在碑碣的题字、碑的形式、尺寸、纹饰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不可逾越。如唐代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死后方可立螭首龟趺碑，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官可立圭首方趺碑，高为四尺。（见《通典》）“若隐纶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见《唐会要》）明代规定，墓碑一品以上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禄辟邪首，七品以上圆首。所有墓碑碑座都用龟趺而尺寸有高低之别。（《明会要》）再如清代对墓碑上的题字也有规定：“品官墓碑书某官某公之墓，妇人则书某封某氏。八、九品以下及庶士碑文曰某官某之墓，无官则书庶士某之墓，妇称某封氏，无封则称某氏。”（《清通礼·凶礼》）

与墓碑相似的碑石还有墓志，是放在墓中刻有死者生平、传

记的石刻，亦称“圹志”或“葬志”。其起源说法不一，有源于春秋、西汉、魏晋及南北朝诸说。现存较早标明墓志的有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墓志的形制最初并无固定的形式，多为方形，也有上圆下方，象征天地的。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渐成定制。一般是由两块大小尺寸相同的正方形石板组成。上石叫“志盖”，下石称“志底”。前者刻有死者的姓氏、籍贯、官衔及生卒年月等，其文多为散文，称为“志”；后者刻死者生平事迹。其文为韵文，称为“铭”，多为对死者的赞颂、悼念或安慰之词，与碑文相似。所不同的是，墓志藏在墓内，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因此，志文涉及死者的“隐私”就较多。如明代作家张岱的墓志中就载有他生前嫖妓、赌博的劣迹。北周庾信、北宋的欧阳修等均是擅长撰写这种文体的大家。古代，有身份地位的达官贵人常在死前即延请名人为之作志铭。而一般百姓则在砖上刻写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等。墓志一般都放在圹中柩前，也有埋在墓侧或墓前的。墓志入土要鸣放鞭炮，焚化纸钱，与立碑一样，也须举行一定的仪式。

在墓道上树立的石牌，称为墓表、华表，也叫神道表或神道碑，作为坟墓的标识，也是碑石的一种。《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云：“墓前于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太平御览》“华表”条载有“燕昭王墓前华表”。华表的标识作用既和墓碑相似，又有一定区别。墓碑是墓冢的标志，华表则主要标识墓道。汉以前，墓前的华表与丰碑一样，也为木制。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载：“昭王墓前华表已千年，使人伐之。”可知战国时燕昭王墓前的华表至南北朝时尚存，被当时人砍伐而毁。这种木制标识性建筑物当时又称为“橦”，到东汉时，墓前的华表都为石制了。其形制以方石为基座，上竖圆形石柱，周围雕有瓜棱形直纹，柱顶有方石，称为“石榜”。《碑版广例》卷九载：“墓表与神道碑异名同物，故墓表之有铭者亦多。”如北周庾信《庾子山集》中有《周大将军崔悦神道碑》，宋欧阳修《泷冈阡表》等，都属墓表上

的铭文。墓表石榜之上还饰有比柱围稍大的石盖和立兽。立兽一般为“辟邪”，是传说中祈祥去邪的吉祥神兽。如今天安门前两个华表的顶端，就各有一个蹲坐的“辟邪”。南北朝时，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顶端建有小型石屋和佛龛，如北齐义慈惠石柱华表即如此。宋代曾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为仙鹤归来，降于辽东华表上作歌的神话传说，因此有些华表顶端又以仙鹤为饰，如《清明上河图》中的华表即如此。明清之际，华表则主要用于宫殿、帝陵等重要建筑物前，而不用于一般墓道。

此外，古代坟墓，特别是帝王贵族官僚的墓地上往往都有许多陵墓石刻。这些石刻栩栩如生，有着特定时代的艺术特征，为碑石文化中一个珍贵的艺术门类，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历史极好的资料。现存最古的陵墓石刻群为西汉大将霍去病墓前的一组大型石刻组雕，有卧马、跃马、卧象、伏虎及“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等。这组石雕运用循石造型的手法雕成，主题鲜明，风格古朴，气势雄大，是西汉时期石雕艺术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后列三组石刻最为生动有力。“怪兽食羊”，表现一只怪兽正把羊吞下，羊在兽口中的痛苦之状。“力士抱熊”，描写一个力大无比的武士正与熊在博斗，武士紧紧把熊抱住，熊拼命挣扎。“马踏匈奴”则刻划一匹战马正猛力用脚踏住一个仰面跌倒的匈奴士兵，表现的是霍去病生前战胜匈奴的赫赫战功。此外，登封中岳庙前及曲阜汉乐安太守墓前的石翁仲，四川灌县出土的李冰石像、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翼首、洛阳伊川及咸阳沈家村出土的石辟邪，都呈现豪迈挺拔的格调，标志着雕刻技艺的日益成熟。

与墓碑一样，陵墓石刻发展到后代也逐渐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了。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大臣墓前则有石羊、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墓如生前仪卫耳。”墓前石刻就象死者生前仪仗一样，成为等级差别、地位高低、身份贵贱的表征了。一般来说，汉代陵墓石刻区分并不明显，帝王陵前有石象，大臣墓前则

主要有骆驼、狮、虎、牛、马、羊之属及辟邪、天禄等。唐代帝陵与大臣墓前的石刻群则有严格区别。大臣墓前石刻以石羊、石虎为主，而帝陵前则有石柱、飞马、石象等，没有石羊、石虎。宋代帝陵的石刻又与唐代不同，以石马、石羊、石虎为主。《宋会要》中载帝陵石刻群为“南神门外宫人二，文武官各二，石羊、石虎各四，石马各二并有控马者，望柱石二。”明代陵墓石刻则去掉了宋陵中的石羊、石虎，改为较大的动物和神兽。如南京明孝陵计有狮、独角兽、骆驼、象、麒麟、马 6 种，共 12 对，6 对为立像，6 对为卧像，并取消了宋陵中的控马者。石人则为文臣、武臣 4 对，均为立像。清陵基本上沿袭明陵的制度。这些陵墓石刻，特别是其中的动物雕刻，造型真实，表现手法单纯有力，具有整体的完整性，反映了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时代面貌，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上面我们考察了与墓有关的碑石的起源、种类及形制，介绍了相关的文化知识。这些是我国碑石文化的主体。此外，刻于山石上的摩崖、题名和佛经，包括造像记及井名等，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碑刻。商务印书馆 1957 年重印杨殿珣编写的《石刻题跋索引》将碑刻概括为七个方面，即：墓碑（包括碑碣石、墓幢、塔铭、记德碑）、墓志、刻经（包括石经、经幢）、造像（包括画像）、题名、题字（包括题名碑、神位题字、食堂题字、石人题字、石盆题字）、诗词、杂刻（包括砖瓦、法帖）。与墓相关的碑石其实用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死者、纪功述德；摩崖是纪念同自然作斗争的艰巨修建工程；题名是记游踪，留芳名；造像主要有关佛教，为死者或生者祈福等。碑石是我国最伟大、最丰富的艺术宝藏之一。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延续而未有中断，这与自周朝之后作为历史文化物证的碑刻不无关系。“石可破也，不能　其坚；丹可磨也，不能夺其赤。”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词《沁园春·咏石》云：“白玉一方，晶莹无比，圆润生光。岂怡红公子，命根难系，梁山好汉，天道难行。狂风不移，烈火难化，石中迸

出美猴王。传千古，掘出几多宝，龙门云冈。莫笑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任离合悲欢，不动声色；嘻笑怒骂，皆是文章。上补青天，下填沧海，粉身碎骨自刚强。了此愿，永不枉此生，非梦一场。”这都说明石是坚硬的。而刻在石上的东西，只要保护完好，便可永久保存。可以说，碑石是保存我国文明史的功臣。从周、秦起，以迄于今，碑刻艺术一直延续不衰。周朝石鼓文、秦刻石、瘗鹤铭及西安、曲阜、昭陵三大石刻等闻名于世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永以为宝。

下面，我们再就碑石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书法艺术价值及我国古代对碑石的收集、研究等方面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而碑石是保存书法艺术最好的方法之一。我国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字迹，主要有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其中石鼓文就是刻在鼓形石上的籀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10件，分刻着10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是记述古代国君游猎之事。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出土。石鼓文的书体，属大篆的体系，其书法价值自出土后即受重视，唐代的著名诗人、书家都对它推崇备致。韩愈《石鼓歌》中把石鼓文比作“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立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以后历代的学者、书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如苏轼《石鼓歌》云：“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毂辖。”意谓文字的创造者，黄帝时的仓颉都得对它表示尊重，著名书家李斯、李阳冰也都是石鼓文的学生。黄庭坚认为“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臆作。”康有为也说：“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踌躇满志，巡狩天下。巡狩到哪，就在哪儿刻石。秦朝的刻石计有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等6处，上面的文字都为李斯所写。李斯善写篆书，他所写的小篆号为“玉筋篆”，“婉转而通”。自此，小篆作为一种独立的书

体成为后世模仿的正宗。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汉隶则是汉代书法艺术特有的成就。它上承秦篆，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楷书，也是草书的基础，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财富。汉隶能流传后世，主要靠石刻。汉石刻的极盛期是东汉顺帝以后，桓、灵之际，其时，汉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且树碑立传之风大盛，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桓、灵两代，产生了大量名碑。有的结体精致，如《华山碑》、《史晨碑》；有的神韵超逸，如《乙瑛碑》、《曹全碑》；有的厚重丰茂，如《礼器碑》、《校官碑》；有的道劲高古，如《夏承碑》、《张迁碑》；有的奇纵多姿，如《石门颂碑》、《杨淮表记》。东汉末年的蔡邕，隶书造诣极高。汉灵帝时，他将六经书丹于碑，使工镌刻，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碑成以后，前往观摹者络绎不绝，有时每天多达千余辆车乘。这些碑刻风格多样，结体运笔富有变化，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南北朝的书法，主要以魏碑为代表。魏碑指北魏的石刻，由于北魏享国约150年，时间较长，再加孝文帝拓跋宏笃好文艺，书学兴盛。所以北魏时期的碑最多，其书法造诣也极高，所谓“隶楷错变，无体不备。”

《广艺舟双楫》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十三宗”。“十美”是：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十三宗”是：《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吊比干文》为瘦硬峻拔之宗，《隽修罗》、《灵塔铭》辅之（以上为宗上）；《张猛龙》为正体变态之宗，《贾思伯》、《杨翠》辅之；《始兴王碑》为峻美严整之宗，《李仲璇》辅之；《敬显儁》为静穆茂密之宗，《朱君山》、《龙藏寺》辅之；《晖福寺》为丰厚茂密之宗，《穆子容》、《梁石阙》、《温泉颂》辅之（以上为宗中）；《张玄》为质峻偏宕之宗，《马鸣寺》辅之；《高植》为浑劲质拙之宗，《王偃》、《王僧》、《臧质》辅

之；《李超》为体骨峻美之宗，《解伯达》、《皇甫鳞》辅之；《杨大眼》为峻健丰伟之宗，《魏灵藏》、《广川王》、《曹子健》辅之；《刁遵》为虚和圆静之宗，《高湛》、《刘懿》辅之；《吴平忠侯神道》为平整坤净之宗，《苏慈》、《舍利塔》辅之（以上为宗下）。著名书法家康有为认为欣赏这些名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这些石刻都是“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法也极为兴盛。唐代的碑刻，统称唐碑。唐碑数量之多，可谓浩如瀚海。名碑迭出，与汉碑、魏碑相比，毫不逊色。所不同者，唐以前碑石的书者多为书佐、小吏所为，默而无名。至唐，各种书体都有了名家，名家书碑，遂成时尚。如虞世南书的《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欧阳询书《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褚遂良书《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房玄龄碑》；李邕书《李思训碑》、《麓山寺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争座位帖》、《颜氏家庙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张旭书《郎官石记序》；李阳冰书《栖先茔记碑》、《谦卦碑》等。唐碑与魏碑一样，同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学书者临摹的楷范。

宋以后，帖学兴盛，名碑渐少，但碑刻艺术延续不衰，如《淳化阁贴》等。主要是为了保存和传播书法艺术，才将真迹上石，翻刻古人手迹，讲究刻工精妙。

碑刻文字，不仅使我国璀璨的书法艺术得以保存，而且也记录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可以作为订正古籍和传说的有力证据。自隋唐以来，人们便用它作为考证古史的资料。至宋代则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金石学。宋代大史学家欧阳修，平时酷爱石刻，家有大量收藏。他在刘敞《先秦古器记》的基础上，编成《集古录》一书，通过对大量商周铜器铭文及秦汉隋唐碑刻的考释，与文献史料互相印证补充，把一些

结论引用到史著中，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天地。此外，郑樵的《石鼓文考》，专门考证石鼓文；洪适《隶释》、《隶续》则专录碑刻，具载全文，并附考释，使许多名碑古石得以保存，流传后世。

清代许多学者、金石家对石刻碑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著作迭出，研究专题也日益深细。史学家十分重视从石刻碑志中发掘新的史料。如清初大史学家顾炎武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朱彝尊《曝书亭集》中著录许多金石文字跋尾；万斯同也著有《石经考》等。他们对汉、魏、唐、五代的石经、碑刻进行了详细考论。清中叶以后，更出现了两部大著作，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专门实地考察了存世石刻并予以著录。王昶《金石萃编》著录碑刻原文并考订碑刻文字。以后又有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特别是金石大家叶昌炽《语石》，收集古代碑刻最为完备，且对于石刻的种类、地理分布、传拓方法、书写款识及撰写碑文的作者都有论列。清末方若的《校碑随笔》，内容起于周秦，讫于五代，根据石刻泐损的情况，考订拓本的先后，指出翻刻与原刻的区别，为碑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金石学成为考古学的前身，对于改变我国传统史学研究方向，作出重大史学研究成就打下了基础。

碑刻艺术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绵延不绝，成为集书法、绘画、雕塑于一体的艺术精品，同时还积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灿烂持久的碑石文化，在中华文明的缔造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保存、研究、发展这一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形　制　篇

碑型探原

谈到石碑，人们必然先要联想到它的形体。通常我们见到的石碑和家庭佛龛里供奉的木质祖宗牌位相同，都是长方形，左右切角，下有座体。为什么碑石惯用这种形状？而不是球形，或是其它形状？要解释这个谜，还得先从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现象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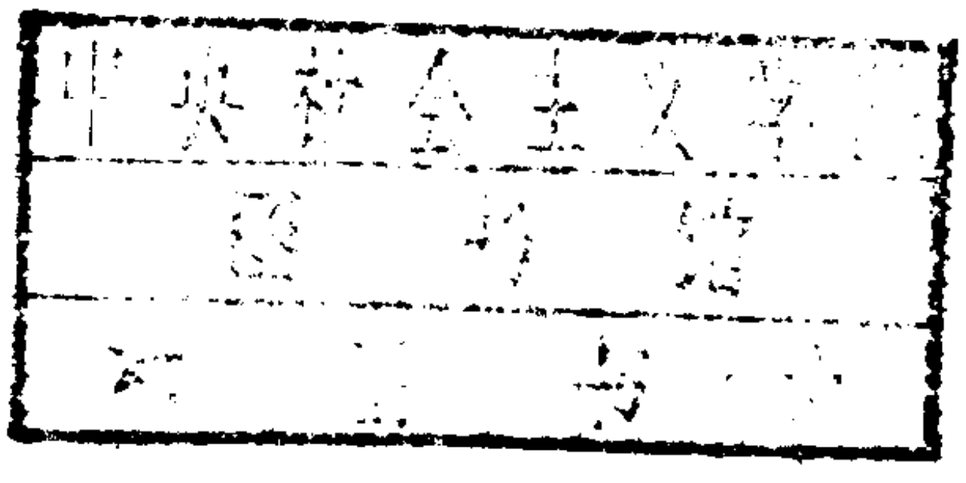
原始人在大自然中过着裸身生活，他们不可能亦无条件缝衣制裙，所以，暴露自己的身体，非但不是耻辱，相反，还会用树叶等美化自己的生殖器官，使之更加醒目。按照社会发展历史，原始人类都经历过生殖器崇拜阶段。在母系氏族社会，即在距今大约 6000 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以前，那时最为崇拜女性生殖器。中国古代祭神的祭坛称之为“社”。“社”是建在露天场所的一个方坛，社坛上有以土堆起的一个高冢，或设置作为社神象征的神石——“石主”。这些高冢和石主即是女性——地母乳房的象征。“礻”，甲骨文中写成象征女阴的“七”字，因此，“社”字代表着女性。女性生育，繁殖后代，犹如土地上长出庄稼，所以，“社”成为土地之神。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夏商周三代，祭祀“社神”是最重要的项目。据有关文献记载：每年社神日，男女拜过社神后，女子均坐神坛，受男子下跪敬拜，并献鲜花于女子阴部。之所以如此，其深层原因，追根寻源，都是古代人崇拜女性生殖器的文化因子代代相袭的结果。

仰韶文化时期以后，距今大约 5000 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母系氏族部落，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进入龙山文化时期，母权制逐步过渡为父权制。从此，人类开始由崇拜女性生殖器官转变为崇拜男性生殖器官。汉字“祖”字最能反

映这一现象。据《礼记·檀弓》云："祖者且也。"也就是说，"祖"字来源于"且"字。甲骨文中的"祖"字实质上是人揖拜于"且"的象形字。而"且"字，古文作"𠦂"，篆文作"且"，均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形。1986年7月28日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的一根由青石磨制而成的石祖，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该物呈圆柱状，长19厘米，粗径6.5厘米，顶端圆，底部稍粗，中柱稍细（直径4厘米）。如果将它刻画成图像或写成象形文字，正好同甲骨文的"且"和金文的"且"相一致，这大概是现在已知的距今最早的"祖"字初文原始造型实物。它又表明：石祖的出现是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由此可见，敬"祖"即是一种崇拜男性生殖器官的潜意识的表现，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解体和父系氏族社会形成时期。这也就破译了石碑、祖宗木牌位为何是长方形之谜：原来它们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形，均源于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

说一点题外话。除石碑而外，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宝塔、石柱等，无一不是表现了勃起的阴茎，无一不是崇拜男性生殖器官留下的文化遗迹。这里应强调的是崇拜生殖器虽然是一种遍及世界各原始氏族的现象，但以东方文化为最。正如黑格尔所言："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也就可以解释印度、中国、泰国、缅甸等国为什么多塔多碑这一现象了。西方无塔。英国在17世纪曾模拟东方造了一座塔，谁知却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东方塔的层数均为单数，单数一、三、五、七、九……为阳性数字。崇拜单数，属于崇拜男性生殖器的表象。而英国的那座塔却是双数。想不到东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竟有如此的迥异！

墓　志



墓志与墓碑不同。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刻石之文收入冢，称之谓墓志。"志藏入墓中主要是便于保存，因墓外的碑由于风雨侵蚀、日月风化种种原因易被毁坏。志大多刻在方形石板上，少数刻于泥砖或铁板。不过，不管刻于何物，墓志一定要作于下葬前。志文与碑文的内容差不多，都包括死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葬时、葬地，文末均以押韵的铭文结尾。碑文崇尚丰丽，志文力求简明。特别是官职，万万不可省略。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刻的华芳墓志首题长达46字："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志文也有洋洋万言的，据清人李渔在《志史偶谈》一文中记述：明嘉靖年间，与著名清官海瑞齐名的礼部尚书何维柏夫人的墓志计12000字，撰文达三月余，修改100余次，缮写56天，刻制亦达两个月，可谓中国墓志之最。

有人认为我国最早的墓志源于西汉时期。据《西京杂记》称：西汉杜子夏临终作文，命刻石埋葬，这就是墓志的由来。但最新的考古资料表明，秦朝时就有了墓志。1985年挖掘秦皇陵地宫时，发现18个死者身上均盖有板瓦，上刻死者的姓名、爵位、籍贯及劳役等情况，只是当时板瓦未定名为墓志而已。现发现署有"墓志"二字的志文，以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山西刘怀民墓志为最早。由此可知，墓志成为定制，当在南北朝时期。

墓志的形状一般为方形。据佛经传说，活人必有棱角，死后才成方圆。将人的一生，总结在方方正正的志石上，犹如去伪存真，去邪留洁，这样，魂魄步入西天，便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但

也有例外。1973 年在陕西三原县出土的李寿墓之志，刻于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志石龟形，并以龟背甲为盖。按盖上“铭记”：因“龟寿千年”，取其“吉祥之意”。在同一时期河南洛阳出土的吴高黎墓志，上作龛形，内镌佛像。可能这位吴大官人一生从佛，所以志与佛难以分割。1952 年在江苏如皋林梓高阳荡出土的三国名将吕岱衣冠墓中，有一块悬挂于棺椁之上的鼎钟，钟正面是一朵盛开的玫瑰，背面是吕岱的墓志。据考古人员考证，当时高阳荡，以生长玫瑰为著名。其墓志将主人比喻为玫瑰一样，具有刚毅，倔犟的性格。一代骁将被志文美化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因当时保管者愚昧无知，贪图小利，竟作为废钢化解。但是将墓志铭刻于鼎钟，却是吕岱时开创的先例。当然，上述“龟甲”、“钟鼎”形状，在全国墓志中是极为罕见的。

墓志因具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涉及死者的“隐私”较多，不象碑文那样单一的歌功颂德。明代作家张岱的墓志中就记载了他生前嫖妓、赌博等劣迹。天启三年，河南开封府抓到一名叫做冯天大的盗匪，冯天大无恶不作，家财万贯，他死于狗头铡前，人性返朴，知罪认罪，着家人花去几百银两，请刀笔吏写了

图 1　明·张文锦墓志盖拓片

描述一生罪恶的志文以“祈明昭罪”。所以开封一带至今尚留有民间俗语：“匪首作志，悔过自新”。

墓志还可以补史证史。唐代永泰公主究竟死于自杀还是被武后毒杀？看来是个谜，但是后人从永泰公主的墓志中可见其端睨。“珠胎毁日”，“忿双童之秘药”，“千秋万岁何时晓”，从这些字句，可推断出永泰公主确系武后所杀。在河南偃师出土的杜并墓志，刻于长安二年（公元 701 年）。杜并为杜审言（唐朝大诗人杜甫的祖父）之子。13 岁时，杜审言被吉州司马周季重诬陷，将被处以极刑。杜并乘周季重酒酣之际，将刀藏在衣袖中，行刺于他，不幸事未成而身亡。当时的左台监察御史苏颋嘉其孝烈，又不可公开宣扬，就将这件事刻于墓志，以示千古。

所以 17 世纪英国史学家鲍尔在他的《东方碑石》一文中阐述道，墓志不但是墓主的一生写照，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的人情风俗、政治风云乃至经济文化等。

研究墓志还可从志文上看出书法艺术的演变历史。比如，刻于隋开皇二年的李和墓志，字体近似楷书，但仍有隶书痕迹。这就为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理论提供了实物依据。另外，有的成语源于墓志。“葬玉埋香”一词一直用作埋葬女子的婉词，这一掌故即出自墓志。事见周越的《玉溪编事》：王蜀时泰州节度使王承俭筑城，获瓦棺中有石刻曰：“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王氏铭有云‘深深葬玉，郁郁埋香’之语”。

有些流传民间的传说，亦可求证于“墓志”。例如《水浒》中的武大郎身高仅三尺，面丑相恶。而从武家庄古墓中出土的墓志中，记述的武大郎却是七尺男儿，翩翩潇洒，家境富裕，是个三经乡试的秀才，当然不可能以卖烧饼为生，更不可能死于妻子“潘金莲”以及姘夫西门庆之手。从“潘金莲”墓志中看“潘金莲”的年龄竟比“武大郎”大 53 岁！

巨　碑

在六朝古都南京麒麟门外有座阳山，山上满是碎石杂草，然而，就在这荒山野岭之中，躺着一块巨碑。

事情还得从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谈起。其时为了维持朱氏家族的天下，朱元璋将 24 个儿子分封于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以“慎固边防，翼卫王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藩王的势力日益强大。燕王朱棣拥兵 10 万之众，实力为诸王之首。公元 1398 年，明太祖崩驾，葬于南京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的灵谷寺旧址。长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惠帝害怕藩王势力的膨胀，便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计谋，决定削藩。这样，皇族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公元 1399 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北京），号“靖难军”，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进攻应天（南京），史称“靖难之役”。惠帝和燕王叔侄之间的战争，一直打了 4 个年头。公元 1402 年，应天陷落，惠帝于城破后去向不明。燕王夺得了帝位，改年号为永乐。

朱棣做了皇帝后，为了笼络民心，以显示自己是朱元璋的正统继承人，派人开凿巨石，为父皇打凿了一块“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石碑螭首龟趺，碑文大如碗口，洋洋 2700 余字，全是对朱元璋的颂扬之词。非但如此，朱棣还派了数千名工匠来到阳山，将一座山头削平，以整个山岭为身，想在朱元璋陵前竖起一块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石碑。这块石碑碑身长 60 米，宽 12.5 米，厚 44 米，体积达 3300 立方米，重 8900 吨。碑座和碑额分别重 4000 吨和 4800 吨。如将三部分竖立起来，这块石碑将有 73 米高。这样的石碑，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

是无法搬运的。所以，这块碑材就这样在荒草中静静地躺了500多年，并且，有可能要永远地在那里陪伴春风夏雨秋霜冬雪了。

也有人说，朱棣开采这块阳山碑材，其真实目的并不是想以此来表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而是出于某种处心积虑的打算。因为南京城外的山脉，巍峨峻秀，气势雄伟，自六朝以来，就流传有“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的诗句，故南京素有“虎踞龙盘”之称。后人亦说南京有“帝王之气”，加上朱元璋的陵墓又葬在那里，所以，已决心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的朱棣，对此心存介蒂。因此，他毁山断脉，以竖碑纪念父皇为名，行破坏风水之实。这一见解，大概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吧。

据胡广《游阳山记》：“永乐三年秋，因建碑孝陵，断石于都城东北之阳山，得良材焉。其长十四丈有奇，阔不及长者三之一，厚丈二，色黝泽如漆，无疵莹。”这里记述的就是“阳山碑材”的开凿情况。

从观赏价值看，阳山巨碑仅以巨为奇，但从考古方面看，我国最早的巨碑应该是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建高宗李治乾陵时刻的《述圣记碑》。

此碑用七块大石累积而成，故俗称：“七节碑”。

此碑与乾陵《无字碑》一样，均是正方形，且都是6.3米高，比唐太宗昭陵里最大的一块石碑还高65厘米。碑上有庑殿式的碑帽，下面有线刻兽纹的碑座。据《来斋金石刻考略》载：述圣记碑石“来自于阗（今新疆和田），填以金屑，照辉陵园”。碑现存陕西省乾县西北梁山乾陵内。碑文由武后撰文，中宗李显书，内容是歌颂高宗功德，文体为初唐盛行的骈文，共8000字左右。

宋朝也有巨碑。相传三皇五帝之首的黄帝，出生于山东曲阜寿丘。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以土德称王。因土为黄色，故称黄帝。在开发黄河中下游的过程中，黄帝逐渐融合了周围的一些部落，形成了华夏族，奠定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广阔领域，因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据《曲阜县志》记载：宋大

中祥符五年（公元 1012 年）冬十日，“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曰圣祖母，越四年而宫成。……大碑四通，谚云：‘万人愁’者是也。其中二碑广二十三尺，阔半之，厚四尺，趺屃高十有八尺，阔十有六尺，厚四尺，龟趺十有九尺，无文字。意者未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寿陵”。不知何因，县志记载的大碑四通，现在只剩下两块。并且有人根据古人的两句诗：“丰碑不书字，遗憾宣和年”，考证出此碑建于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 1119—1126 年）。不管建于何时，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此碑确有一个“万人愁”的绰号；二是因金兵南下，工程未完，故未能刻字竖起。

上面记叙的是唐、宋、明三朝时期的古代巨碑。现代也有巨碑。北京怀柔登山基地有块登山纪念碑，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碑上题“山魂”二字。此碑高 8.846 米。世界上最高峰为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拉玛峰，据最新可靠资料介绍，珠穆拉玛峰高 8846 米。“山魂”碑石巨大，与珠穆拉玛峰高度比，正巧是它的千分之一。“山魂”碑的建筑构思者颇具匠心。

江苏海安的“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高 27 米，碑型成刺刀状，用墨绿色大理石贴面，以纪念 1946 年 7 月 13 日—8 月 27 日这一个半月中，歼敌 50000 余人的伟大胜利。碑体上有七个几何形坑穴——寓指我华东野战军在七个战场的足迹。此碑是由东南大学齐康教授构思，南通市建筑设计院建筑的。

外国亦有巨碑。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 年），一生共有 2000 多项发明创造，在电器、电讯、电影、矿业、化工以及建筑等多方面贡献卓著。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1937 年各界集资在美国新泽西州“门罗公园”里给他竖了一座纪念碑，碑高 131 英尺[①]，顶端直插云霄。碑文极其精练短少：“托马斯·爱迪生，1847 年生，31 岁发明留声机，33 岁发明白炽灯。他把音乐留给世界，他给人类送来光明。”爱迪生是历史上最多产、最有名

① 1 英尺＝0.3048 米

的发明家，一直被人们誉为“发明大王”和“科学界的拿破仑”。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给他的评价更是直截了当：“美国所以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这是由于美国有一个爱迪生”。因此，给爱迪生建造通天式纪念碑，是受之无愧的。

世界上大概美国的巨碑最多。而在这许许多多的巨碑中，哪一座能独领风骚，为巨碑之冠呢？按现在资料，应该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开拓西部纪念碑”。该碑由著名建筑家沙瑞南设计，碑型为抛物线型，似一巨大的拱门。碑于 1964 年始建，1966 年完成，耗资 2900 万美元。碑石最高点距地面为 192 米，碑两端的跨距亦长达 192 米。该碑象征着“这里是开拓美国西部的大门”，是为了纪念 1803 年 4 月 30 日美国出资 1200 万美元，“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一事件的。此碑不仅是美国之最，在世界上至今也未有能与之匹敌者。但在此必须说明一下，这块碑不是石质的，而是不锈钢体。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年)自幼显出诗才，20 岁时便出版诗集《20 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一举成名。他先后在中国、缅甸等东方国家游历过，因此对碑文化十分酷爱。1971 年，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便萌生了建造一块硕大的《诗人魂》碑石的愿望，借以显示诗歌的力量。聂鲁达花了所有的奖金，并获得挚友——西方租赁公司总裁英迪那先生的巨额赞助，从巴西买回一块重达 1 万多公斤的卵形石，上面刻着自己的佳作《你的微笑》，表达了诗人对大千世界的赞美。最后两句是：“世界给我微笑，不然我立即长眠”。1973 年他病逝后，这块“诗人魂”便成了聂鲁达的碑石。巨大的卵石安放在普通的水泥墓前，既表现了诗人的风格，更显示了诗人的永恒和伟大。1974 年元旦智利诗人协会曾为之向全球发布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块史无前例的巨碑”。

袖珍碑

朱剑心在《金石学》中曰："碑有巨细，意无大小，充其实，非充其形也"。我国的袖珍碑，目前只发现两块。这两块都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一块袖珍碑在广州，叫做《武则天文字碑》，由书法老人黄羲平设计。碑长不盈尺，宽约数寸。碑顶部雕一横卧的如意和大周天策金轮图案。(武则天于公元 690 年，废唐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天策为年号，金轮是武则天自己给自己加的号，如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大圣神皇帝等)。碑下面镌武则天自创的 20 个字：曌（照）、囻（国）、秊（年）、禾（天）、稦（授）、臷（载）、臸（初）、𠬜（吹）、𡈼（圣）、𠂤（人）、𠯿（君）、𢘑（臣）、𥘅（证）、𠀧（又）、正（正）、埊（地）、𢎘（戴）、㊡（日）、𠘨（月）、〇（星）。这是一首以武则天所创文字，记述武则天称帝之举的集字五言诗。武则天，名曌（她自定的名字，取意日月普照，永世光明，）山西文水人。唐太宗选纳她进宫后，赐名武媚。太宗崩驾，入感业寺做尼姑，法名明空。高宗继位，复召入宫，封为昭仪，进号宸妃。后来，立为皇后，参与朝政。高宗号称天皇，她便号称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崩驾后，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于公元 683 年废中宗立睿宗，公元 690 年废睿宗，并自称"圣神皇帝"。公元 705 年，武则天病重后，才应群臣"请求"，传位太子。中宗复国号为唐，给她上了个尊号"则天大圣皇帝"，这就是"则天"称号的由来。不久，82 岁的武则天病逝。武则天当政时，打击门阀贵族，开始殿试办法，破格选拔人才，注重发展

生产。但她奢侈专断，任用酷吏，打击异已，屡兴大狱，制造了不少冤案。后人对她的评价一直是毁誉参半。从这块袖珍碑上，可看出武则天的双重性格和她的参政手段。另外，武则天还有独特癖好，她为表示“女皇”的尊严，造了许多冷僻字，想以行政高压手段流传民间。不过凡事“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后来事实证明，武则天一旦离世，这些冷僻字也随她一起寿终正寝。

还有一块袖珍碑在浙江绍兴。这块碑仅高 20 多厘米，用淡青色翡翠制成，上刻“鹅池”二字。传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家乡绍兴兰渚山下凿池养鹅，通过观察鹅的高贵自如的英姿，而书法大进。他书写的《兰亭序》，素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真迹后随唐太宗入葬。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与三国魏著名书法家钟繇并称“钟王”，且有“书圣”之称。现竖立于兰亭的“鹅池”石碑，相传为王羲之手书。而这块翡翠“鹅池”碑，只有原物的十分之一，故曰袖珍碑。

当地还有一个别有趣味的传说，王羲之仙逝后，其子王献之为追彰父亲的业绩，想以占卜的方法，求得设碑的天意。他一连抽了三支签，每支签上都有“小”的标志，当夜又做一梦，梦见父亲骑一只白鹅，嘴中连连呼喊：“鹅！鹅！”。于是翌日请人释梦解签，定下碑以小为佳，名以鹅为美。这块“鹅池”石碑先立于荒野之中，一个游民想偷回作踏脚板用，谁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搬到家中，居然发起高烧不退，呓语叫声连天：“鸟去无我！鸟去无我！”游民的儿子闻悉后，当夜将石碑移至鹅池，意想让鹅得水，以保全家太平。从此，这块袖珍碑被人敬为神碑。王献之谢世后，又称为“字神碑”。邻近方园几十里人家，凡有小孩进学，大人进考，皆要到碑前敬香顶拜。我国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烈士也在兰亭拜石入学，并写过《鹅池诗》一首。

卧　碑

因为碑一般是直竖着的，所以人们常说“竖碑立传”。但是世间也有卧碑。道教真经《道藏·洞真部》谓称：“以神为体，以空为宅，求卧不求立也。”可见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卧碑，显示了“卧为严”的权威。我国清代顺治年间便出现过不少“卧碑”。此类碑是当时所有的学府及民间学堂都必须设置的。从碑文看，“卧碑”的主要作用是灌输封建主义的仁义道德，防范学生越轨，培养御用文人。例如序文中讲：“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第二条为：“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第八条则为：“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卧碑”不是形式摆设，每年逢开学典礼、孔子诞辰日，以及学考日，凡师生员工均列队于前，由一校之长朗读，并按其碑上条文逐一辅讲新的内容。顺治三年谕旨：不能背诵碑文者，不得进场应试。

近代也有卧碑。南京雨花台的一块大型卧碑是纪念杨光泩等九位抗日外交烈士的。碑正中为高凸浮雕，由九朵菊花组成一幅朴素高雅的图案，旁刻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于1947年在安葬烈士时写的碑文。

上海万国公墓里有一块为纪念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制造的桥形卧碑。内山完造夫妇30年代在上海开了爿“内山书店”。因其夫妇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重道德，有礼貌，所以，包括鲁

迅先生在内的许多文化人都成为内山完造的挚友。内山先生也十分热爱中国。他曾发誓："死，也要葬在中国上海。"40 年代中期，内山夫人美喜子去世时，内山完造把自己的墓也同时做好了。墓上塑一本打开的书，碑成桥型，寓意是内山夫妇的书店像桥梁一样，沟通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碑文是著名作家夏丏尊写的："设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死作中华土。吁嗟呼，如此夫妇！"1959 年 9 月 19 日，74 岁的内山完造应中日文化协会邀请，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中国，不幸第二天因脑溢血逝世。按其遗嘱，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中国有卧碑，外国也有卧碑。波黑境内的《脚印纪念碑》是为纪念爱国青年普林茨甫而建。普林茨甫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人物。事情发生在 1914 年 6 月 28 日，当时的奥地利皇储费兰茨·斐迪南大公指挥着奥匈军队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作为假想敌人。费兰茨·斐迪南一直主张吞并塞尔维亚，把奥匈二元帝国扩大为三元帝国。这一天，他带领着随从来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市，准备参加当地的圣·魏吐斯节。在前往市政府的途中，费兰茨·斐迪南遭到了塞尔维亚秘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员的袭击。但是，炸弹未能击中目标。刺杀者跳河逃跑时不幸被捕。费兰茨·斐迪南虽幸免遇难，却也吓破了胆，于是改变计划，打算绕道"拉丁"桥西行。这时，塞尔维亚的青年普林茨甫正隐蔽在一墙角旁。当斐迪南出现在桥头时，他扣响了扳机，终于击毙了这个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由于这一事件，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于 7 月 23 日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在 48 小时内答复。通牒要求制止一切反奥宣传和行动，惩办进行反奥宣传的官民，由奥匈派员会同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塞尔维亚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些干涉内政的无理要求。于是，28 日，奥匈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了。战争范围从欧洲逐渐扩展到亚洲、非洲、美洲。到 1918 年，共有 30 个国家

参加了战争。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互相残杀的大灾难。普林茨甫在打死费兰茨·斐迪南之后，也不幸被捕。因为他年龄未满 20 岁，按该国刑法规定，未立即被判处死刑，先关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郊区的监狱里。在狱中，他视死如归，还用铁钉在碗上刻下了壮丽的诗篇："让那些苟且偷生的人死去吧。让那些不甘心过奴隶生活的人永生！"普林茨甫后来壮烈牺牲于狱中，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拉丁"桥改名为"普林茨甫桥"。并且在他端枪站立的街角处，将他的脚印镌刻在人行道上的一块石板上，建成了世上罕见的平卧纪念碑。在这块《脚印纪念碑》的旁边墙上还镶嵌了一块碑，碑上刻着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1914 年 6 月 28 日，戈罗日罗·普林茨甫在这里用他的子弹表达了我们人民对暴虐的反抗与自由的向往。"

印度也有一块平卧纪念碑。不过，它的形状不是一双"脚印"，而是一条"路"。这块碑是为了纪念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英迪拉·甘地（1917～1984 年）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尼赫鲁的独生女，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三次出任总理达 15 年之久。1984 年 6 月 5 日，她下令实施"蓝星行动"，派军队攻打锡克族人神圣的金庙，极大地伤害了锡克族人的感情。在攻打金庙之前，有人提醒她，说她的卫兵里也有锡克族人。她却指着卫兵本特·辛格说："身边有他这样好的锡克族人，何怕之有？"当有人提出要将锡克族卫兵调离时，她坚决反对："我们怎能那样不近人情？"谁知，1984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9 时 8 分，在总理官邸花园里，英迪拉·甘地竟被本特·辛格等两名锡克族卫兵在相距不到 7 米远的地方连开 3 枪身亡。其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迪拉·甘地到死还保持了双手合十向卫兵"那玛斯特"（向您致意）时的形象。英迪拉·甘地的死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为了悼念她，特地从捷克斯洛伐克聘请了著名工程师建筑纪念碑。这块纪念碑构思奇特，造型新颖。它宽 2.5 米，长 30 米，起于英迪拉·甘地的官邸，止于她遇刺的地方，这是英迪拉·甘地生前走过的最后一

段路程。在这条“路”上，平铺着水晶玻璃，光彩夺目，金碧辉煌，远远看去，犹如一条流动着的小河，近看又似一块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毯。这块纪念碑自建成第一天起，至今一直静静地平卧在那里。

从中外卧碑看，中国卧碑注重以形示意，而外国卧碑则是强调第一感观。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谈到“卧碑”时说：“从艺术角度看，碑石成卧形或碑石卧放，其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十分引人注目，亦能从各个角度融合于景物之中。”

四面碑

四面碑即在碑的前后左右四面刻有文字。如前秦建元四年（公元 368 年）撰刻现存西安碑林的《广武将军□□产碑》、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 年）撰刻现存陕西蒲城的《圣母寺碑》、唐大历七年（公元 772 年）颜真卿书的《李玄静碑》、唐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由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的《颜氏家庙碑》、北京大兴县团河行宫里的四方形乾隆御碑等，都是四面镌刻的。

最古老的四面碑为《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是秦嬴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登泰山时颂赞他的纪功碑。相传为丞相李斯书写，字体为小篆。四面文字中，三面为秦始皇时刻，一面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加刻的诏书和从臣姓名。

汉朝最早的四面碑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简称《礼器碑》。正面内容是赞颂鲁相韩敕为孔庙制造祭祀礼器等内容，其余三面为出钱修造者的题名。此碑刻于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字体为隶书，在书法界影响颇大。古人赞它“书法锋铦神三军，苍古温润，无美不备，有汉分隶之独步也。”今人亦称之为“字字珠玑，楚楚可爱。”

素有“江南第一碑”之称的《国山碑》在江苏宜兴善卷洞附近的离墨山西南。此碑刻于吴天玺元年（公元 276 年）。称之为“江南第一”，是因两汉时的名碑很多，如《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但这些碑均在北方。天玺元年八月，宜兴地震，阳羡山中一块巨石裂开十余丈，吴主孙皓以为是吉祥的征兆，就命司徒董朝去行“封禅礼”，并改阳羡山为“国山”。因而此碑称“国山碑”，又称“董碑”。碑“微圆而椭，其形如鼓”，

高八尺，围一丈，绀碧色。碑四周刻字，碑文罗列了世间 1200 多种祥瑞，如“凤”，“连理”，“麒麟”……，字体为篆书，为吴中书东观令苏建所书。篆书碑刻存世不多。据杨守敬《平碑记》云：“秦汉篆书，自《琅邪台》、《嵩山石阙》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巍然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因此，《国山碑》具有颇高的文物价值。

江苏苏州市山塘街有块高 8 尺，每面宽 3 尺的四面碑。三面刻有画像，一面是文字。北刻唐朝僧人寒山和拾得像，南刻 500 罗汉像，东刻大势至菩萨像。画像均为明朝画家薛益画。西刻明朝王雅登的《重修白公堤碑铭》：“筑此芳堤，泽及千秋。山高水长，垂名不朽。”

《颜氏家庙碑》，又称《颜惟贞家庙碑》，现存西安碑林。据《碑帖叙录》作者杨震方先生介绍：这块四面碑，两面各 24 行，行 47 字，两侧各 6 行，行 52 字，全为楷书。正面系李阳冰隶书，碑阴记后，刻有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 982 年）重立记，记此碑曾倒于郊野而后再建的情况。又碑阴之上刻有《斋堂记》，亦有小篆额，具有小碑之形，传为宋梦瑛其师所书。《家庙碑》属颜真卿晚年（其时 72 岁）之作，笔力雄健，结体庄密，为颜真卿书碑中最完好者。又此碑与《大字麻姑仙坛记》为颜真卿后期楷书之代表作。两碑均能突出“颜体”之独到风格，在艺术上达到完善境界，故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少数民族也有四面碑。高句丽是汉魏晋时代东北地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四公里，有块高句丽第 19 代王谈德（即好太王）的墓碑，距今已 1500 多年。此碑高 6.39 米，谈德的儿子长寿王于公元 414 年竖立，实为谈德的纪功碑。碑文四面环刻，汉字隶书，内容分三部分，开头记述高句丽民族起源与建国经过的神话传说，主要王系的更迭情况。中间是好太王的政绩、享年、葬期等。最后为好太王陵守墓人烟户的来源、家数及守墓规则。此碑世称《好太王碑》，全称为《高句丽国岗上广开土

境平安好太王碑》。因高句丽的史料比较缺乏，所以，该碑碑文十分珍贵。

双色碑

墓碑一般是纯一色，以示庄严、凝重。但也有两种色彩的，不过，这种双色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在近代才形成。这是随着时代推进，新技术发展的产物。

黑白两色体：

原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的墓碑就是个典型。它在白色花岗岩碑中间，嵌了一块黑色大理石。这种设计恰到好处，一是外观引人注目，二是令人立在墓前有自然的严肃感。原《文汇报》社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的墓碑亦仿此。上述两块碑均在上海市虹口开发区万国公墓里。

黑红两色体：

杭州南山公墓里有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和她的丈夫钟贤道的合葬墓。设计者为何人不清楚，但据郁达夫生前介绍说：碑色取自法国名著《红与黑》。大概墓主的身世与司汤达（1783—1842 年）笔下《红与黑》中的人物命运有其相同之处，也许墓主生前对这本名著有很大的精神寄托。

武汉市江岸球场路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内出土的“国殇”碑也是黑、红两色碑，碑正面用黑色涂料漆成黑纱状，上端正中为红“十”字图案，下书隶体“国殇”二字。碑左侧刻“所建冢立石以志弗忘”，右侧刻“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增筑瘗”字样。这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寓意一目了然，告诫后人要继承和发扬武昌首义精神。

石刻文字

我国古代，铜铁等金属稀罕，加之在上面铸刻有困难，所以只有“以石代金”，达到“同乎不朽”的目的。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也就是说，刻在石上的文字，统称为碑，这是从汉朝开始的。

因此，《文体明辨序说》云：“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说具体一点，石刻文字除人们日常赋予的狭义的碑之外，还可分为井栏、食堂、石阙、摩崖等名目。

井栏，即井上之石圈。井栏上刻字，最早者为《天监井栏》，此井栏刻于梁天监十五年（公元 516 年）。其次要算梁大同九年（公元 543 年）刻的《大同井栏》。这两个井栏，均在江苏省句容县。当然，在井栏上刻字现在已比比皆是，最常见的有“饮水思源”、“水源渊盛”等等，这一般是民间书法高手之作。

食堂，又名“石室”，或称“祠堂”，为供展墓享祭奠之用。食堂刻字时间最早为东汉永建五年（公元 130 年），地点在山东省济宁两城山。山东嘉祥县武梁祠里石刻稍迟一点，为东汉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笔者在 1962 年去黑龙江嫩江县出差，曾在嫩北见一保存完好的“石室”，相传已有 600 多年历史，四面由“福”字组成字框，并镶有牡丹、芍药、紫菊等图案。正文是蒙文。笔者曾为此询问当地一老者，老者笑道：“这是老祖宗留下传下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是敬神敬祖所用。”

石阙为宫殿建筑上的刻石，现见最早的为西汉时台阶石。此石1941年出土于曲阜城东的周公庙附近，长95厘米，宽42厘米，厚195厘米，一侧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旁另刻“六五乙”三字，字体篆中带隶，“鲁六年”就是西汉鲁恭王刘余六年，即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陛，台阶。北陛，北边的台阶。鲁恭王刘余喜修宫室，在曲阜建了著名的“灵光殿”。这块北陛石当为灵光殿的遗物。

摩崖，即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东汉刻石中最早的为刻于永平六年（公元63年）的摩崖《开通褒斜道石刻》，地点在陕西省勉县北石门溪谷道中。此石是歌颂汉太守开通褒斜道这一功绩的。皇帝亲自撰文书写的摩崖有泰山东岳庙后的《记太山铭》，这是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文，亲自以隶体书写的。还有将佛经刻于摩崖的。山东泰安泰山有著名的石经峪，它是将《金刚般若经》刻于花岗岩溪床上而得名的，字大方一尺多，世传为“大字鼻祖，榜书正宗。”至于作者，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唐邕，有人认为是王子椿，清阮元认为是北齐天保间人所作。魏源说得更具体，他认为《泰山摩崖》与邹县《铁山摩崖》出自一人之手，当为北齐高僧安道一。有的摩崖是用多种字体镌刻的。刻于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阳华崖铭》就是三体摩崖，每字都是先大篆，次小篆，最后为隶书。摩崖主要用来记事，因其气魄大，影响广泛。浙江省绍兴市跳山有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大吉买山记》摩崖，湖南省祁阳县浯溪摩崖记的是平安禄山之乱事，河北省兴隆县雾灵山大清凉界摩崖是明朝边防蓟镇守边将领修筑长城的备忘录。

摩崖除石刻文字外，还有造像和绘画。我国最早的摩崖画为江苏省连云港市龙洞上的《东海摩崖造像》，据说比敦煌石刻还早200多年。摩崖画的分布面很广，内地、边疆均有，其中以边疆居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江苏徐州云龙山摩崖画为唐代刻的佛像；四川大足宝顶山大佛湾西崖画像为一竹笠短衫，腰挎鱼篓，摇橹

靠崖的渔夫；广西左江流域的摩崖壁画为令人费解的作青蛙状的人物；甘肃成县《西狭颂》摩崖刻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五种瑞相；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多有1100多年前吐蕃时的摩崖大日如来佛像；四川泸州市弥阮镇长江北岸有宋理宗时（公元1225—1264年）潼州路安抚使兼知泸州刘整向元世祖忽必烈投降的摩崖造像；新疆呼图壁县、阿尔泰山等处有生殖崇拜的摩崖壁画；云南沧源的崖画有人物785个、动物187只、房屋25间、道路13条……。另外，更为稀罕的是，云南麻栗坡县大王岩和邱北县狮子山的摩崖画还是黑、白、红彩色的呢！

位于湖北的龟山，也有一块刻绘龟蛇二神将的摩崖，为清代康熙四年民间集资所造。据传当年江水连年泛滥成灾，由于有了“龟蛇锁大江”，竟然三年洪水不上岸。但是第四年发生百年未有大灾，造成上千人死亡，从此摩崖被百姓视为“魔崖”。为怕龟蛇二将再走火入魔，当年端午节，群起用钉耙、锄头、刀斧将其铲除。清代作家蒲松龄还将此摩崖移植到《聊斋志异》中，描绘了“魔崖”的形体和其“魔力”。

现今黄鹤楼亦有仿古“摩崖”，但是毕竟是仿，不可和古物相比较了。

毁　碑

许多的碑石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除了它的书法艺术、补史证史等作用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碑石能保持至今天，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汉书·艺文志》曰："纸寿千年，碑刻万代，罕也！"的确如此，再坚硬的石头，又怎禁得住千百年的风吹日晒，雷打雨蚀？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所以大千世界上毁碑现象颇为严重。宋朝黄庭坚曾慨叹："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可见唐代碑刻，在宋代就已千金难买，更不要说唐代以前的刻石了。

毁碑的原因主要是两种：一是自然界客观因素造成，一是人为损坏。

自然因素包括：

1. 风化。秦《琅琊台刻石》本四面刻字，经风吹雨打，碑上的字已一片模糊。刻于唐朝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的《李宝臣纪功碑》，现存河北省正定县，碑高约二丈，宽八尺有余，风天中，常见微微晃动，当地人称为"风动碑"，那是因年久碑基老化而造成的。

2. 雷火。江苏省江宁县的《天发神谶碑》在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八月毁于一场大火，因而断为三段，所以又名《三段碑》。著名的秦代《泰山刻石》、东汉《熹平石经》也是被大火烧毁的。

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的《李玄静碑》，更是历尽坎坷，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被飓风所折，明嘉靖三年为雷火所焚，清咸丰年间又遭乱兵所砍，所以至今只

剩下几块碎片。

3. 地震。东汉延熹四年（公元 161 年）立的《西岳华山庙碑》和东汉建宁三年（公元 170 年）刻的《夏承碑》均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2 年）大地震；现存西安碑林的唐朝《皇甫诞碑》和唐武后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刻的的《顺陵残碑》均在明朝万历年间地震时断缺；江苏省镇江市焦山上著名的摩崖刻石《瘗鹤铭》也是因地震引起山崩而堕入长江之中。

碑被人为损坏的现象也很严重，战火兵灾中固然毁了不少碑，但最多的还是由于当权当事者政治倾轧，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所造成。西汉初始元年（公元 8 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实行复古改制，改国号为“新”，凡汉朝刻石，均令砸毁；唐朝会昌六年（公元 841 年）武宗居然下旨清除民间佛寺，与佛教有关的碑石大都被凿；宋代令人咋舌的党禁，苏东坡所立碑石都被拽倒；近代在陕西长安出土的三国魏大将军大司马曹真的《颂德碑》中“贼诸葛亮”四字已被剜去，这肯定是诸葛孔明的崇拜者所为；元朝金主完颜钦定亲王以下只封爵第，不可称王，凡世间碑刻中有“王”字者皆被凿毁。唐太宗李世民为魏征立碑，后来倒碑再立碑更可说明问题。魏征直谏，太宗纳谏，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唐太宗十分看重魏征，魏征临死，太宗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征逝世后，太宗痛哭流涕：“魏征没，朕亡一鉴矣！”并亲撰碑文，书写刻石。但魏征死后才半年，太子承乾谋反，大将侯君集参与其事，而魏征生前曾荐誉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太宗因而迁怒于魏征，下令推倒自己所手书的魏征碑，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的婚事。但是，事隔两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失败，这时才又记起魏征谏诤的重要，于是又重立了魏征碑。

毁碑还有其它种种因素。如汉代《刘平国治路颂碑》原在龟兹深山里，因拓碑人多，居民不胜骚扰，干脆就将碑铲毁了。唐武德九年（公元 629 年）虞世南撰书的《孔子庙堂碑》，据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载：碑刻成之后，因“车马填集碑下，捶拓无

虚月”，所以不久即毁。有的碑是后人“为我所用”，而磨掉原碑。据《旧唐书·姜行本传》：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刻的《姜行本纪功碑》（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是因“其地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此碑。”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刻的广西桂林虞山《舜庙碑》，至明朝嘉靖年间被当地官绅杨铨磨去一片，并刻其诗于上。有的是因避讳，而凿去碑文中的某些笔划。

上面讲的是古代种种毁碑事件。其实，在现代因人废碑的事情也不少。叶圣陶给他母亲撰的碑文就记录了这类荒唐的事：“我母朱氏，1865年6月17日生，1961年3月2日去世葬在这个地点，立碑作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毁得彻底，连一块小石块也没找着，1986年10月立。”还有北京福田公墓内有一块碑是碎块弥合起来的，上书“湖北省黄岗林明清先生林陈氏夫人之墓”16个大字。原来这是林彪父母的合葬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后，原碑被人砸毁。现在虽然凑成一整块，但碑文中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名字已被凿掉了。

除了毁碑现象，还有碑石失踪现象。诸如被侵略军盗运回国，老百姓用作墙基、灶石等，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我国的碑刻千千万万，现留存至今者十不足一，据《收藏》杂志不完全统计，全国毁于历次战火的名碑约有36%，毁于政治风云的占30%以上，特别是“文革”浩劫中，被毁名碑更是难以计数。如今太平盛世，毁碑现象已不多见。在建碑竖碑的同时，我们更应百倍地珍惜、爱护现存的古碑。

碑林热

祝嘉在《书学史》中云："天下昌盛，文事必隆，碑林丛立，百世崇仰。"我国碑林层出不穷，古代就有四大著名碑林：陕西西安碑林、山东曲阜孔庙碑林，台湾高雄南门碑林，四川西昌地震碑林。其中西安碑林声名最响，地点在西安市三学街，原是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为保存唐开成年间镌刻的《十三经》而建立起来的碑石集中地。后经历代增添，西安碑林现有碑石墓志多达10000多块，数量居四大碑林之首。自汉迄清，荟萃各代名家手笔，真、草、隶、篆，琳琅满目，是我国一座书法艺术宝库。特别是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阳冰、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人的手笔刻石，最为珍贵。靖康元年（公元1125年）北宋最后一位皇帝赵桓在中秋那天梦见西安碑林里牡丹花盛开怒放，不知是吉是凶，当即命主管卜卦的大臣韩林祥梦。韩林见到朝庭气数已尽，却大胆欺君，佯称百花仙子魂系碑林，结果命50个刀笔吏花了几日将所有碑文拓印出来。事情虽属荒唐，但韩林为保存记录西安碑林古迹，确实做了一件他意想不到的好事。

孔庙碑林集碑石2000多块，其中2000多年前的"孔庙"、"史晨"、"乙瑛"、"礼器"四块汉碑是中外稀罕珍品。历代皇帝去孔庙祭孔多去祭碑。据《史志》载："明天顺七年（公元1457年）英宗皇帝孔林祭碑，皇上于碑前感慨不已，三叩五拜，声称：孔学乃始祖仙师也。"

台湾高雄碑林集石1000多块。其马祖碑系明代戚继光大将军之子亲自著文，由古论今，记录了台湾、马祖等宝岛是中华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史实。

另有一块鬼子碑，颇独具一格。其碑文记载了明代台湾民众奋起杀倭寇的一次战斗，那一仗杀死残暴的日本海盗56名，其尸体合葬一穴，立碑刻石，字为“世代安宁，垒石镇妖，立碑斥惩。”“鬼子碑”几经沧桑，早已从荒坟移到高雄。1992年7月，笔者老友张炳南先生讲述，此碑刻文已依稀难辨，碑石也无特色，日寇侵台后，曾被日本浪人吉田泽一刀凿斧砍，并用砂石磨去字迹打算沉入海底，但因碑石过重，又扔至海岸。抗战胜利后，被渔民重新捞起，才使它成为历史的见证，再显人间。

西昌地震碑林是将西昌、普格、宁南等县古代官衙、寺庙、祠堂、城垣、书院、桥梁、水堰、墓葬等处的100多块碑石集中在一起而成。因为这些碑石记载了凉山地区汉武帝元封五年，明嘉靖十五年、清雍正十年，清道光三十年四次大地震的情景，故人称“地震碑林”。

近几年来，我国亦兴起了一股碑林热，每个碑林都各具其特色。

中华同心碑林：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坐落在陕西省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之巅。自汉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期间，多派祭陵钦差去祭扫黄帝陵。最有趣的是1937年4月5日，国民党、共产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笔写了祭文。1942年蒋介石为黄帝陵题碑（1991年4月竖立）。翻开历史的一页，1994年3月26日为祭扫黄帝陵，江泽民亲笔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李鹏题词：“发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根据中央有关领导提议，为表达各省人民崇敬始祖轩辕皇帝的心愿，将在黄帝陵功德坛周围建造中华同心碑林。中华同心碑林占地近1400平方米，由全国省、市、自治区各建一块碑组成。每座碑面向功德坛圆心，碑林的位置依据自然地形由南向北逐步上升。周围植松柏环卫。各碑的正面刻有地区名称及整修黄帝陵捐款数额等，背面刻记各省、市、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概况。该碑林将与功德坛

浑然一体，成为黄帝陵区的新景观，藉以体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豪迈气概与奋发向上的精神。

毛泽东诗词碑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天津市建成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此碑林建于“津门十景”之一的蓟北雄关的八卦村内，成为黄崖关长城的主要文化景观。碑林镌刻了毛泽东同志从 1923 年至 1964 年间创作手书的诗词 28 首，镶嵌在 138 米长的古典式回廊之中。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 1933 年开辟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昭示子孙，巴中市决定投资 60 万元，修建 300 米园林式将帅碑林长廊。按中央有关规定，进入碑林的将军名单是：张震、洪学智、秦基伟、张爱萍、李德生、尤太忠、杨成武、肖克、向守志等十位上将；郑维山、傅崇碧、赵杰、林彬、陈宏、谭知耕、张志勇、朱士焕、徐国夫、唐青山、贺健、程登志、陈挽澜、陈福初、吴世宏、徐斌、李永娣、王定烈、马文波、高厚良、石忠汉、马忠全、陈明义、杨国宇、王政柱、苏焕清、桂绍忠、胥光义、张显扬、程启、杨大易、吕仁礼、邓仕俊、黎光、汪易、肖全夫等 150 多位少将。碑文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主要有本人简历、素描、画像等。碑上的书法文字，聘邀知名书法家撰写。碑林还将刻制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简历碑和知道姓名的红军战士名字，要求立碑者达 10000 人以上。建成后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有纪念碑 1200 块。真是巍巍成林，洋洋大观。

另外，在河南开封，有我国第一个民办碑林——供销社职工李公涛自费建的“翰园碑林”，现有碑石 136 块，集我国名家之大成，诗文书法，相映生辉，琳琅满目。该碑林被国外专家学者赞誉为“神奇的艺术世界”。

郑州以北 27 公里黄河游览区内有“黄河碑林”，数百块石碑

上的碑文均出自当代名家之手。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感慨赋诗："黄河滔滔，碑林依依，碑中激浪泛波，河中飞文走诗"。

广西桂林七星岩有"中日友好书法碑林"。200多块石碑中，集中了中日两国不少著名书法家的手迹，如中国的许德珩、赵朴初、启功等，日本的中曾根康弘、青山杉雨，仓山雪州等。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还建议模仿七星岩的"中日友好书法碑林"，在日本广岛建立"日中友好书法碑林"以达到"碑石不朽，友谊永恒，子子孙孙民族和睦之目的"。

最近，178位世界华人画家、书法家齐聚三峡刻石已拉开序幕。这是碑林艺术史无前例的壮举，将囊括古今中外颂赞长江及三峡的书画。武汉市著名作家沙铁军在1993年3月2日《长江日报》上以"醉碑"为题描述道："三峡将因宏伟的长江改道工程而消失。我们却不能让后代后辈忘记这个千古传颂的景观。近200位画家、书法家云集在一起，面对三峡对话，将景寓于意，将意寓于石，其势磅礴，其境伟岸，必将是天下最为珍贵、高超的艺术巨品"。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文化艺术亦将猛进。不断崛起的碑林，正以新的风貌出现在人间。这个"热"既有其延续性，更有其向多层次多方位发展的趋向。也就是说，人们在保存观赏文化宝库的同时，还要创造出合乎时代精神、带有浪漫思想、跨越世纪的丰碑。

现代碑石

古代碑石是凝重的，但又是单调的。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传统碑石必然要进行变革。这场变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材料的选择、建造技术及碑文内容的进步。

在四川省松潘县北 17 公里处元宝山顶有一总高 41.3 米的“红军长征纪念碑”，此碑有“中华第一金碑”之称，它的主体部分是用色彩鲜明、抗腐性强的亚金铜贴面。亚金铜是我国首创的一种仿金材料。在阳光照耀下，整座纪念碑金光闪闪，巍然壮观，给人一种神圣华贵之感。

与之相反，北京太子峪公墓的“碑”最朴素，最平实。太子峪公墓里有我国第一个骨灰纪念林，这里不立墓碑，不建坟冢，有 1600 株各种名目的树，一个死者拥有其中一棵树。如其中一棵生气勃勃、枝叶茂盛的华山松便属于已故外衣部副部长陈志方。用生长的树木替代古老的墓碑，这是碑石文化一大进步。

总的说来，我国在碑石的改革方面步子迈得还不大。国外现有不少的碑已突破了人们惯有的那种关于碑的概念，而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品。

美国旧金山市索利肯墓地里有一种会“说话”的碑石。说话的内容往往是死者的遗言，且配有音乐，可持续 90 分钟。这种碑石叫“太阳能有声墓碑”，是著名的设计家斯坦恩·艾拉尔伏宁工程师的新作。他大胆采用了仿人造卫星的太阳能技术，使得墓碑在白天“说话”，晚上“休息”。

美国另一位设计家约翰·普里文生产了一种七彩缤纷的碑石——色彩是采用激光技术刻在金属板上的图画，内容常是死者生

前生活的情景。

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克马利市有块“民权运动纪念碑”，这是纪念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设计者是美籍华裔女建筑家林瑛。黑色花岗石墓碑上刻有马丁·路德·金的名字及生卒年份。碑顶端即是喷泉，能以声响激出乐章，极富感染力，使人联想到马丁·路德·金生前激昂雄辩的声音。

在罗马尼亚北部拉穆列升县瑟彭察乡，有一块“快乐墓地”，里面的碑石都做成十字架式。在碑上方刻有能反映死者性格特征和某些嗜好的绘画或雕塑。碑的中、下部刻着打油诗，内容是歌颂死者生前的专长，或幽默地揶揄某些地方的不足和缺陷。图画和打油诗四周均有麦穗、花卉、小天使、鸟等图案。

挪威有一名双目失明的富翁，名叫斯托达尔。他为了替盲人建一个自然公园，捐出巨资请著名雕塑家和电子音乐专家建造了一个高 20 米的纪念碑。这块碑内装有光学仪器，运用了电脑等高科技手段。因此，当阳光照射时，碑里就发出悦耳的电子音乐。声音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阳光的强弱。

在德国和波兰的边境上，将要出现一座用 4300 辆坦克搭建的纪念碑。碑成拱门式，高 400 米，长 1300 米。这项工程将从 1995 年开始，预计 5 年完成。之所以有此“杰作”，是因为据专家所测算，用坦克来建造纪念碑要比直接销毁这些报废坦克的费用省去一半。

说到底，我国碑石之所以缓慢地改革着，是因为碑石就其实质意义讲，是建筑在传统文化之上的。自古至今，在我国人心目中，碑石庄严凝重，是不可任意侵犯的神圣物。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碑石文化不能跃飞，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这纯属扭曲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特点，将碑石艺术与民间文化割裂开来了。

风　土　篇

官箴碑

古代的州衙大堂里均竖立一块青石，两面刻有文字。一面是“泰山奇峰”，一面刻着为官要廉洁奉公等劝世文。这块青石就叫做“官箴碑”。

“泰山奇峰”和民间墙边的“泰山石敢当”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表示镇祟压邪所用。据《通俗篇·居处》云：“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这一习俗，唐朝初年就颇为流行。洛阳府就发布官谕：衢巷桥港设石敢当以求天下太平。唐代颜师古注《急就篇》云：“敢当，言所当无敌也。”

官箴碑的背面刻有告诫之语，文字简炼扼要，严肃庄重。宋朝大诗人梅尧臣就曾诗云：“赏闻开元时，令长多赐戒。戒石今尚存，世异事不背。”（“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官箴碑刻文内容，各地虽有差异，但都有这么几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句话原是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所撰的《戒官僚》文中的一节。（原文是 24 句，共 96 字。全文可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和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这 16 字的意思，主要是告诫为民父母官者，要时时想到自己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因此，不要欺压人民，为官要清廉公正。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曾诏令天下郡县都要将这 16 字刻石，立碑于官府大堂前。宋太祖还命人在太庙寝殿夹室中镌了一碑，让新太子登位时入室默诵碑文。靖康之难后，人们才知道碑文内容：“柴氏子孙、不得加刑市戮，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赵匡胤是在公元 960 年以后周禁军统帅的身份，在他弟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划下，发动兵变，夺取了恭帝柴

宗训的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赵匡胤此举显然是为了报答旧主的恩德，并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

官箴碑的刻文，随着改朝换代，不同的统治者有不同的告诫语。今山西省新绛县尚保存一块“文臣廉政”碑，刻于宋徽宗时期，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碑高110厘米，宽70厘米。正楷碑文，共七条：“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廉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贵实。谓专求实效，勿竟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

现西安碑林中也存有一块明朝官箴碑，为嘉靖年间河北定州无极县知县郭允礼所刻。碑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明朝洪武十七年，甚至在宫中立了三块铁碑，上铸“内宦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字样。历代宦官凭仗皇廷威势，为虎作伥，作恶多端。朱元璋虽总结了宦官涉政的严重教训，但是他万万想不到朱明王朝宦官仍然能挟持皇帝，乱政虐民，魏忠贤竟敢违先皇之旨，将此铁碑推倒。

历代立官箴碑，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有的官吏仅把它当作一种涂脂抹粉的“摆设”而已。实际上他们背叛了官箴戒言，仍旧在那里敲榨勒索，鱼肉百姓。后人就曾改写过唐朝官箴碑文：“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着；上天难欺，且待临时。”这一改，意思相反，尖锐地讽刺了那些贪官污吏妄想立碑树传，标榜廉政的可鄙嘴脸。不过，就理而论，官箴碑碑文中有不少内容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仍可作为当今各级干部的座右铭。因此，我们对古代官箴碑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中积极的内容认真地落实到行动中去。

官箴碑流传到国外，亦颇受人们重视。在日本二本松市霞城公园里有一块官箴碑，上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大字。这段碑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多少年来一直成为二本松市政府的戒律。其碑已被定为日本国家级文物。

在新加坡增福公园里，也有一块“官箴碑”。此碑是清嘉庆二十六年（公元1821年）所立。时任朝廷礼部尚书的戴联奎，在随嘉庆帝谒东陵时，因失落行印，被降为太常寺卿，督浙江学政。其子戴副荣为父失职而痛心疾首，愤去南洋行商，次年闻父殁逝前留有一句遗嘱：“为官必慎”，为了纪念父亲，戴副荣将箴言刻制成石碑。这本是悼念父亲的纪念碑，但新加坡华裔却将它视为“官箴碑”，代代相传，互相告诫。

法典碑

把法律条文刻于石碑上，最著名者为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

古巴比伦是公元前 19 世纪由阿摩利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即两河流域）建立的一个国家。到公元前 1758 年，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约公元前 1792——1750 年）打败了其他的一些卫星国，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汉穆拉比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编制了一部旨在维护奴隶主统治秩序的法典。法典原文是刻在一个黑色玄武岩圆柱上，圆柱上端是国王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上接受权标的浮雕像，下面是用楔形文字刻成的法典全文。法典共分为三部分：引言、法典本文和结语。本文共 282 条，内容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租佃雇用关系、商业高利贷关系、债务、婚姻、遗产继承、奴隶等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汉穆拉比法典是了解和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的最重要材料。此碑于 1901 年由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兹发现，现保存在法国巴黎的卢佛尔博物馆。

我国也有一块可算得上是中国之最的法典碑，这就是最近在河北省大名县出土的《五礼记碑》。该碑所载内容虽不及汉穆拉比法典翔实，但是，亦有其珍贵独特之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军礼，石碑所记即《政和五礼新仪》，这是宋朝大观二年由宋徽宗下诏修编的一本法律法规专著。这本书撰成后，宋徽宗亲自作序作论，并亲题碑额“五礼之记”。与此同时，并令左丞梁子美在大名府也建碑立传。因大名府地处平原，无巨石可寻，故利用旧物——将唐代一块大石碑正面的文字磨掉，改刻为《五礼

记碑》。唐代的这块石碑原为唐朝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碑体高 12.34 米，宽 3.04 米，厚 1.08 米，重量达 140 多吨。唐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何进滔去世，唐文宗李昂嘉其德行，特诏工部侍郎柳公权为其撰写碑文，由梁王司马元度篆刻。众所周知，柳公权是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他的正楷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一体。现仍可从《五礼记碑》两侧窥见柳公权真迹之一斑。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法典碑”。广西大瑶山地区流行一种“石牌律”。石牌律是瑶族以村寨为单位订立的民间规约，形同法律，因均刻于石碑上，故称“石牌律”。石牌律采用群众欢呼歌唱的方式通过，一经通过，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其涉及内容范围较广，有保护农、林、副业生产，确立山主、山丁之间的权利义务；也有维护婚姻生活，反对婚外性关系；发生争端要请老人讲理，不得任意捆人毁物；还有戒偷盗，不许通匪窝赃，如遇匪盗要报告，共同追捕；要保护正当的行商小贩；保护坟墓；等等。如违反了这些乡规民约，要受到惩罚。

无独有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州边缘的毛山镇，镇街头也竖有一块“民规碑”。壮族的“民规”，亦约同于我们所讲的地方法典。共列条文 10 则，遵者奖，违者罚。“民规碑”虽有上百年历史，但每年碑文都重新填漆，所以看上去光亮如新。每年到了壮民节，全镇男女老少都要祭碑，碑上系绸挂采，碑前碑后，鲜花如海。“民规碑”在维护社会秩序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路规碑

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我国的道路“车同轨”，开始有了统一的规划。与此同时，一系列交通行政规则也就应运而生。秦时就有《传食律》和《行书律》作为交通行政的法律依据。唐朝《杂律》中也曾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马车者，笞五十。”

把交通法规刻于石碑上，我国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是保存于福建省松溪县虎山公园中的一块青石碑。这块青石刻于南宋开禧年间，高2米，宽1米，草书碑文。碑正中署明立碑所在地，左右两边载注前后五里须恪守法规的地名段和当年经宋太宗赵炅御笔亲批的四句交通规定：“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除第一条“贱避贵”带有封建等级色彩外，其余三条都接近于现在所通行的交通规则。该碑虽立于“开禧元年（公元1025年）四月望日”，其实这些交通规则从宋太宗时就已制订。

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卿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上述四句话作为交通规则。宋太宗批准了孔承恭所奏，下令各地“处处衢肆刻榜”广而告之。由此可知，宋朝自开国初就已将交通规则刻于石碑、但由于年代久远，大都湮没了。所以，松溪县虎山公园中的这块“交通法规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填补了我国古代交通规则实物史料的空白。

这里有必要着重提一下太平天国时期的“交通法规碑”。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后，正式建立了

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农民政权，并颁布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等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盛世。正是基于这些美好的愿望，太平天国时期十分重视制订交通法规。安徽省无为县南门外张家亭村岔路口和浙江嘉兴城郊西丽桥旁的两块分路碑，以及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一块《太阳河码头渡船规条碑》，就是典型的史证。分路碑的作用为指示分路方向。“无为碑”上端横写“分路”两字，下面三行，直书，字体为阴刻正楷。第一行为“右至襄安”，第二行为“左至虹家桥”，第三行是立碑的时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梁具。”“嘉兴碑”碑文为阳文，上端横写“分路碑”三字。下面三行，直写，文字残缺，仅存“太平天国”、“此路由城外”、“孟春月吉”数字。《渡船规条碑》碑文内容是为适应客商需要，保证码头经常畅通，对安徽和州（今和县）东南太阳河牛渚一带码头发布的告示。其中条文包括：码头船户对“远近往来客商”“各宜随到随行”，“不可迟延”、“阻滞”。“无论车子肩挑，以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都须按规条分别收费。“倘若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恕。”碑文中还规定单身人出钱 20 文，牛骡驴马每条出钱 200 文，挑担人出钱 40 文，羊每只出钱 10 文，“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总之，这三块太平天国时期的路碑，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在彻底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

另外，湖南、广西等地，常在村寨岔路口立一小石碑，向过往行人指明方向，以免迷路。这类碑，称“树路碑”，或“树指路碑”。

西藏布达拉宫气势非凡，但由于宫内多殿，殿内多路，往往造成朝佛者迷失方向，于是每条路口皆立一小“路规碑”。此碑所标之“规”言简意赅，只有寥寥数字，如“左转向前”，“右转向

后”，“前进见佛”，“后退至殿”等等。由于“路规碑”都立于脚下，一碑一个脚印，犹如不讲话的导游。

我国嫩北平原，人少车罕，十分荒凉。但是每座荒山上皆有“路规碑”，其作用是生怕登山伐木者进了森林，难以辨别方向。这些路碑都是车老板自筹资金制立，上面除了刻有上山、下山的方位，还刻有山林主人的名字。这种碑，用砖多于石。但其砖之大，不亚于常见的石质路碑。

水则碑

水则碑是古代用以记载洪水水位的，陕西泾阳县泾河出山峡谷内古丰利渠口的一组北宋末年的石刻水尺就是一例。水则碑是古代测量水位变化，计算河渠水流量的重要度量工具。其中最著名的一块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四川省涪陵市“古代水中碑林”——白鹤梁石鱼题刻。

白鹤梁是位于长江主航道南侧的一条石梁，在这条长 1600 米，宽约 15 米的石梁上，从唐朝开始，及至清代，留下了大量的题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14 尾石鱼。为何雕刻石鱼图像？这确实是个谜。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博士在《中国鱼文化》一书中阐述道：“鱼的图像与意象同丰稔、物阜的锁连，载传着华夏先民以渔农经济为主体的文化信息，是原始的经济部门确立以后出现的信仰观。”也就是说，鱼是丰收的象征。“鱼者，余也。”这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直至今日民间还盛行“鱼含莲花”的年画，就因为它隐含着“连年有余”的寓意。因此，白鹤梁上所刻石鱼，就成为古代劳动人民盼求的吉星。“石鱼出水兆年，”石鱼出，乡间百姓会为之奔走相告，文人墨客刻诗题咏，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几百年来，习以为俗。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开宝四年黔南上言，大江中石梁上有古刻云：‘广德元年二月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广德为唐代一个年号。自此，白鹤梁上题刻不断。如宋人庞恭孙题记曰：“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壬辰，水去鱼下七尺，是岁高秋果大稔，如广德、大和所记云。”清人姚觐云记曰：“涪州大江有石梁，长数十丈，上刻双鱼，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萱叶，一衔莲花，或

三五年，或十余年一出，出必丰年，名曰石鱼。”

据专家称，白鹤梁上石鱼眼睛，历代一直视为长江枯水位的标志。石梁上有103段题刻，自唐至清，记录了72个年代的枯水水文资料，这为人们征服、开发长江提供了科学的论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块水则碑的确是我国的一个国宝。

除白鹤梁石鱼题刻外，四川省还有一块水则碑，它镌刻在云阳县城外，濒长江南岸飞凤山麓张飞庙杜鹃亭后的石壁上。上有“大清同治庚午洪水至此”几个大字，这为葛洲坝拦江大坝的高度提供了一条珍贵的资料。

江苏省至今已发现两块水则碑，位置在吴江县东门外。据史籍记载，原左立水则碑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前后被损毁，后补了一块“横道水则碑。”上刻一则至七则横线，并云：“增减水则例：水在一则，高低田则无恙；过二则，则低田淹；过三则，稍低田淹；过四则，下中田淹；过五则，上中田淹；过六则，稍高田淹；过七则，则极高田俱淹。”右立水则碑位于长桥垂虹亭北侧岸头的右端，上刻7至12月，每月分三旬的细线。旁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字句，“此”字至底部高程分别为4.3米和4.18米。

用刻碑的办法来记录水位，使之成为水文方面永难磨灭的历史文献，这亦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学规碑

我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

隋炀帝时，“孝廉试经，秀才试策”，这种考试制度，实为科举制度的前身。唐朝开始推行科举制度，宋朝更是竭力提倡，至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较前代更为繁复而周密了。与此同时，对学生的要求也随之严格起来，制订了不少“学规”，并刻之于碑，竖立于学宫门前，以便学生出入即见，熟读牢记，遵守不怠。

宋朝时书院制度颇为盛行。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是宋初著名书院之一。公元 1179 年（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大理学家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刻学规于碑，以示学者。碑文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具列于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喜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这位大学者十分重视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从中也可以看到，白鹿洞书院治学严谨，当时师生之间常以学问相互切磋自勉，“教学相长”。

最近，在湖北汉中地区行政公署还发现了一块清朝的“学规”碑。碑呈横方形，高 98 厘米，宽 132 厘米，厚 14 厘米，碑额横题楷书“卧碑”二字。“学规”共七条，现全文抄录如下：

“礼部题奉钦依刊立卧碑，晓示生员：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妄行辩唯。为师长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军民一切利害，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顺治九年二月初九日”。这一碑文里，有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成份等糟粕，也有劝人洁身自好、谦虚谨慎等精华。我们应该去粗取精，把“学规”里面的积极方面作为借鉴，古为今用。

笔者家乡江苏如皋有一著名学校——安定小学，这是为纪念北宋理学先驱，著名教育家胡安定（胡瑗）而定名的。胡瑗（公元 993—1059 年）所订学规极严，所创“经义”、“治事”两斋，是我国高等学校分科分系的开端。宋庆历四年，仁宗诏令各州县兴学，并在京师设太学，派员至苏、湖两州取胡瑗教学法为《学海条约》，颁行全国。宋皇佑四年，胡瑗升为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为了使《学海条约》进一步在各地施行，禀告天子以旨命谕，在所有学宫前皆立“学规碑”。

笔者小时候在如皋安定书院内见过一碑。这块“学规碑”，碑文已模糊，所拓可辨文字有：“以仁义礼乐为学”、“讲求明体达用”、“为二程（程颢、程颐）所宗”。最后是“开宋代理学之先声。”

如皋人世称胡瑗为“安定先生”，因此对安定先生立下的“学规碑”敬而如神。抗战之前大家小户的孩子进学，都由大人领到“学规碑”前烧香拜礼。

总之，刻有“学规”的石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为我们研究古代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界　碑

在某些地域的限隔处竖石作为标志，这类竖石称为界碑。

世界上最古老的界碑，是我国秦朝的一块《要寨碑》。这块碑于1982年在河南省内乡八里岗半崖上发现，碑残长150厘米，宽56厘米，厚18厘米。碑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八里岗也，冲秦、晋之要，通吴、楚之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车同轨"，对交通运输颇为重视。并且，秦时刻石之风甚盛，所以秦朝时的竖界碑现象极其普遍，已达到"界必有碑，碑以示界"的状况。其次，要算西汉时的琅玡郡界域碑。这块界碑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在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云港市连岛羊窝头峰北侧。碑临海而立，距海平面平均潮位约8米。碑文为隶体，尚可辨认40多字，内容为琅玡郡界四至范围。从碑文上可以考证到秦汉时的连岛与大陆是连成一片的。

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交界处也多竖有界碑。汉族与藏族交界的赤岭（亦名日月山）上就有一块界碑。唐太宗时，这位大唐天子曾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汉藏结为亲戚。唐玄宗开元初，"舅甥失和"，双方关系比较紧张。至开元二十一年九月，吐蕃国王主动求好，双方订立友好盟约，并将盟约刻于石碑，竖于汉藏接壤的赤岭。碑前后两面，刻盟约之誓词；左右两侧面，刻大唐及西藏与盟诸臣同其僚属卜官姓名。双方约定：赤岭以下，"藏兵勿来"；赤岭以上，"汉兵不入"。自此以后，两个民族之间和平友好了较长一段时期。

在国界线上竖碑就更是一件严肃的事。中国与越南交界处有一块红顶白身的界碑，俗称"零公里碑"，我方一侧的碑身上刻着"至河内172公里"字样。

我国黑龙江省与俄国接壤的黑河市北部也有一块国界碑。碑上用汉字和俄文同时写有“国界”二字。双方边防军以碑为界，各守其疆。

国外也有不少界碑。俄国横垮欧亚大陆，在它境内，北起乌拉尔山脉的北端，南至乌拉尔河的尽头，有一条欧亚两洲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是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地理学家弗·塔季谢夫提出的。在这条分界线上，界碑多得无法计算，并且形状各异，有三角形、六角形、火箭形、金字塔型、方块型……其中造型最奇特的有两座，一座是19世纪中叶，北乌拉山金矿的企业主们捐资建造的教堂式的界碑；另一座是1985年，“雪松”俱乐部的旅游者集体出资建造的带有太阳能钟的金属界碑。

地理学上所假想为通过南北极而与赤道成直角的东西分度线称做“经线”。在挪威北部哈默弗斯特港有一座花岗石制成的圆柱型界碑，上面塑着一个硕大的地球仪，那是为了纪念经线贯穿该地制造的。

赤道线上也有许多纪念碑。最著名的一座建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以北20公里处，碑呈方尖型，高90英尺，由许多块淡粉红色和灰色石头砌成。尖顶上也有一个象征地球的球体。碑上刻有英文：“这里是地球中心”。碑四周写着E、S、W、N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当到昼夜平分的春分和秋分的中午，因为太阳位于赤道的正上方，所以，这时的赤道界碑就不会在地面上留下影子。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年的这个季节来此观光的游人特别多。他们除了可以得到一张“无影”照片外，还可拿到一份“地球中心游览证明书”呢。

界碑不同于其它碑石，因为它含有分界的意义，所以往往由于界碑的不准确，或者界碑的移动而造成各种纠纷。旧时代无法可循，常常为了几寸之土，格斗拚杀造成许多流血事件。而小小一块国界碑，也会因各种有意或无意的越境，引起外交纠纷。

环保碑

谈到环境保护，不少人总是啧啧称赞西方发达国家。的确，西欧的“绿色和平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等等举措，世人早有所闻。例如在意大利利古里亚海边城市波托费拉约市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场，场里堆放着许多空瓶子、废塑料板之类的杂物。场中央高高耸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保护自然吧！这里陈列的全是海里捞起来的。”但是，要是有人认为我们国家不重视环境保护，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我国古代就有重视环保方面的记载。在陕西省甘泉县雨岔乡灵掌寺有一块护林“禁约”碑，此碑高 2 米，宽 0.76 米，刻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碑额题“松柏碑记”四字。碑文中特别强调了要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人必须严惩：“松柏大树自唐宋以来栽培，岂宜砍伐！要虔心看守。但有本县势豪人等欲来采打，指名呈府以凭重究。”这块环保碑确有效应，几百年来灵掌寺附近松柏参天，绿树如荫，秋毫无损。

清朝时，民间亦很重视护山护林，不少地方自发地订立了一些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乡规民约。在广东省惠东县平海镇佛岭村口大榕树身里嵌有一 块石碑，那是一块刻于清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的护林碑，世世代代的佛岭人，不但护树，也同样保碑。

在福建省天宝岩有一块禁伐碑。碑文如下：“立此，严禁荫木盗砍。有祖山一大片，土名南溪，四周原管界址内，有龙浪头，蓄晋松杉、杂木，以遮荫保风水。其外山有订人曾去栽种，历久无异。日后亲友均宜自爱，切勿盗砍。凭亲友力劝始免，不究。如再有将荫木盗砍者，必送究治，决不宽恕，勿谓究之不早也。谨

此布。大清同治甲子三年八月。”由此碑可见，清代某些地方政权对山林是悉心爱护的。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南城镇中大街北大桥南侧李守干家后墙上嵌有一块高100厘米、宽36厘米的碑，上面是正楷碑文：“公议：桥下水道，毋准委弃污秽泥土。违者每担罚洋一圆。光绪三十年三月谷旦。”这证实了我国民间也重视环保工作，中国人民的环保意识是有历史的。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加强了。江苏省邳县山头村村民祖居胜阳山坡，世代饱尝无水之苦。为图生计，村民天天要到3里以外被严重污染的运河里去担水。经医疗部门检查，全村2000人，已有127人因饮用污水先后染上了肝炎等各种疾病。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县长晁念胜等领导当即决定集资20万元，引清泉上山。经过50天奋战，工程胜利竣工。为此，原先“半眼井水百家吃，有女不嫁山头汉”的山头村群众感激万分，500户村民自愿集资树起了“歌水碑”。一人多高的石碑正面是“饮水思源”4个大字，背面碑文最后16个字是“饮水思源，铭记党恩。立碑歌水，以志其功。”

应该承认，目前我们社会中某些地方某些人的环保意识是薄弱了一点。“黄山界碑”就记述了这一事实：“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中午，游人汪某登天都峰，扔烟蒂于崖下，燃着枯草，酿成大火，周围千余军民奋力扑救达十四小时。山火无情，四千余株黄山松，四百余亩杜鹃等名贵花木，毁于一旦。肇事者虽被绳之以法，但雄伟壮丽的天都峰却留下了难以补救的伤痕，为广大中外游人所痛惜。前辙后鉴，特立此碑。凡登山者必须引以为戒。”这块“教训碑”同样是一块令人触目惊心的“环保碑”。

养生碑

养生，是中国历代保健方法的总称，它包括养神、养形、动养、静养、炼丹、服石等内容，主要强调生活要有节制，要有规律。三国时代魏人嵇康就著过一篇《养生论》。在这篇文章中，嵇康讨论了养生及形神关系问题，认为形与神不可分离，“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否定了生死有命说，认为人只要导养得理，便可以上获千余岁，下达数百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现代人更重视养生理论，并身体力行地探索种种养生方法。在我国台湾省有一块碑，碑旁是一条长约 30 米的鹅卵石步道，碑文内容是告诉人们脚底有哪些穴道，按摩这些穴位可治哪些毛病，碑上还刻着一幅“脚底反射区图。”这可谓是一块宣传“足部反射健康法”的“养生碑”。根据中医经络学说理论，人的脚底有穴位，按摩足部可防治百病。因为人的五脏六腑在脚掌都有其投影：大脚趾通肝脾，四趾通胆，小趾通膀胱，脚底心为肾经涌泉穴，……经常摩擦这些部位，可治脾脏肿大、便秘、遗尿、体虚肾亏、神经衰弱等病。因此，赤足在鹅卵石上慢走，可收到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奇效。据传，有人见碑自医，治愈了脑供血不足等疑难病症。因此有人戏称这种“养生碑”是“石先生”。“石先生”噪名天下，连欧美许多医界人士都来拍照、录相。

大陆上亦有同类“养生碑”。清道光年间江苏如皋出了个名医薛宝田。薛宝田以 66 岁高龄北上京城，被光绪召进长春宫，历时 44 天，为慈禧切脉 15 次，立药方 20 余，由于医术精湛，将皇太后的病治愈了。薛宝田回到家乡，百感交集，著下《症治管窥》、

《医学心悟》等传世医文。他为给乡亲父老永世造福，曾在家门口设一碑石，将《医学心悟》全部抄刻。这种“养生碑”给民间草医提供了许多医药知识，为民间百姓丰富了养生之道。日冠侵占苏北后，以修筑工事为由，挖走了这块“养生碑”。据传此碑后来偷运到日本本土。

不但中国有养生碑，外国也有。距今2400多年前的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第是养生学的开山鼻祖和运动医学的创始人，在他的诞生地——科斯岛的一座茅舍旁就矗立着一块十字架形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希波克拉第的养生理论及他的誓言，“我决不坑害患者，决不对患者做坏事，我只是一心想尽我所有的能力和判断力来利用养生法救人。”

1988年，埃及考古学家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间地区挖掘了一块公元前1700多年的小石碑，碑上刻有一份奇特的养生菜谱：以水牛、羚羊、鸽子肉为原料，用牛肉汤、羊肉汤、菜汤烹制，上餐桌前还要在菜肴上撒面包屑。此碑一直成为养生学专家研究的养生菜谱。

1990年，埃及考古学家又在阿斯旺省帝王谷中掘得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七世（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的养生秘诀。据史载，克列奥帕特拉七世聪明美貌，会多种语言，有极强的权力欲。为争夺埃及王位，她先依附于罗马统治者恺撒，成为恺撒的情妇，并与恺撒生下一子“恺撒里昂”。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政敌刺死后，她又在公元前41年与罗马“后政治三头”之一的安东尼结婚，共同生活了11年。公元前30年，安东尼因与屋大维争权夺利失败而自刎身亡，克列奥帕特拉又想以她的美丽妖艳来引诱屋大维，屋大维不为色所迷，逮捕了克列奥帕特拉。在关押期间，她为免遭游街之辱，买通了一农民，利用送无花果之机，内藏一条名叫“阿普斯”的小毒蛇，让毒蛇咬破手臂，中毒而死，年仅39岁。克列奥帕特拉素有“绝代佳人”、“一代艳后”之称，光彩照人。现

在研究一下她的养生秘诀，说不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一点借鉴作用呢。

综观天下养生碑，我们总觉得立碑者的心意远远大于碑文的价值。每块碑石都含蓄着真诚、祝福和对健康的向往。

告示碑

用碑来广而告知，我国早已有之。

在闻名全国的杭州张小泉剪刀店门首就有一块这样的“告示碑”。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清朝同治年间，张小泉剪刀已传到了第四代张利川手里，人们买剪刀都认定“张小泉”这个老名牌。这时，一些不法奸商见生产“张小泉剪刀”有利可图，竟见利忘义，干起了鱼目混珠，以假充真的肮脏勾当。不久，“张小泉”这块响当当的牌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地黯然失色。张利川看到祖宗创下的名牌砸在自己手里，又气又怒，加上多年劳累，最后一病不起，于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抛下妻子孙氏和幼子张永年命归黄泉。张利川死后，孤儿寡妇一筹莫展。一日，孙氏闷坐堂前，忽听得外面鸣锣开道，知道是县太爷束允泰的大轿过来了。孙氏顾不得多想，跑到街上当道跪下，拉起官轿喊起冤来。束知县见孙氏披麻戴孝哭声悲切，便开口道：“你有何冤情？尽管向本官道来。”孙氏便把同行假冒“张小泉”，气死张利川等等情由一一细细申诉。束允泰听罢，思忖良久，命人拿来笔墨纸砚，当即写下“永禁冒用”四个字，并命人将这四个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张小泉剪刀店”的大门口。自此，假冒之风日渐收敛，孙氏因此得以重振家业。传到张永年这一代，“张小泉剪刀”这块牌子更加响亮了。

在湖南省洞庭湖旁的岳阳楼东南面，也有一块类似的“告示”碑。这块石碑刻于清朝光绪六年，内容是告诫人们要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扰乱社会治安：岳阳楼乃游玩歇息之地，任何人“不得在此肆行喧闹酗酒滋扰，违者即拿案惩治不贷。”这块“告示碑”同样起到很大效应，以后一直演变到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的地步。

古代立于路边的“下马碑”也可看作为“告示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内“金声玉振坊”后有两块石碑，立于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8个大字，目的是为了维护孔老夫子的尊严。这一现象在封建社会里司空见惯。

但是，中国的告示碑还算不上世界上最古老的。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告示碑是在土耳其出土的刻有希腊字母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已碎成几百块。把它的碎片拼凑起来，才知道告示碑内容是：这里原有一个商店，商店里出售水果、酒、装饰品、头巾、家用大理石小神像、各类陶器。

西方人生性幽默，做生意精明至极，甚至在死去的亲人墓碑上大做文章。苏格兰一商店老板因病而死后，他的妻子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这样写的：“这里长眠的是亥米西·麦克泰维西。其悲痛的妻子正继承他的兴旺的事业——蔬菜水果店。店址在第11号高速公路上，每天营业到晚上8点。”据说，正是由于这一碑文，使她的蔬菜水果店的顾客络绎不绝，生意也越做越红火。这块碑，既纪念了死者，又表达了妻子对丈夫不幸逝世的悲痛之情，还为她的小店做了一次颇有成效的“广告”。

西方还有人在丈夫的墓碑上做征婚广告：在美国缅因州林肯市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的是：“纪念贾德贝兹。他死于1800年8月6日，他24岁的寡妇住在榆树街7号，具备一切贤妻良母的品质，而且渴望获得安慰。”这块“告示碑”，在讲究传统、礼仪之邦的中国也许要受到嘲弄。

药方碑

前边我们讲了养生碑，这里介绍药方碑。

我国最古老的药方碑，为1400多年前北齐武平时期所刻，现存距河南洛阳15公里处的龙门石窟“药方洞”内。其中有单方147帖，治疗病种37个，所选疾病均为常见多发病，如反胃、五痔、疔疮、失音不语、小便不通、五淋、霍乱、赤白痢等。用药方法简单，语言亦通俗易懂。比如治疗赤白痢方：“赤白脂五两，干姜二两，捣米，饮服三方寸七，日再，并良。”这类组方简易、取材广泛的“药方”石刻，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医学科普形式。在当时不失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陕西省耀县孙家原的药王庙里也保存着一块明朝的药方碑。此碑为明朝隆庆六年秦王朱守中所刻，碑额题“海上方”三字。“海上方”即唐朝药王孙思邈的医药歌诀。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因自小多病体弱故转而学医，后以101岁高寿仙逝。他系统地总结了唐朝以前的各种医药知识，著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二书。因他医术超群，医德高尚，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属道家，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孙真人”。道家重精、气、神“三宝”，在“海上方”碑的碑文中，就体现了这些内容：“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易役，当令饮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寝鸣云鼓，晨兴漱玉津。妖神难犯己，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常节五辛。安神宜悦乐，借气保和绝。寿夭休论本，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除此而外，我国宋、明时期的药方碑还有：立于湖北蕲春县的李时珍《中药泡制》碑，立于广西南宁宣化厅的《疗病方书》碑，

广西刘仙岩的《养气汤方》碑，广西桂林馆驿的《集验方》碑，山西五台山的《千金宝要碑》，陕西华山莲花峰的《固齿方》碑，安徽亳州城内华信庵里的《传世验方》碑等等。

我国众多的药方碑既显示了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也显示了各地医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

教坊碑

民间常将妻子与别人私通的男人叫做“龟”，认为“戴了绿帽子”或“戴绿头巾”。其源出于哪里？我们还是以唐朝碑石为证吧！

在六朝古都南京有一条闻名遐迩的秦淮河。封建社会里，秦淮河两岸茶馆酒肆林立，戏院青楼众多，是达官贵人一掷千金的“富贵地”，寻花问柳的“温柔乡”，但却是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的“人间地狱”。唐朝曾在秦淮河旁设立“教坊”。教坊本是专管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的官署，然而教坊里的歌伎，甚至是歌伎的丈夫（大都为教坊里的乐工）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她们过着一种屈辱、卑贱的生活。据清代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记载：唐朝时秦淮旧院曾将教坊规条刻于石碑上。碑文如下：“入教坊者，准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

“官妓之夫绿巾绿带”这一习俗以后竟流传下来。据《元典章·礼部服色》云：“至元五年，准中书省劄，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明朝也规定娼妓之夫与教坊乐工所戴的头巾为青色或绿色。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礼部二·教坊官》载：“按祖制，乐工俱戴青乐字巾，系红绿搭膊。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明清时还把“戴绿头巾”作为一种“惩罚”，以取笑“过失者”。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卷九中就有例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罪，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

教坊是唐朝时开始设置的，至清朝雍正时就废除了。但是，

“戴绿头巾”虽是随着教坊而产生，却没有随它而灭，而变成了一个专用的代名词。

教坊碑沿袭了几个朝代，多嵌于砖墙之间。它教导受害受辱的卖身女如何真诚接客，却没有“教”嫖客养生修道，不遭踏、调戏妇女的人生道德。教坊碑上凝聚了多少妇女的血泪！

石经碑

石经，即古代雕刻在石块上的儒家经典。碑石上刻“经”，始创于汉朝。“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诸儒生定五经文刊于石，由蔡邕书写于碑。立于太学门外，其间颇费匠心，历时八载始成。”（《后汉书·蔡邕传》）因刻于熹平年间，故名《熹平石经》。碑石共46块，每块刻35行，每行约七八十字，表里均刻字，共20多万字。从经学方面讲，《熹平石经》校正了五经文字。当时经典文字辗转抄写，发生错误难以避免，一些纷争无法解决。自从刻石以后，那些错处自可纠正，纷争自可免除。从艺术角度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蔡邕是东汉著名书法家，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熹平石经》是蔡邕用八分体书写，所以一直为书法界所重。刊刻石经，对文化传播其功至大。

我国保存最好的是《开成石经》。它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83年），成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字体为标题隶书，正文楷书，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仪》、《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等12种儒家经典著作。《开成石经》共刻碑114块，两面刻字，共计650252字。现藏于西安碑林。

石经中最奇特的要算《正始石经》，又称《魏石经》，三国魏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刊立，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三经。因碑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书写，所以又称《三体石经》。

规模最大的石经是《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始刻于隋朝，唐、辽最盛，终于明朝。共刻佛经1025种，

900 多部，3000 多卷，现藏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

施工期最长的是《广政石经》。《广政石经》始刻于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元年（公元 938 年），又名《蜀石经》。该石经从后蜀广政元年至南宋乾道六年（公元 938—1170 年），前后共经历四朝，计 232 年。但不知何故，《广政石经》突然亡佚，所以，后世记载不多。1938 年在四川省成都市老南山外发现了一些残石，字体与《开成石经》颇相近。

另外，比较有名的石经还有唐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玄宗皇帝李隆基加注并亲自书写的《石台考经》。（因四块碑石合成一台形，上面附加一盖子，故名“石台”。此碑现存西安碑林。）宋高宗赵构书写的《国子监石经》。山东省泰山石经峪里的《金刚般若经》，因属于摩崖石刻，已在他文提及，故在此不再赘述。

石经碑是我国碑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石经碑上，可以看到儒家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发展的历史。

计时碑

把时间凝固在碑石上，以纪念某些特殊的事情，这一现象古今中外都有。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突然在我东三省挑起战端。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为了让中国人民莫忘国耻，1991 年在沈阳柳条湖立了一块大理石碑——“九·一八事变残历纪念碑”。碑成台历型，高 18 米，宽 30 米，厚 11 米，大约是普通台历的 150 倍。碑正面右半部刻着：“1931 年 9 月小，18 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七月。”左半部则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的详情：“夜十时许，日本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战抗争。”

建在苏北如皋西乡贲家巷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碑”，也是一块标准的计时碑。为了让千世万代牢记住震撼国内外的一支红军的诞生时刻，碑石上刻着红十四军的建军时间——1930 年 4 月 3 日。自建碑至今，每年逢到 4 月 3 日，各界代表都要来此举行纪念活动。

唐山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后，新建的唐山市也设立了记录地震时间的计时碑。

“计时”碑在国外也相当流行。例如人类第一位太空宇航员是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他驾驶“东方 1 号”飞船，用 1 小时 48 分绕地球转了一圈，然后在前苏联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镇西南 26 公里处降落。为纪念这一亘古未有激动人心的庄严事件，当时就竖了块木碑，上面写着：“请勿移动，1961 年 4 月 12 日莫斯科时

间 10 点 35 分。”后来，将木碑换成了石制方尖柱碑，上面多了两行字：“进入太空，新时代开始。”这块航天计时碑，是全人类的骄傲。

画像碑

画像碑，即在石碑上雕刻画像。我国画像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 1800 多年的东汉时期。

在山东省济宁西城门曾出土了一块高 1 尺 4 寸，宽 6 寸 7 分的石碑。此碑正面字迹已漫漶，但仍可见“永建五年”字样。“永建”是东汉时顺帝刘保的年号（公元 126－132 年），“永建五年”即公元 130 年。碑背面刻有“孔子见老子画像”。这大概可算是我国最古老的一块画像碑。在山东省嘉祥县也有一块“孔子见老子画像”碑。碑是嵌在石壁上的。从题记中可知，此碑成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碑石上的孔子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老子谦和朴素，谈笑风生。线条虽然简朴，但形象栩栩如生。

这两块画像碑，不仅都见于山东，而且竖碑的地点均为“食堂”。

北朝是画像碑的鼎盛时期，现流传于世的也很多。如陕西省澄城县北寺村造晖福寺《三级佛图碑》，系北魏太和元年（公元 476 年）刻；西安碑林的《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姚伯元造像碑》，均是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刻；四川省简阳县的《强独乐为文王造像碑》，系北周明帝元年（公元 557 年）刻；陕西蒲城县的《圣母寺四面像碑》系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刻；河南省偃师的《韩永义等造五佛像碑》，系北齐王统三年（公元 567 年）刻。北朝的画像碑与东汉画像碑不同之处在于北朝的像多为佛像。（当然，画佛像并非从北朝开始，而是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所创。）这与北朝统治者积极扶持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道武帝拓跋珪“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接着，明元帝

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等均信奉佛教。最近，在山东临朐县发掘出150尊石佛像，据考证，这些佛像碑均刻于北朝北魏建明年间至东魏武定年间，这是至今所见最大画像碑群。

造画像碑的目的因人而异：有子女为先父母造的，有妻子为亡夫造的，也有父母为夭折的儿子造的，还有“愿国祚永隆万代”、“愿主上万祚，臣子尽忠，后宫皆润”等，不一而足。画像碑中的佛像中又以弥勒佛像较为普遍。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是“贤劫”中第五个佛。弥勒出世时，将会到处充满光明，人民丰衣足食，欢乐幸福。所以，人们在塑造弥勒像时，把他想象为一个面目慈善、和蔼可亲的智者。

不仅民间百姓喜爱弥勒佛像碑，贵至帝王将相者也同样如此。唐高祖李渊为郑州刺史时，儿子李世民有病，为祈祷其病愈，在河南省荥阳县大海寺内造了一尊弥勒佛像碑。现在寺内珍藏的一块刻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高1尺3寸，宽2尺的石碑上就详细地记载着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画像碑在北朝时绘刻的对象基本为佛像。但以后，这一固定体式逐渐被人们演化，而代之以其他一些名人像。在陕西省麟游县有刻着唐朝开国功臣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画像的石碑；广西省宜山县城的一块碑上雕刻的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自画像。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人称山谷先生，江西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曾举进士，任过国子监教授、国史馆编修、神宗实录检讨官等职，和秦观、张来、晁补之齐名，并称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一生坎坷，屡遭诬陷贬谪。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被贬到广西宜州（今宜山县）羁管。第二年，黄庭坚病逝于宜山的小南楼。黄庭坚生前画有一幅自画像。画像上方有友人题的诗：“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因黄庭坚平时口碑颇佳，所以，在他死后，宜山地方人士捐建了一座“山谷祠”，并将黄庭坚的这幅自画像和友人题诗刻制于碑，镶嵌在祠

内的墙壁上。

除此而外，我国还有不少画像碑。如安徽省当涂城东南 8 公里青山脚下谷家村“太白祠”里有《李白像碑》，扬州史可法纪念馆有抗清名将史可法的画像碑，镇江法门寺有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画像碑等。

画像碑中，我国山西省浮山县老君洞里有一套十分珍贵的连环画碑。这一套画像，共 81 幅图，刻在 39 块黑玉石上，内容与老君得道成仙的经过。根据碑文可知，这套世所罕见的连环画碑，刻于明朝嘉靖年间，真可谓我国连环画艺术事业的始祖。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画像石和画像砖。

画像石、画像砖有别于画像碑。画像碑主要刻佛像或死者的画像，而画像石、画像砖所涉及的内容就广了。它们可画死者像，如江西省赣州市郊章江南岸狮子岭，有距今 1900 多年东汉早期的画像墓砖，画的是墓主召见伏地拜谒的臣属，后有佩剑的侍臣和跪地执扇纳凉的侍女，两旁站着佩刀执戟的侍卫。但画像砖、画像石更多的是表现一些历史故事，如山东曲阜孔庙里有汉画像石刻《周公负扆图》。周公名姬旦，以贤德著称。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幅周公像。湖北省神农架地区发现了人身牛首砖雕。据《帝王世纪》称，蟜氏族女儿与少典氏族男人结婚，生下了炎帝，即人身牛首的神农氏。这一画像砖印证了历史的古老传说。

将一些神话故事刻在砖石上的也不少，如汉画像石，画像碑中有“羲和捧日”、“女娲捧壁”、“羽人飞廉”、“羿射日”、“三足鸟”等内容。河南省新野县城郊任营村还发现了东汉中期的“杂技”画像砖，山西省新绛县发现了金末元初的“杂技”、“杂剧”画像碑，内容十分丰富。

因砖质地较石松软，所以，在砖上雕刻的内容比石上更多。云南保山县郎义乡龙溪山东麓发现了东汉时的纪年砖，上刻“中平四年吉”字样，字体为汉隶。“中平”为汉灵帝年号，“中平四年”为公元 187 年。东溪山还有纹饰砖，上面刻有棱形五铢钱、芒

穗、果叶、卷草等图案。湖北省沔阳有隋代纪年砖。还有的砖上刻的是买地的契约，然后埋入地下，以作凭证。如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有一块太和元年的“地券”砖，上面还有“各不得变悔”的警告语。有的砖还被雕刻成空心画像砖。河南省新郑县辛店乡山水岩沟里有200多块汉代空心画像砖，内容有“风阙楼阁”、“铺首衔环”、“玉兔捣药”、“凤凰展屏”、“轺车出行”、“骑马小吏”、“双龙交壁”、“武士赛牛”等。据报载，河南还发现了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阴刻彩绘空心砖，这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陕西省乾县在秦梁山宫、甘泉宫遗址上发现了龙凤纹空心砖，状若交合，这也是我国其它地方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画像碑不同于其他碑石，既有纪念、追思的价值，还富有艺术鉴赏的特殊功能。画像艺术纯属人物素描，能在粗砖顽石上刻划人物个性、人物特征，画师固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雕刻匠没有特殊的艺术天才，亦不能展示画师的艺术。这种艺术品已引起好多国家美术家的重视。西方美学家格罗塞就指出：“东方人物绘画的基础，应该公正地说源自中国的画像石碑。”

植物碑

在石碑上镌刻的植物图案，最多的是翠竹。古人常云：松、竹、梅岁寒三友。竹不畏严寒，傲然挺立，颇有“气节”，所以，一直被文人墨客所吟诵。苏东坡云：“居不可无竹，无竹令人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就是其中一例。

传说三国时期的关羽擅画竹，在《解州志》、《耕砚田斋笔记》等方志笔记中都有提及。曹操亦曾命人将关羽所画之竹图刻石立碑。此说是否确凿，有待考证。但现河南省嵩山少林寺大雄宝殿东厢房内确有一块《关帝诗竹图》碑。此碑刻于明代弘治二年（公元 1489 年），画面上为两枝挺拔的秀竹，别出心裁地以叶子构成一首五言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此图以竹喻人，用竹叶构成文字，将诗、书、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四川省奉节县白帝城明良殿内有一块高 100 多厘米，宽 70 多厘米的植物碑上也刻着三枝苍劲的秀竹，取名为《丹青正气图》，这是清朝光绪年间浙江文士曾崇德游白帝城时有感而作。三枝秀竹，寓三国时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事。碑上还刻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各一首。五绝：“不谢东篁帝，丹青独自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七绝：“异姓同胞远俗氛，明良遇合际风云。盘根错节难磨灭，千古英雄让此君。”

陕西省西安碑林里有一块与其类似的“风竹碑”，风吹竹动，远近分明，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山东省曲阜孔庙内有块珍贵的汉碑，名《小𠂤之胄等字残碑》。因碑面刻有“竹叶”，故又名“竹叶碑”。

最奇特的竹碑在四川省仁泰县黑龙滩风景区唐宋文化遗址内。那里有两块光洁无痕的石碑，但用水泼于碑上，右侧石碑顿显数行雄劲端庄的楷书大字，左侧即见一幅神韵飘逸的墨竹图。待水气消尽，原清晰可辨的字与画又隐入碑中。传说这两块石碑上的字与画，均出自宋朝名士文同之手。文同，字与可，是大文学家苏东坡的表兄，当时有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散文家。文与可曾任仁寿县刺史。据仁寿县志记载："与可镌怪石墨竹于此，无墨迹与雕刻痕，用水涤石，点画犹新。"这一现象千百年来一直是难解之迷。

石碑除可刻竹子外，还可雕刻其他一些植物图形。山东曲阜孔庙内有一块"楷碑"，上刻一棵古老的楷树。相传，孔子死后，众弟子纷来奔丧，其中高足子贡将一棵楷树苗栽于其师墓旁。据刘献廷《广阳杂记》："楷木，即今之黄连头树也。楷有瘿，可以为器。"世间一直以楷树枝干疏而不屈，而赞颂其性格刚直。子贡植楷树的目的同样是赞扬孔子的美德。这株楷苗后成大树，但不幸于清康熙年间遭雷火焚死。后人只好将其枯干刻于石上以留千古。另外，北京福田公墓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和他的两个福晋的墓碑，碑文是溥仪弟弟溥杰用桃叶形书法所写。有趣的是，香港因痴情而自杀的演员翁美玲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也刻着她生前喜欢的玫瑰花，还刻着亲人的无比悲痛的散文诗："没有你的存在，家里是多么冷落。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不一样。假如我们能使你再生，全世界就宛如天堂。"

植物碑国外也有。最近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安葬在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黑色花岗岩墓碑上除了刻有"理查德·尼克松 1913—1994"及"历史给予的最高荣誉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赞词外，还在他的名字周围镶上 24K 金的树叶。

日本有一些墓碑正面的基座上有一个圆形图案，那是日本人家族的标志——家纹，相当于中国的家徽、族徽。家纹的图形以植物纹样为主。如天皇家是菊花，山澄家是牡丹，德川家是葵，高

桥家是竹，酒井、稻垣、松坂、濑谷等家是桐叶，……。

植物碑，特别是古代的植物碑，给我们植物学家留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当然古人以物抒情，未必想到了这一点。

戒　碑

民间的戒碑，一般有戒赌和戒酒两种形式。

我国各朝各代都提倡戒赌。四川省广元市有块《戒赌碑》，刻于清朝，碑上方刻“禁止赌博”四字，碑文有“此弊不除，终遭其害，有乱于风俗，招赌之家，勿图小利。地方净，弟子贤，各务正业，岂不美哉”等语。四川峨嵋山下的小家村也有一块宣统年间竖立的戒赌碑。据说，小家村里家家赌。宣统三年因聚赌闹事造成格斗砍杀，死三伤十，此事引起衙门重视，故立戒赌碑示众。碑文有“凡贪赌者，一经查明，必斩手！”湖北省通山县大塘镇公路边有一块墓碑，碑上是几行正楷：“此人嗜赌数月，输钱数千，于公元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一索悬梁。翌日，母亦自尽。呜呼！去者已矣，来者戒之！”碑上未留死者姓名，可能有碍后代情面，但立此碑者的心情可想而知。

戒酒也有碑石。就在武松打虎的阳谷县景阳岗脚下，立有一块青石，上面写道：“三碗不过岗，乃是因峰崖有虎狼，壮胆之言。尔今非与昔比，劝君少饮或不饮酒，否则醉倒景阳岗，美事不美也。”笔者 1981 年在此一游，见此碑石立于一酒家门前，颇为奇突。店老板侃得头头是道：“我卖酒岂有不想游人多喝之理？但是有些酒徒，借题发挥，喝得醉如烂泥。三年中，醉死岗岭者有，跌伤者有，无可奈何，只好立碑劝戒。”

明朝万历十五年五月，一位姓陈的都察史在巡视时发现待处决的 1000 多名犯人中，有不少是因酒醉而杀人的。因此，他发布了戒酒令，并将这一命令刻在石碑上。这一《戒酒碑》现珍藏于四川省渠县历史博物馆。

现代戒酒碑颇为罕见。但据报载，1992年云南泸西县农业银行为信用社女青年赵丽琼立了一块墓碑。碑文是："因公宴逝世的赵丽琼同志之墓。"赵丽琼是在单位宴请客户时，因超量饮酒中毒身亡的。这块墓碑，与其说是悼念死者，还不如说是戒训后人。

谈起戒酒碑，这里记述两则外国的趣闻轶事。

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叫塔希提岛。该岛一直被波马勒王朝所统治，1842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名为"保护国"，实为法国在海外的领地。塔希提岛末代国王是波马勒五世，此人酷爱饮酒，特别喜欢法国的葡萄酒。因此，1891年，波马勒五世弥留之际，他给塔希提岛上的法国当局一份独特的遗嘱：希望用法国的葡萄酒瓶来装饰他的坟墓，以表示他死后也有美酒陪伴着他。结果，法国政府不仅同意了他的这一荒诞可笑的要求，而且将他墓前的石碑也建成了葡萄酒瓶的形状。

无独有偶，德国莫特菲亚斯贡市有个主教叫约翰·弗格贾，也与波马勒五世一样，嗜酒如命。他在临死之前，也留下了一份类似的遗嘱："请在我的墓碑上，一年四季放上装满美酒的酒桶，这样，我的身体就会永远浸在美酒的清香里了！"为了实现这一遗愿，约翰·弗格贾主教，还把大量的黄金赠给了莫特菲亚斯贡市政府。

记灾碑

碑，可用以记功、记罪，亦可以记灾。历史上发生过大的天灾人祸以后，往往会立碑纪念，以告后人。

清光绪三年，山西发生罕见的灾荒。从现存一篇碑文上可见当年的悲惨景象："丁丑大荒记——昔圣门论政，以足食为先，盖以食为民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理固然也。是人之得免于凶年饥岁者，当以耕九余三，耕三余一准王制为常经焉，不然则救死亦不瞻矣。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给微雨，麦微登，秋禾出无，岁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先时，麦市斗加六，每石粜银三两有余，至是，每石银渐长至三十二两有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城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金属木器，每斤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之室亦无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肉，又有贷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较之易子而食，析骨以炊为尤酷。自九十月以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道殣相望，行来饿莩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惕，涕泗啼泣而已。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也。虽然皇上赈贷频加，粮税尽蠲，而村庄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虽曰天灾，抑亦人之未预备乎旱也。大荒至今已六年矣！比岁丰隆，人少苏，村众欲志，以垂戒后世，首

事属余以记之。余素拙，笔墨不文，略将事之颠末，书诸贞珉，俟后之览者，将有感于斯，以足食为先务，而凶年免于死亡则幸甚。”

现代记灾碑与古代记灾碑略有不同。现代记灾碑在记述了灾害的同时，还会加上抗灾人名或他人支援的情况。1976 年，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伤 24 万人，损失巨大。竖于唐山市中心的地震纪念碑就刻上了唐山人怎样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废墟上重建新唐山的情景。1988 年，我国遭受特大水灾。国际上不少友好国家、人民纷纷解囊相助，帮助受灾地区的群众重建家园。浙江省嵊县有一块纪念碑就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公元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湖头村遭受特大洪水，毁房 430 间。经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人民政府、社会各界赈济，灾民奋力自救，百日内建成此新村。”据报道，当时捐款国家达 30 多个，捐资 2000 多万美元。

1971 年 7 月 21 日，江西上饶县近郊太平庄突然遭龙卷风侵袭，损坏房舍近百间，死三伤十，造成许多人远离家园，落荒逃难。后来由当时的“支左”部队和“革委会”发动救灾抗灾大会战，在不到一个月内，家家搬进了简易的新屋，并且领到了救济金和粮食。全庄男女老少为了感谢人民解放军，在庄前立碑。碑后记述灾难情况，碑前刻写着“军民同心，抗灾胜天”八个大字。

中外的记灾碑均大同小异。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两条河流汇合的峡谷中，竖着一块记灾碑，上面写着：“1969 年 8 月 20 日，‘佳美’飓风袭击本区，瞬时天昏地暗，狂风暴雨，降雨量在 5 小时内超过 630 毫升，随之山洪暴发，冲毁公路路基，900 多座建筑倒坍，百余座桥梁冲坍，114 人罹难，37 人失踪。维吉尼亚州历史纪念路碑委员会。”这一碑文较我国古、现代记灾碑记录似乎简略得多，虽无多少生动的描写，但灾难带来的巨大损失通过具体数字，使人一目了然，同时启示人们，要教育后代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以防止大自然各种灾害的发生。

巨字碑

在我国的许多风景名胜地，有许多巨字石碑，既显得气壮山河，又技艺独步。如浙江普陀山的“心”字碑（7×5 米）；广西阳朔的“带”字碑（高 6 米）；贵阳黔灵山九曲径的“虎”字碑（高 6 米）；山东青州六门山的“寿”字碑(7.5×3.7 米)；北京白龙潭万福山的“福”字碑（10 米见方）；四川潼南县大佛寺的“佛”字碑（7×5 米）等等。

巨字石碑中，最富文化意境的要数四川眉山县的“连鳌山”三字石碑（每字 4 米见方）。据考证，这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苏轼年轻时代的笔迹。苏轼 17 岁那年中秋，与弟苏辙及学友等共 5 人游连鳌山。苏轼乘着酒兴诗兴，挥毫拨墨，写下了“连鳌山”三个大字。这三个字正看象一座冲天巨峰，刺穿云海；左看象明月行星，浑然娇美，神姿百出；右看象大潮汹涌，气势非凡。这块巨书石碑，被已故著名画家刘海粟赞为“中华书法之魂”。

巨字石碑中，最古老的是浙江仙居县长老山的魏体“佛”字碑（120 平方米），至今已有 1400 年历史。由于人迹罕至，此字湮于荒草丛中，史书上不见记载。直到不久前进行文物普查，才使之重见天日。

巨字石碑中，最年轻的是刻在山东邹县峄山上的“鳌”字碑。此字系 1989 年春，由书法家杨萱庭挥 70 公斤巨椽所书。有关部门请了 30 名工匠，历时半年，一锤一凿地镌刻而成。施工过程中，耗用钢钎 1000 公斤，排出石渣 25 立方米，刻好后用 125 公斤红色油漆涂字。这个“鳌”字到目前为止是我国最大的单个石刻字。

它高 15 米，宽 8 米，最粗的笔划宽 1.3 米。在该字的前方 10 多公里处，就可以清楚地读到它。

以山作碑，可说是我们时代一大创举。山东日照市已将书法家孙鑫先生的巨书“日照”二字，镌于日照北郊山峰上，高达 70 多米。这才是我国最大的巨字石碑。

人　物　篇

音乐家纪念碑

大凡名人的碑，与死者生前的职业或者成就往往都有内在的联系。著名音乐家的碑通常与乐器、音符有关，中外均是如此。

我国国歌的曲作者聂耳（1912—1935年），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从小爱好音乐创作，擅长小提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而逃亡日本。同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浩海滨游泳时溺水而死。聂耳生前创作的《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国人喜爱。因此，聂耳逝世后，人们在他的家乡昆明西山滇池旁建了一座颇具匠心的坟墓——造型犹如一把小提琴。墓穴就位于琴盘上的发音孔处。墓道为琴颈，设有7个花台，象征7个音阶；墓道上还有24级台阶，象征聂耳只活了24岁。晶莹的黑色墓碑在琴盘顶部，正面横书“人民音乐家聂耳”7个大字，背面是郭沫若的题词：“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与其国歌并寿而永垂不朽。”

苏联歌曲《喀秋莎》50年代流行于我国。歌词大意是：“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的爱情永远属于他。”这首歌写于1938年，词作者是伊萨科夫斯基。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妇女们唱着这首歌，依依送别亲人上战场；士兵们唱着这首歌，以抒发他们怀念家乡的深情。这首歌很快风靡全苏联。因此，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第一次使用火箭炮时，就把这种威力

很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火箭炮命名为“喀秋莎”。为表彰伊萨科夫斯基的这一卓著贡献，伊萨科夫斯基家乡的人民自愿出资建起了一座丰碑。碑为一球形巨石，石上嵌一块金属牌子，上刻《喀秋莎》前两句歌词。石旁是一座造型为竖琴的木杆。这一座奇特的碑，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个音乐家的一首歌曲而建筑的纪念物。

著名的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墓碑更是别具一格。西贝柳斯(1865－1957 年)是芬兰人民的骄傲。他的一生创作了 100 多部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有艺术独创性的好作品，特别是帝俄统治时期，他的交响诗《库勒伏》等音乐更是脍炙人口，有力地鼓舞了芬兰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所以，芬兰政府在首都赫尔辛基替他建造了一组纪念碑：前面是大理石的西贝柳斯头部巨雕，稍后是由数百根长短不一的不锈钢圆管组成的一架大型“管风琴”。当微风吹入或用手轻轻叩击钢管时，“管风琴”就会发出悠扬动听的音响。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浮想联翩：西贝柳斯似乎依然在创作着，用他的音乐欢迎着远方的客人……。

而德国现代著名钢琴演奏家勃拉姆斯的大理石墓碑上仅刻了一个圆圈——休止符。这是遵照勃拉姆斯的遗嘱而如此镌刻的。勃拉姆斯在弥留之际还曾安祥地嘱咐他的学生：他逝世后，不要发表“公式化的悼词”，葬礼不要刻意追求形式，不要一味讲究豪华。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音乐大师的豁达胸怀。墓碑上的那个圆圈，既是乐章中的休止符，又意味着生命到此嘎然而止。只不过这个圆圈被勃拉姆斯的学生镀成了金色，它象征勃拉姆斯已走完了人生旅途，到达了一个辉煌的终点。

尊师碑

世间流传着很多动人的尊师篇章，这里记叙的仅是镌刻在墓碑上的几则小故事。

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927年3月3日凌晨5时30分逝世，葬于浙江省崂山县李林之南枣儿山，现已移葬到青岛市郊浮山南麓。墓两侧是6株高大的龙柏，象征着在戊戌变法中献身的“六君子”。墓前竖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碑正面的“康有为先生之墓”7个大字和背面的碑文，均为正楷金字，是著名画家刘海粟所撰。刘海粟20年代在上海曾被康有为收为弟子，所以，他在碑文里这样深情地写道：“公生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吾铭公兮历桑海；文章功业，彪炳千载。”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人又称“康南海”，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就是首句“公生南海，归于黄海”的意思。第二句讲的就是指刘海粟拜康有为为师一事。写这篇碑文时，刘海粟已90高龄，恭敬之情真可谓溢于文外。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且第一个把西洋油画和音乐传到中国的是著名学者李叔同。李叔同（1880—1942年），名文涛，别号息霜。李叔同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看破“红尘”，于1918年到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的为人为文，给他的弟子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他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圆寂后，弟子们在泉州清源山上替他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墓碑。碑是白色花岗石的，形状好似北京天坛。正面刻有李叔同的遗像，一侧刻他赠弟子们的遗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

千里。问余何适，廓尔无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说起李叔同的这幅遗像，还有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在李叔同众多的徒弟中，有一个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漫画家的丰子恺。丰子恺听到老师辞世的消息，哀痛不已，整日以泪洗面。于是，他把悲伤的泪水聚集起来，用之研墨，精心绘制了这幅画像。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中只为一个普通人写过碑文，获此殊荣的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湘西保靖县葫芦寨的袁吉六先生。1913年，袁吉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毛泽东是他教的预科第一班学生。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第一师范，袁吉六又是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直到1918年毕业，为师达5年之久。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交谈中这样说起自己的老师：“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吉六于1932年4月卒于湖南新化县戴家凼“山斋”。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原湖南省省长王首道，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酌给津贴米若干供养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贞。1952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拨冗挤繁，亲笔恭书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以此缅怀老师，表达自己的尊崇和哀思。此碑现立于湘西保靖县城北袁吉六先生纪念亭内。

爱情碑

“痛苦的死亡不能将爱情割断”，这是德国著名军事家、《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刻在他夫人玛丽墓碑上的一句话。像这样的爱情碑我国古代和现代都有。

宋朝著名女词人朱淑真的丈夫是个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自从结婚以后，二人经常天各一方。这对感情细腻而丰富的女词人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心中无限愁苦。一次，她给丈夫寄了一封奇特的信，信中画了许多圆圈，并附了一首《圈儿词》：“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单圈是我，双圈是你。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月缺了会圆，月圆了会缺。我密密加圈，你密密知我意。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情，一路圈儿圈到底。”朱淑真死后，后人根据这首词的含义，在她的墓碑上刻了两个月牙形的图案和个数不等的一行行圆圈，并把这首感人至深的《圈儿词》也刻在碑上，使得这个动人离奇的爱情故事永远在人世间流传着。

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的墓碑，现立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畔葫芦小岛北部的锦秋墩。这是因为他生前曾说过：“军阀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只有荒僻的陶然亭干净。”高君宇一生为革命东奔西走，积劳成疾，1925 年逝世，只活了短短的 28 年。他曾与当时著名女诗人石评梅相爱，二人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多次来陶然亭约会。因此，对高君宇的死，石评梅十分悲痛。她替高君宇立了碑，并手书了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

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在你坟头，直至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高君宇、石评梅二人献身革命，忠于爱情的高尚情操，激励了不少有志的青年人。所以，1956 年 6 月 3 日，周恩来在谈到高君宇、石评梅的墓碑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感恩碑

孔丘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人:汉朝元始元年封为褒成侯，隋朝封为邹国公，唐初封为褒圣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为文宣公，宋仁宗圣和二年（公元 1055 年）封为衍圣公，1935 年，国民党还封之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后裔也因此大沾其光，有的封号如“文宣公”、“衍圣公”，还可以子孙世袭。

但是，在唐朝末年，孔氏家族里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唐末，由于社会动乱，孔子的 42 代孙孔光嗣在天祐二年（公元 905 年）只被任命为泗水主簿，失掉了“文宣公”的爵位。至五代后梁乾化三年（公元 913 年），孔光嗣被外孔守灵户孔景的孙子孔末杀死，孔末取而代之。当时孔光嗣的儿子孔仁玉生于“甫九月”。孔光嗣之妻张氏系曲阜城北绅士张温如之女。张氏将孔仁玉抱回娘家藏匿起来，二人方幸免于难。后唐长兴元年（公元 930 年），有人上书皇帝，言曲阜县令孔末不是孔子的嫡裔，真正的孔子嫡裔、43 代孙孔仁玉已经 19 岁了，躲藏在外祖父家。唐明宗获悉，当即下令诛杀孔末，由孔仁玉主持孔子祀事，并任曲阜县主簿。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又加封孔仁玉为“文宣公”。孔仁玉之后，孔子一族子孙繁衍。孔仁玉被称为“中兴祖。”

在这场变故中，张温如一家冒着性命危险保留了孔家后代，功劳很大。因此，孔氏后人对张家一直感恩戴德，并多次立碑追念这件事情。清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孔子的 73 代孙孔庆镕就在《感恩碑》中大发其感慨：“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是不独身受者怀其德而不可忘，即为其子孙亦不可忘。念我中兴公遭孔末变，匿于外祖张，俾不绝如线三统，历

千百载而长存。此其德之广厚何如哉！前人感其德而思慕之，为之勒石表扬，为之设祭立祠，为之蠲免差徭，其所以报本酬恩已备矣。”这三个“为之”都是孔府对张氏家族的特殊优惠政策。这正应了民间俗语“有仇的报仇，有恩的报恩。”作为出自诗书礼仪之家的孔子后代，当然更应如此。

近代立感恩碑的就更多了。学宫、祠堂、衙门内，处处可见。有子报父恩，女报母恩，学生报老师恩，逃难者报搭救者之恩，平民百姓报清廉命官之恩。当然也有奉承阿谀，升官发财了，报上司之恩的。

宣统三年，靖江县出了一起类似“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后来换了一名姓杨的知县明镜高悬，为受害者赵姓女子平反昭雪。赵姓女子虽然家贫如洗，但为报知县之恩，将破房拆卖，积聚了些钱，买了一块大青石，立于“丰水桥”桥头，碑文为“包公再世，恩重如山，谢知县大人。”岂知为了这寥寥数语，她无屋可居，住了几年桥洞。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媒介的现代化，报恩者可以通过报刊、电视、电台鸣谢，以示感激，不需要立碑颂赞，“感恩碑”基本上已成为历史的遗迹。

海外华人碑

在国外有一些与中国人有关的石碑，或是当地政府为纪念中国人而立，或是中国人为当地政府而立，或是当地华侨为华侨而立。

最早的海外华人碑，是墨西哥的《大齐田人之墓》。西周春秋时，齐国国君本姜姓，齐景公时，贵族田恒子用大斗贷出，小斗收进的办法笼络人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481 年），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及右相监止，从此，田氏执齐国国政。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 386 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国君，姜齐遂为田齐所取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氏代齐”的故事。但是，以后田齐曾两次被打败而亡国。一次是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韩、楚、燕、赵、齐、魏六国，统一中国；一次是公元前 206 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再次统一中国。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时，齐王田横杀了汉使者，而恐汉王追究，就带了部下 500 人逃往海岛。后来刘邦赦其罪，召田横来都，但是，田横行至洛阳郊外时，耻于称臣而刎颈自尽。随同田横逃往海岛的 500 名壮士仰田横之德，全部殉节。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名作《田横王五百壮士》即以此为题材。据 1981 年 2 月 5 日《人民日报》载，齐人供奉“且”字形祖先牌位，而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亦颇盛行。这大约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很有可能是一些齐人后代逃到墨西哥，将这一习俗传给了印第安人，问题是这些齐人何时去墨西哥的？通过什么途径去的？这都是些难解之谜。

海上丝绸之路上也有华人碑，其中文莱的一块立于公元 1264 年，碑上大字为“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小字为“景定甲子男应

甲立”。“景定”为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理宗的年号。公元1264年当为“景定五年”。斯里兰卡的一块立于公元1409年，明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所立。碑上书泰米尔文、波斯文和中文三种文体。内容是明朝皇帝对佛陀的敬献，送香礼清单。此碑现存科伦坡国家博物馆。

美国有三块较为著名的华人碑。一块在哈佛大学老院内图书馆旁，石碑高10英尺，重20吨，是1936年在庆祝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之际，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献给母校的。据资料记载，石碑的揭幕仪式是1936年9月17日在哈佛老院举行的，碑文由当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的中国哈佛同学会会长刘瑞恒的秘书许先生用文言文撰写，以刚劲秀丽的楷书镌刻在碑体上，共370字。虽几经风雨，现碑文依然清晰。右首行题为《美国哈佛大学300年纪念记》，末行为“西历1936年9月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全体同仁敬立。”据专家鉴定，这块古碑在1936年时已有300年历史，原是明朝崇祯年间的产物。第二块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那里有一座高达550英尺的纪念碑，是纪念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有世界各国赠送的188块碑石，其中有1块中文碑石，碑长方形，高1.6米，四周是花卉、树木及人物浮雕。碑文书法工整挺秀，全文如下：“钦命福建巡抚部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胜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留武功，迹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魄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美利坚合众国，幅员万里，不设公候之号，不循地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悬立石，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咸丰三年”为公元1853年。第三块碑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建于1964年。碑上刻“华人先驱，功

彰绩伟；开碾筑路，青史名垂”16 个大字。这是纪念 18 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工在建筑太平洋铁路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加拿大也有两块纪念修筑太平洋铁路中华工贡献的石碑。一在多伦多市士多巴丹拿大道市立公园入口处，一在耶鲁镇，当时在加拿大修筑铁路的华工达 17000 名。加拿大首任首相麦当奴曾赞扬说：“如果没有华侨的巨大努力，太平洋铁路则无法完成，加拿大西部资源也无从开发。”这两块“中华铁路工人”纪念碑是中加两国友谊的见证。

古巴首都哈瓦那利内亚街北道有座二丈多高的“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念碑”。黑色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冈萨语将军的题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该碑建于 1931 年，是为了纪念和表彰古巴华侨在 1868－1895 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在古巴至今还流传着华侨兰伯金、何丹桂、胡德、谢安、李金刀等烈士的英雄业绩。

马来西亚的打根和菲律宾马尼拉有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分别建于 1947 年和 1979 年。前者是为了纪念在抗日中牺牲的中国驻打根领事卓还来烈士，碑文为“卓故领事还来公被害纪念碑”；后者是为了表彰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 150 多位华侨烈士。

以上这些海外华人碑，都凝结了我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珍自重、自爱自信的高尚品质和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气概。

异国使节碑

历史上我国与外国有不少的友好交往。有官方的，如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有民间的，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外国也有使节来中国。双方通过互派使节，密切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人民之间的感情。不幸的是，有的使节经过万里跋涉，或积劳成疾，或染重病，最后竟客死他乡。

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乌龟山南麓有《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碑为青石质，通高4米，宽1.09米，厚0.3米。碑文系阳刻楷书。浡泥国，现名文莱达鲁萨兰国，地处加里曼丹岛北部，是一个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与我国的通商交往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双方也有过友好的往来。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国王马哈漠沙曾几度遣使来南京朝贺。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八月，年仅28岁的麻那惹加那乃国王偕王妃、子女、亲属和臣子150余人远涉重洋，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热情接待。一个月后，国王忽染急症，十月病故。病逝前，麻那惹加那乃国王遗言："体魄托葬中华。"于是，明成祖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用隆重礼节葬国王于石子岗，立碑追谥为"恭顺王"。事后，明成祖还派中官张谦护送其妻子回国。

山东德州市北郊有古苏禄国东王墓碑。古苏禄国位于菲律宾苏禄群岛。公元1417年，古苏禄国东王率340人来华，访问27天，10月5日返回，行至德州，患病去世。明永乐皇帝朱棣按中国王制为其营造墓室，并亲撰了碑文。

浙江省兰溪县北郊一里坛岩山乡后地村有琉球国使节舆力向

墓碑。琉球国即今日本冲绳县，舆力向为当时首里府人，岙滨地方奉行官。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舆力向受天王派遣，来中国进贡。他从福建登陆，进入浙江，循大运河北上，途经兰溪时患病，卒于驿馆。清朝地方官将舆力向礼葬于邑厉坛（一里坛），且立了墓碑为志。

江苏省淮阴王营镇东南同兴村二组有块高1.14米，宽0.58米的墓碑，这也是纪念琉球国一位使节的。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郑文英率172人来我国朝贡，一行人在福建泉州登陆。因航行途中不适，郑文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在王营镇病情加剧而亡。去世后，清政府为其竖立了墓碑。碑文上款："公以乾隆五十八年奉使来贡，十一月十四日道卒葬"。正中书"琉球国朝京都通事讳文英郑公之墓"。下款为"此原石半缺，民国二十五年重立。"

异国使节碑在国内虽属罕见，但从以上几例中，可见中国人民对友好国家使者是多么的尊敬和爱护！

埋入地下的墓碑

墓碑是立在坟墓外面的。随死者的棺木一起埋入地下的叫墓志。但是，也有埋入土中的墓碑——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李大钊烈士的墓碑和毛泽东祖父的墓碑就是如此。

李大钊（1889—1927年），河北乐亭人，字守常。李大钊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1915年初，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的斗争；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19年参加并领导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次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二至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对这样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敌人早就恨之入骨。因此，奉系军阀张作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27年4月6日，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内逮捕了李大钊，并于当月28日在北京残酷地杀害了他。李大钊的灵柩先存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1933年4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李大钊的子女等数百人将其安葬到香山万安公墓。墓前的碑文包括名字、生卒年月、子女姓名等，是当时北大教授刘半农所写。其实，随灵柩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的上首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图案：五角红星呈凹形，中间凸形是黑色的镰刀斧头。碑正面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11个大字，背面碑文有300多字，高度评价了李大钊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全文如下：“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于肆（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八十多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二十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落款为“一九三三、四月念三，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这块墓碑埋在地下整整 50 年。1983 年初，党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建李大钊烈士陵时，才挖掘到了这一珍贵的文物。而今高耸于李大钊烈士墓前的石碑碑文是邓小平同志于 1983 年 4 月 1 日所书，一排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毛泽东祖父的墓碑也曾埋入地下。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军阀何健派特务去韶山，打算掘毛泽东家的祖坟，进行反革命报复，妄图以此愚蠢举动来扑灭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当韶山的群众得知这一消息时，大家马上采取了行动，将毛泽东祖父的墓碑埋入滴水洞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另修了一座假坟以欺骗特务，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毛泽东祖父叫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其墓碑长约 1 米，宽 0.4 米，碑文为：“中华民国元年交月吉镌，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内辛山外戌山男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毛泽东的父亲），孙泽东泽铭（民）泽淋（覃）敬立”。

凡埋入地下的墓碑，都有其特殊原因，或因白色恐怖，逃避敌人的报复；或因死者基于隐私，不便公开身份，留待后人追认等等。

据传金陵名妓董小宛顺治九年 27 岁时死于肺痨，被其夫冒辟疆葬于如皋龙游河畔，按冒氏年谱记载，当时虽刻有悼念碑文，却随棺埋于地下。其原因考证有二，一是董小苑入冒家为妾，却因

其身份及经历有碍冒府颜面；二是尸体入土有金银首饰陪葬，深怕不得安宁。文史人员一直想寻找董小宛的确实葬点，可惜至今还未如愿。

供奉在家的墓碑

墓碑一般竖于坟墓前，但也有特例，著名女影星王莹的墓碑则是被其家人供奉在家里。

王莹的名字在解放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初被人们誉为“民族之花”。抗战初期，她勇赴前线演出，1939 年还随中国剧社赴南洋募捐，支援抗日。1942 年又去美国，宣传抗击纳粹的侵略。因受麦卡锡反动势力迫害，于 1954 年秋回国。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进步，演技高超的电影演员，她的悲惨的命运却令人扼腕。

事情本来很简单，只起因于 30 年代为争演话剧《赛金花》中的女主角。《赛金花》是留学日本的著名左翼作家夏衍所创作，他选中了漂亮年轻的王莹饰演主角。这大大刺激了当时一个艺名蓝萍（后来的江青）的女演员。蓝萍为了争到这个角色施出种种手段，为此，与王莹结怨。江青一直耿耿于怀，1967 年，她以“莫须有”罪名陷王莹于囹圄。1974 年，王莹死于狱中。直至 1976 年“四人帮”倒台后，王莹的冤案才得以昭雪。自此，每逢清明节，王莹的爱人谢和赓都要到埋葬王莹的地方去凭吊悼念，寄托哀思。与众不同的是王莹的墓地既无碑又无墓，四周只是荒冢一堆草。而在王莹家中则有一块刻有王莹生卒年及一首小诗的墓碑，那是在 1983 年王莹生日那一天镌刻的。

碑文全文如下：

王莹同志之墓

一九一五——一九七四

摘支野山桃花给王姨

严冬刚刚过去，
鸟雀在树上欢鸣。
走近狼见沟的小径，
就想着我们的阿姨王莹。

摘支野山桃花，
送给她呀，
向她先报香山的早春
她总是那样亲切欢喜我们呵，
我们也有一颗爱她的赤心。

香山小学五位学生赠于一九八三年春

谢和赓　谢振群
向思赓　赵清阁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立

遗嘱碑

包公名拯，字希仁，谥号“孝肃”，北宋人，官至监察御史，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以清廉刚正而闻名于世。他一生所为，与名、字、谥号相符：“拯”，救助义。如《孟子·梁惠王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希仁”，企慕仁爱，向往仁政。“孝肃”，孝敬忠肃。包公一生所为，刚直不阿，严于律己。临终前还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嘱：“后世子孙任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七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从这份遗嘱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清官廉吏的高风亮节。这份遗嘱刻在一块高八尺有余的石碑上，现存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公园。

包拯于公元 1062 年去世，享年 63 岁。他死后，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例如，在河南省开封市包公祠里有一块石碑。石碑上虽然有开封府历届府尹的名字，但那上面只有“包拯”二字被摸出了一片很深的亮光光的凹痕。这是人心向背的体现，这是民意好恶的标志。

从年代上讲，包公的遗嘱碑，还远不及三国东吴名将吕岱的遗嘱碑。吕岱（公元 160－256 年）字定公，如皋人。初任郡县小吏，建安十六年任昭信中郎将。后因平定内乱，开拓南疆，“功超廉颇”，晋升为镇南将军，与陆逊齐名。东汉末，曹操强令滨江郡县徙民，海陵县遂为隙地。赤乌四年（公元 241 年）吕岱奏请获准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泽被桑梓”。吴主孙亮即位后，封其为大司马，时年 92 岁。吕岱廉洁奉公，担任交州刺史时，年余未能瞻顾家用，妻儿饥乏。孙权察知后加赐钱米布绢。太平元年

(公元256年)病故前立遗嘱:“父之功绩非子孙荣耀门第之本,嘱后辈素衣疏巾,廉洁为旨,善做益事,廉洁为最。”

吕岱葬于高阳荡(今如皋林梓镇北),文革期间民工挑扩通扬运河,曾挖掘一悬棺墓,棺木虽腐朽,仍悬于冢中。发现此碑,方知是古人吕岱。无知愚蠢的造反派,将其碑作为“四旧”而破。

遗嘱碑在我国并不多见,因为遗嘱往往关系到财产隐私,家庭纠纷,不便铭刻于石碑。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光明磊落、干出轰轰烈烈一番事业的人物墓碑。因此,遗嘱碑的碑型、碑文刻字,都显得庄严肃穆,端正不阿。

豫让碑

在山西省太原市南边有一座“豫让桥”，桥旁有一所“豫让祠”，祠里有一块“豫让碑”。

豫让，何许人也？豫让，战国时期晋国人，是当时著名的刺客。起初，他投靠范中行氏，未被重用。后来，他又成为晋卿智瑶（智伯）的家臣，智伯对他十分看重，甚见尊宠。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453年晋国大夫赵襄子打败了智伯，并将智伯的头颅骨漆上漆，当作“饮器”。智伯一死，豫让即逃入深山野林之中。为报主人知遇之恩，他临走时发下“士为知己者死”的誓言，决心以死来报答智伯。为此，豫让曾两次谋杀赵襄子。他先是改变姓名，充作一名刑人，暗携匕首，准备于宫厕中行刺赵襄子。因赵襄子防备严密，急切中不得下手，这一次暗杀未遂。为达到替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竟“漆身为癞，吞炭使哑”，暗伏于太原市南面的“赤桥”下面。由于赵襄子的马临桥而惊，使得豫让的这次行刺又未能成功。赵襄子手下的卫士一拥而上，豫让束手就擒。豫让被捕后，视死如归，他非但不屈膝求饶，反而一心只求速死。不过，他却向赵襄子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意料不到的要求：“请击君之衣，今虽死而无怨。”同样出人意料之外，赵襄子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赵襄子从身上脱下一件外衣，扔在豫让的脚下，于是，豫让跳着用剑“三击其衣”，嘴里并大声地喊：“我今可以报智伯于地下矣！”遂自刎而死。

豫让死后，人们对他的忠心评价颇高，将今太原市南面的那座“赤桥”更名为“豫让桥”。当地人又称之为“国士桥”。豫让碑上的碑文除介绍了豫让，其人杀身成仁经过外，还有历朝历代

对他的颂诗。晚唐时，诗人胡曾来此凭吊，睹物抒怀，写下了著名的“豫让桥”诗：“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年国士心。”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王锡九也曾在诗中感叹道：“生逢知己身何惜？死为酬恩泪不消。”豫让也可谓不朽矣！

记错碑

将自己的错误镌刻在石碑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更何况是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如此。

乾隆皇帝名弘历，是雍正皇帝胤禛的第四子，生于公元 1711 年，卒于公元 1799 年，享年 88 岁。弘历 24 岁即位，84 岁时退位。退位时，身体状况良好，本可继续做皇帝，但因为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玄烨在位 61 年，弘历不愿打破祖父保持的纪录，所以做了 60 年后就颐养天年了。乾隆皇帝长寿与他性格的乐观豁达分不开。

乾隆皇帝的这一性格特征从碑石中可见端倪。

在山东省曲阜古泮池旁边有两块乾隆皇帝亲手书写的碑。其中一块为“检讨”碑，又名《古泮池证疑》碑，立于公元 1762 年。碑文是：“甚矣，读书之忌粗浅浮过，不沉潜深造，博综详考，执一为是。譬为禾者，卤莽耕而卤莽获！确乎其弗可也”。碑下方是一首诗：“此地非常地，新城即故城。馆仍今日驻，池是故时清”。乾隆为何有如此感慨？原来，六年前，即公元 1756 年，乾隆曾来到曲阜泮池。泮池，古时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乾隆当时认为，泮池以及旧城的地址不确，就在诗中指出了这个问题：“千年古柏城头绿，过雨春花水面红。十里东郊旧鲁城，新池安得泮池名”。诗成，刻于碑上，立于泮池之畔。后来，乾隆发现自己说错了，对此，他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真心悔过，就又写下了一首诗，并在诗前还加上了一段深有体会的“检讨”，依然将这些刻于碑上，立在第一块碑的旁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曲阜泮池双碑。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实在难能可贵。

最近，韩国正在汉江之畔建造一座奇特的记错碑，材料是用刚倒塌的圣水大桥上的钢架，碑上将刻上32名罹难者的名字。用汉城市长的话说："这个纪念碑不仅是为了悼念亡灵，而且是为了促使当局在今后防止建造不合标准的建筑"。

记罪碑

一般地说，碑文主要是用于纪念死者的功绩。“树碑”是为了“立传”，这几乎已成定例。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即碑文不是记“功”，而是记“罪”。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太群卢奂善治世，对违法者，就将其罪行刻于碑上，然后立于他的门前，既告时人，又戒后者。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里也有一块记罪碑，记的是1928年少数寺僧、乡绅将广胜寺后殿四壁400平方米的元代壁画走私卖给美国文物贩子的事。

这里再详细记述我国古代三块著名的记罪碑：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刻的《元祐党籍碑》，清光绪年间的《杨乃武冤案碑》，及民国初年的《兴安碑》。

《元祐党籍碑》记的是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事件。神宗时，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司马光等纷起反对。公元1085年，神宗死，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次年，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排除新党。直到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为相，重行新法，并贬斥以刘挚、梁焘为首的北方官僚集团“朔党”、以苏轼、苏辙为首的四川帮“蜀党”、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时司马光早已去世（为相仅8个月即病死），也未能免遭厄运，赠谥亦被追夺。因公元1086年至1093年为哲宗元祐年间，故称这一政治风波为“元祐党争”。至宋徽宗时，竟将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309人列为奸党，刻碑记罪。此碑先由宋徽宗赵佶书，刻石置于文德殿门的东壁。后奸相蔡京又自书，并颁布命令，要各州、军

立石，这一政治案时间不长，宫内外碑仅立一年即全部推倒销毁。但不知何因，百年以后，此碑文又在边陲地区广西问世，并保留至今。一碑在桂林龙隐岩间，为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戊午梁律刊，吉州饶祖尧跋；一碑在融安真仙岩内，为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沈晞刻跋。前者因年代久远，石已剥落，加之人为地铲划，损字较多，碑文漫漶。唯有后者，保存完好，确是研究“元祐党籍”的珍贵史料。

杨乃武的冤案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讲的是浙江省余杭县举人杨乃武被人诬告与青年妇女“小白菜”有奸情，并毒死其丈夫葛小大的事情。杨乃武与“小白菜”被收狱问罪，判以死刑。后数经周折，直上诉至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冤案方得以昭雪。此事从清同治十二年始，至光绪二年结束，历时达三年之久。事后，与这件冤案有牵连的100余名官吏被丢官革职。光绪皇帝并命将其姓名刻于石碑上，以儆效尤。碑石现存于浙江余杭县县衙旧址内。此冤案为清代四大奇案之首。正如周恩来给曲艺演员魏喜奎的信中所言：他喜欢这个戏，并非因为故事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因为这件事中没有一个清官，冤案都翻过来了，这大概是“奇”的关键所在。

《兴安碑》在广西省兴安县回贤祠内，此碑高2米，宽1米有余。碑上刻有这样的文字：“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落款为“民国五年冬月阖邑公立。”此碑记载的是兴安县知事吕德慎的“劣绩”。据史料记载，吕德慎上任兴安知事后，多苛捐杂税，鱼肉老百姓，引起公愤。于是，兴安县的群众趁当时广西的土皇帝陆荣廷由广西去湖南路经兴安之机，告了吕德慎一状。陆荣廷为了笼络民心，就撤掉了吕德慎的职务。紧接着，兴安县的百姓就立了这样一块“记罪碑”。

浙江省椒江市有块近代记罪碑。1938年，汪精卫、陈璧君一对大汉奸降日，为虎作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愤怒的群众于是制作了这对狗男女的跪像：汪精卫像上身裸露，背刻

“汪逆精卫”四个魏体字，下身穿裤，脚穿皮鞋。陈璧君像也是上身裸露，背刻“陈逆璧君”四字，下穿裙，跣足。二人均背绑绳索，像旁竖《汪逆夫妇跪像志碑》，揭露了他们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

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内，有座现代记罪碑。此碑立于1988年12月22日，立碑者为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本战犯。碑文用中日两国文字书写，内容如下：

“我们在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我们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我们‘恨罪不恨人’的革新人道主义待遇，我们开始恢复了人的良心，真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处死刑，全部释放回国了。

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时，在这里建碑，表示我们对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刻下为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的誓言。

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

这座碑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自1931年到1945年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侵略者”自己“记罪”，从心里表示“服罪”，同时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碑。

国外也有类似的记“罪”碑。如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上的达雅克族人就有将说谎者的姓名刻于石碑上的习俗。我国和印尼同属东方，所以，记“罪”的方式相同，均以直露为主，一览无余。而西方的记“罪”碑则显得较为含蓄。美国有个传奇式的人物，名叫杰西·詹姆士，他的碑文是这样的：“杰西·威·詹姆士，死于1881年4月3日，享年34岁零6个月又28天。他被一个胆小的背叛者所杀，此人的姓名不值一提。”此碑不提背叛者的姓名，

只记录背叛的罪恶。在原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席勒广场上也有一块奇特的记罪碑。它是由四块同等大小的长方形大理石组成：三块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还有一块就斜躺在这三角形上。碑上虽不刻一字，但它生动地记载了德国法西斯匪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生灵涂炭，惨遭杀戮。碑石时刻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场人类浩劫，千万不能让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在奥地利的布劳瑙纳粹独裁者希特勒出生的房屋前，也有一块记罪碑。碑文是："和平、自由、民主——永远不再实行法西斯主义。数以百万死者的忠告。"这块碑是用茅特毫森集中营里的一块石头制作而成，这是对希特勒的血的控诉和无情的诅咒！

虚假碑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人们一直在嘲笑那个自作聪明的大笨蛋张三。但是，殊不知在生活中，象张三这样的人还真存在呢！据盛弘之的《荆州记》记载，冠军县（今河南省邓县西北）东面有一座墓，墓主是魏国的大将军张詹。墓前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这样几句话：“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意思是说：我张詹躺的棺材是很普通的，穿的衣服也很容易腐朽，我的坟墓里没有铜铁等金属殉葬，连瓦器也没有，所以，我希望后人不要掘我的墓。张詹的“此地无银”之计还真瞒过了不少人。直至 200 年后，即到了南朝宋元嘉六年（公元 429 年），由于兵荒马乱，加上自然灾害，饥民流离失所，生活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饥民们就不管它碑文说的什么了，挖开了张詹的坟墓。一打开棺盖，呈现在饥民们眼前的是一堆色彩“斓然”的宝物：有金光闪闪的金银首饰，有漆得鲜红的诸多器皿，有精美的雕刻物品。饥民们一抢而空，棺材内一片狼藉，尸体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大概是张詹生前未曾预料到的吧。

其实，象张詹这样的小聪明把戏，连堂堂的汉文帝也曾玩过。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 157 年）病逝后，葬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灞陵。据碑文记载，文帝“体仁尚俭，克己为君”，有个廉洁的好名声。他临终前还指令：“置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为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 315 年）灞陵被盗。盗墓者发现里面“金玉灿烂”，藏着许多珍宝。可见，汉文帝的“皆以瓦器”，实为掩人耳目之词，抑或他的继承人违背了

他的心愿吧。

在碑文上弄虚作假的，还有唐朝女皇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促成武则天登上帝位。武则天在废中宗李显前，暗中授意武承嗣做点手脚。于是，武承嗣就偷偷地派人在一块石碑上凿了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并将字漆成朱红色，然后让雍州人唐同泰敬献给武则天，说这块碑石是从洛水中得到，是“天授圣母”。工于心计、惯于玩阴谋诡计的武则天借此机会做足了文章：她赐洛水为“永昌水”，洛神为“显圣候”，加封自己为“圣母神皇”、并顺承“天意”，轻而易举地废除了中宗李显的皇位，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明朝政治家刘基，字伯温，也是玩弄这种手腕的老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在南京东郊“明孝陵”，这块陵地是刘伯温选中的。当时那里埋的是东晋高僧宝志和尚。刘伯温鼓起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认为此地“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是块风水宝地。并且宝志葬得不深，未伤龙脉，只要将其迁至灵谷寺就行了。朱元璋听了，果然依准。在迁葬时，掘得一块石碑，上书“宝志葬，刘基开，洪武用”九个隶体大字。这碑便是刘伯温事先派人埋下的，刘伯温以此来取悦于朱元璋。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碑名不符实，原因不是由竖碑者的主观因素造成。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上有一座碑，据说是大陆首座影视明星碑。碑高 18 米，造价 75 万元，准备在碑上留下 1993 年首届银海金龙奖十大影视明星的手印。十大影视明星于 1993 年 11 月 24 日在广州隆重揭晓。申军谊、巩俐、吕丽萍、刘晓庆、张丰毅、李羚、李雪健、陈道明、姜文、葛优共 10 人获此殊荣。但是，在“明星碑”剪彩时，竟没有一个获奖明星参加。原因是：有位女明星认为她没得金奖，“干嘛到海陵岛给手印捧场啊！”吕丽萍、陈道明说“有事”，申军谊、李雪健告假，巩俐、葛优说片约在身……据报道，来到海陵岛参加“明星碑”剪彩的只是田华、赵子岳、凌元几位老艺术家。

大千世界是个离奇的人间舞台。从古至今，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事，有的以假乱真，狂想变成现实；有的以真造假，虚晃一枪，达到某种目的。这类事反映到碑石上，便增加了趣味性。虚假碑的作者造碑为了蒙混世人，而想不到千古不朽的石碑是真与假之别的见证。一旦真相大白，曝光人间，必然成了笑料。

墨　碑

江苏省江宁县东山牧龙亭有一块世所罕见的石碑。此碑通身漆黑，故世称“墨碑”。这块碑是为了“纪念”宋朝大奸相秦桧的。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早年曾拜做过宰相奸计多端的汪伯彦为师，学到了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据说，他小时候就以汪的话为“座右铭”：“不能留芳百世，亦要遗臭万年”。当时，北宋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北方的女真族建立了金王朝后，连年向北宋发动了掠夺性的进攻，并于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攻破汴京（开封）。金兵大肆勒索搜括之后，于第二年撤兵北去，同时带走了包括徽宗、钦宗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北宋的统治到此结束。史书上称这次事件为“靖康之祸”或“靖康之难”。此时秦桧已任御史中丞，也在俘虏之列。到了金朝疆土后，他摇身一变，开始走上了一条卖国求荣的肮脏道路。在北地，他频频向金朝统治者献计献策，替金人权衡利弊得失。到了金太宗天令八年（公元 1130 年），秦桧秉承主子的旨意南归，死心塌地地充当金王朝内奸。他先是骗取了南宋统治者宋高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即右相，为二宰相之一），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接着，公元 1141 年（绍兴十一年），又指使人诬告陷害著名的抗金将领岳飞谋反，逮捕了岳飞父子等人，并代表南宋王朝与金人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宋朝向金朝称臣，“世之子孙，谨守臣节”；（2）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半给金朝；（3）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绍兴和议》。《和

议》签定后，他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卑鄙地杀害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

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公元 1155 年）病死。死后遭到世人的唾骂。人们把秦桧夫妇二人铸成铁像，跪在杭州西湖畔栖霞岭下的岳王坟前。这反映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无比敬仰，对乱世奸臣的切齿痛恨。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两个墨碑的故事。一是，有一次，墨碑不见了，不多久，西湖的水变得又黑又臭。原来是秦桧的后人偷偷地将墨碑扔进了西湖。等到人们将墨碑打捞上来，西湖才又恢复了“水光潋滟”的真正面目。一是，秦桧死后，南宋大将孟洪曾率军路过他的墓地。孟洪故意在这里驻军，并命将士将粪溺撒于墨碑上。于是，人们又叫秦桧的墓为“秽冢”。秦桧真正地实现了他的“诺言”，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耻辱碑

树碑立传，本是为了歌功颂德。但南宋原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的崖山石刻，却适得其反。

南宋赵昺祥兴二年（公元 1279 年），早已投降了元人的张弘范为虎作伥，甘为元军先锋，率领数千艘战船，将此时已迁至广东新会崖山的南宋小朝廷团团围住。两军在南海海面上展开了激烈的决战，终因寡不敌众，南宋军队大败。丞相陆秀夫在驱使妻子儿女投海自尽后，背着年仅 9 岁的小皇帝从数丈高的楼船上，奋身跃下了滚滚的波涛。接着，杨太妃及万余将士也纷纷跳海自尽。就这样，绵延 152 年（公元 1127—1279 年）的南宋王朝从此灭亡了。

张弘范灭了南宋王朝，为了炫耀他的“丰功伟绩”，竟叫人在崖山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 个大字。后人对张弘范的这一无耻行径，无不义愤填膺，但又不知怎么处理张弘范的这块“树功碑”。直到明朝，才有人想了个绝妙的办法。这个人是大儒陈献章。他在碑前仔细地端详，认真地推敲，最后决定在张弘范的“树功碑”顶端再加上个“宋”字。这样，整个碑文就变成了 13 个字：“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加上这个“宋”字，真可谓力鼎千钧。它活生生地勾划出了张弘范的叛徒嘴脸，辛辣地讽刺了他出卖灵魂的丑行，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奇　珍　篇

改革感恩碑

陕西省陇县入城口公路右侧竖着一块青色花岗岩大石碑。碑正上方赫然刻着苍劲有力的五个大字：改革感恩碑。碑高约 1.5 米，宽约 50 厘米。碑头上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碑的背面刻着竖碑人家庭经济的变化和自己的愿望。碑的正面是八句七言诗："三中全会好政策，顺乎民心合民意。沿着此路朝前走，富国富民富自己。改革十年有功绩，我家变化是实例。十年刻碑九百九，第一千块颂改革。"

刻碑人是陇县神泉村石匠，叫张真管，今年 47 岁。他虽有一副凿石刻字的好手艺，但在不堪回头的"文革"年月里，只能偷着干石匠活养家糊口，最后手艺还是被当着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家庭生活因此陷入绝境。没办法，他只有把亲生的一儿一女送人收养。改革的春风给张石匠带来希望。1979 年，他重新操起凿石刻碑的营生。十多年来，他在县境内外辛勤地刻着里程碑、标志碑、文物保护碑、各种纪念碑等。家庭光景逐渐好了起来，送人收养的儿女又回到了身边，一家六口人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现在，张石匠从租别人的旧房到自己盖起了楼房，从铁锤、钢钎凿石到添置起破石机、拖拉机，事业越搞越兴旺。

当张石匠准备凿刻第一千块石碑时，他反复思量十年来农村和他家的巨大变化，不由思绪万千。一天晚上，他找来妻子儿女一起商量，最后全家决定，这第一千块石碑就刻自家十年的经历，刻自己的心里话，并给这块石块起名为《改革感恩碑》。几天后，全家老小就抬着这块石碑竖在了县城公路的旁边。

碑后刻文为：

立碑人张真管，陇县神泉村人。现年四十二岁。本人十九岁就从事石工技艺，现已二十余年。十年前，做柱顶石、房沿石、桥涵石、路基石，不计其数，为此不仅挨批受气，还拉了千余元帐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自创失传多年的石刻工艺，十年中，制作各种墓碑、纪念碑，刻碑文，已经近千幢。经济上翻了身，并受到市、县有关部门嘉奖。十年前后两对照，深感现在政策好。没有十年改革，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希望乡亲们和子孙后代记住十年改革的功绩，沿着三中全会的路线走下去，人民一定能富裕，国家一家能治好。

无字碑

“无字碑”因为“无字”，后人颇感兴趣。这里记述的几块无字碑的背后，都有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

闻名全国的苏州玄妙观里有一块明代的“无字碑”。碑高 6.4 米，宽 3.4 米。此碑原立于明朝洪武年间，碑文作者是明代大文学家方孝孺。公元 1402 年，燕王朱棣打败了侄儿惠帝朱允炆，夺得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史称“明成祖”。朱棣想利用方孝孺的影响笼络人心，便命他草拟“即位诏”。谁知，方孝孺不忘旧主，拒不从命。当朱棣命人将纸笔硬塞到方孝孺手中时，他大声斥责道：“要杀便杀，诏不草。”朱棣火了，怒道：“我怎能让你轻易死去？就算不怕死，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方孝孺坚决地回答：“便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着，他拿起笔来写下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并赋绝命诗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仰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朱棣无可奈何，就下了毒手，命将方孝孺凌迟处死。处死前，刽子手因怕方孝孺骂出更难听的话，就先将他嘴巴切开。方孝孺死后，朱棣把方孝孺的九族连同他的门生、朋友一起抓来，凑成十族，一齐处斩。冤死者达 813 人。方孝孺生前所撰的碑文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立即被铲除一净。玄妙观里的石碑仅是其中的一块。所以，这块石碑虽无字，却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实物。

北京昌平县北 10 公里天寿山南麓是明十三陵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下，是十三陵的首陵，规模十分宏大。在长陵附近有两口“井”。西边那口“井”的旁边竖着一块

“无字碑”。碑上为什么没有刻上文字？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极其悲惨的历史。明太祖朱元璋恢复人殉制度。据史载，太祖孝陵葬嫔妃 40 余人。明成祖朱棣死后，长陵殉葬嫔妃 16 人。今长陵旁的两口“井”，原来就是当年嫔妃们殉葬的地方。殉葬的情景是令人惨不忍睹的。据《李朝实录》载：殉者先要赴宴，此时，往往食不下咽，而哭声震天，然后被迫站在小木床上，脖子上套上绳索，被活活吊死。宣宗殉葬的 10 个妃子中，有一个叫郭爱的，入宫才 20 天，就被迫去殉葬。临死前，她写了一首凄婉感人的绝命辞：“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知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关于明代嫔妃从葬的记载，明《太常续考》一书记载甚详。因殉葬的墓坑直上直下，没有隧道，所以后人称之为“井”。（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载：“其曰井者，盖不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尔。”）明朝的人殉制度，自太祖、成祖，至孝宗、武宗、仁宗、宣宗，一直到明英宗时才被废除。《昌平山水记》曰：“自英宗既止宫人从葬，于是妃墓始名。”而在英宗之前那些死去的嫔妃就无名了，也就是无坟墓无碑文了。由此，我们可知在长陵两井旁边的那块无字碑，正是为了纪念那些殉葬的“无名”嫔妃。

在安徽省凤阳县中都皇陵里也有一块“无字碑”。凤阳是朱元璋的发祥地。朱元璋称帝后第二年，即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下诏：以凤阳为中都，并为其父母营建皇陵。朱元璋父朱世珍，母陈氏，原籍泗州（今江苏泗洪县），元末徙居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家境赤贫，田无寸垄。公元 1344 年，淮泗地区瘟疫流行，不到 20 天，朱元璋父母相继死去。其父终年 64 岁，母终年 59 岁。朱元璋因家贫不能棺殓，与其兄抬着双亲尸体草葬于山莽。并且，朱元璋父母的尸体是由于同村刘继祖赐给了一块土地才得以安葬的。所以朱元璋做皇帝后，曾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据《高皇帝御制文集·追赠义惠侯刘继祖诰》曰：“朕昔寒微，生者为衣食

之苦，其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吁！艰哉。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也，乐葬皇考、妣，于是至今难忘。”这件事，朱元璋以后多次谈及。朱元璋在《赐署令汪文、刘英敕》中云：“朕本农夫，家贫丧父母，身当动冲，百无所措，幸邻人汪姓者保护之；无地可葬，幸邻人刘姓者惠此葬地，以安神灵。”朱元璋为其父母修的陵墓高大雄伟。据《中都志》载，陵园有皇城、砖城、土城三座，其中皇城高 2 丈，周长 75.65 丈；砖城高 2 丈，周长 3 公里；土城周长 14 公里。皇城豪华侈丽的规制，既继承了汉唐两朝的传统，又开创了明清时代的风格，皇陵前有两块墓碑，均高 7 米、宽 2 米，气势十分壮观。其一处有碑文，碑文原是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写的，但写成后，朱元璋感到不够满意，于是亲自撰文。文中，朱元璋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文字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浓烈。虽然如此，朱元璋还觉得言未犹尽，所以干脆立了一块“无字碑”，以寓意祖辈功德无量，难以用言辞表达。

武则天的“无字碑”知道的人就较多了。武则天，名曌，出身于木材商人家庭，9 岁丧父，14 岁被李世民选入宫中为“才人”，赐号“武媚”。唐太宗死后，根据唐代制度，先帝嫔妃均削发为尼，武则天也出家“感业寺”。公元 654 年，高宗将她召进宫中，封为“昭仪”，次年册封为皇后。从此，她开始了参决朝政的政治生涯。人称高宗、武后为“二圣”。泰山现存有两块同样尺寸的条石，上下共束于同一碑首、碑座，人称“鸳鸯碑”，以此借喻武则天位齐高宗，帝、后并立，共治天下。公元 683 年，高宗死，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第二年，她亲自登基称帝，称号为“圣神皇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并改“唐”为“周”。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武则天病死，享年 82 岁。武则天统治时间长达 50 年。这一段时间，正是唐朝政治、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全国户主增加将近一倍。武则天临终前遗诏要求：“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希望回到李家来当先妣。她还认为：

“己之功过，由后人来评述。”现竖立于乾陵的“无字碑”，正是按照武则天的这一遗嘱建造的。“无字碑”高 6.3 米，宽 2.1 米，碑侧线雕云龙纹，碑头刻 8 条龙纹。现在无字碑上的文字，那是金代以后后人在上面的题记。

现存苏州北寺塔里的一块“无字碑”高 3.1 米，宽 1.5 米，上刻立体式浮雕画像。内容是元末割据势力、周政权建立者张士诚（公元 1321—1367 年）设宴招待元使伯颜的场面。这块碑立于元代，是当时江南富豪沈万山为张士诚立的一块记功碑。此碑有画无字，原因据说是张士诚在公元 1354 年称王时，令一文人写匾。张士诚本贩盐出身，是一介武夫，脾气乖戾，他对“张”字首笔“弓”的写法十分不满，就气势汹汹地将那文人轰了出去。由于这个缘故，从此也就无人敢在张士诚面前写字了。

山东曲阜也有一块巨大的“无字碑”，碑高 16.95 米，宽 3.75 米，厚 1.14 米，重达 250 吨，碑顶还刻有二龙戏珠浮雕。这块碑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建的，因金兵南侵，所以未能完工。它原本伏卧于草丛中，俗称“万人愁”，意即纵有万人之力，亦难将其竖起。直至 1991 年孔子文化节前，才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将此巨碑巍然高矗。至于无字的原因，大概是因金兵来犯，仓猝间未能撰刻的缘故。

闻名中外的泰山极顶——玉皇顶大门下，也有一块“无字碑”，碑高 6 米，宽 1.2 米，厚 0.9 米，形制古朴，呈米黄色。关于这块“无字碑”，历史上争论不少。有人认为是秦始皇东巡时留下的。明朝王士性《广志绎》云：泰山“碑石则秦无字碑最古。”有人还认为这块碑无字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关。例如明朝王在晋有诗云：“东海长流万未枯，山石爱室隐元符。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清朝乾隆皇帝也持此说：“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但是，一查史料，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数次东巡，但只是第一次登上泰山，即“二十八年（公

元前 219 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而秦始皇焚书是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事：“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于藏《诗》、《书》、百家语者，……杂烧之。所不见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所以，这块碑无字的原因当与“焚书坑儒”无关。并且“焚书坑儒”后所立的秦碑也同样有刻文字的。三十八年（公元前 209 年）秦始皇病死后，“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第二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在巡行途中，“丞相臣斯、御史大夫臣德昧死字：‘臣请具刻诏书于石。’这就是我们今天可在泰山岱庙见到的《诏书碑》。该碑高近 5 尺，由李斯篆书，有 2 万余字。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泰山顶上的无字碑决非秦碑，至多为汉朝时所立。至于碑上为何无字？亦可推断，这块碑不是开国皇帝所立。这可从《泰山志·阮氏封泰山论》中找到答案：“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当刻石纪事也。”也就是说，不是开国皇帝到泰山上封禅时，只能立石，不可刻字。自秦始皇、秦二世后，到泰山封禅的皇帝很多。但其中像汉武帝、魏明帝、唐玄宗、宋真宗、明成祖等皇帝，如要在泰山上立碑是可以的，却没有资格在碑上撰刻文字。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泰山顶上的这块“无字碑”最早年代当可定在汉武帝时。

“无字碑”，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南朝鲜已发现了两块。一块在汉城附近亲畿道坡州郡积城北面。一块在忠清北道镇川邑莲谷里，人们称之为“白碑”。什么原因无字？南朝鲜有的学者认为，这两块“无字碑”，大概是新罗时期所立，是唐朝的习俗流传过去的结果。而当时道教盛行，根据道教教义，有形之字不能表达天朝功德。也有学者认为是佛教教义使然，和尚是“空手来，空手去”，所以碑上不刻一字。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看来这两块“无字碑”无字之谜将一时难以破解。

书法碑

我国石碑之所以名扬海内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精湛的书法艺术。

现藏故宫博物馆，被康有为称之“中国第一古物”的石鼓文，自唐朝贞观初年在陕西宝鸡附近的陈仓发现以来，历代学者皆视为瑰宝。唐朝的韩愈、韦应物，宋朝的沈括、苏轼直至近代的段玉裁、郭沫若等，对石鼓文均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对石鼓的制作年代及石鼓诗文的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现由当代学者李铁华在其专著《石鼓新响》中一一释疑。原来，石鼓十诗是记秦文公四年，由西垂公东猎初至汧渭之会到文公四十八年周恒王初立和文公孙新立太子时，邀集诸侯宴乐天子这一期间的重要事件，开创了中国叙事史诗的先河。石鼓为祭奠文公而制作的，安置的时间应为秦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 716 年。书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称为“大篆”。有人认为是周宣王史官籀所书，故又称“籀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可作为中国文字的母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主，创制小篆体。古文籀文以及战国时六国异体文字一概被废弃，小篆成为全国划一的文字。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出巡时，在重要地方如峄山、琅琊等地共刻七石，字体均为小篆。

小篆虽在文字形体的改革上有进步意义，但圆形字体，书写仍不便。程邈摆脱了小篆的拘束，创制隶书体，改圆形为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的《五凤刻石》是隶书定形的例证。“五凤”是汉宣帝刘询的年号，此石刻于公元前 56

年，是我国著名的西汉石刻。其他著名的汉碑还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等。

图 2　梁鹤鹤铭（局部）

三国时钟繇（与王羲之齐名，后人并称为钟王）学曹喜的篆书，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书，集东汉书法的精华，创楷书法。汉字从此定型。现存楷书碑中最早者，为江苏省句容县所珍藏的《葛府君碑额》，共 12 个楷体字："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葛府君即三国时的葛祚。另外，在云南省曲靖县第一中学内，有一块《爨宝子碑》，东晋大亨四年（公元 405 年）刻。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尉爨府君之碑"这两块碑字均为楷书，但均合隶意，古拙中见凝重，是隶书过渡到楷书的典型实物。楷书至南北朝时基本定型。浙江绍兴出土的南齐永明八年（公元 493 年）刻的《吕超墓志》即为一例。范鼎卿对此碑评价颇高："存留数字，明秀浑穆，固当时书法之正宗，而为后世端楷所祖。"唐朝的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现传世最多，声名最响。现存西安碑林的《多

宝塔感应碑》，颜真卿书，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刻，字体端正平稳，学颜书者不可不学此碑。柳公权书的《神策军碑》，精练苍劲，是现传柳公权书中最佳者，也是学习楷书的极好摹本。还有江苏镇江的摩崖楷书石刻《瘗鹤铭》，字有拳头大小。宋朝黄庭坚曾赞曰："大字无过瘗鹤铭。"据考证，此铭为南朝齐梁时代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所书。

从汉隶脱胎而出的，除楷书外，还有魏碑体。"魏碑"为书体名，元魏（北魏、东魏、西魏）碑碣、墓志、摩崖等刻石上的文字，又称"魏体"，以方正凝重、朴拙奇崛的骨力见长。"魏碑"中珍品是《张猛龙碑》，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字体特点为方笔，横画线长，结体紧密中富有变化，笔法刚劲有力，遒健雄奇。杨守敬赞《张猛龙碑》"整练方折，而碑阴则流宕奇特"，"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日本书法界称《张猛龙碑》为"魏碑的登峰造极者"。

隋朝以前刻碑多为篆、隶、正楷、魏碑，而始于汉朝的草书、行书未见于碑，大概是由石碑庄严凝重的特点决定的。至唐朝，唐太宗喜书法，才见有行书刻于碑者。最著名的唐颜真卿的《争座位稿》，此碑现存西安碑林。碑文字体正雅，圆劲苍古，与王羲之的《兰亭序》并称为"行书双璧"。碑文草书者极为罕见。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昇仙太子碑》是一块极有名的草书碑。

宋徽宗创"瘦金书"，其书特点为"瘦劲峭拔，秀美飘逸"。现存西安碑林的《大观圣作碑》刻于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赵佶撰文并书。该碑字体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下收尾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但有人说，宋徽宗的"瘦金体"是摹仿唐朝著名书法家薛曜的。在河南登封石淙山南崖，有薛曜书《秋日宴石淙序》。据杨守敬《平碑记》云："薛曜书法瘦劲奇伟，郭兰石谓'为宋徽宗瘦金之祖'，良是。"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因纸寿不过千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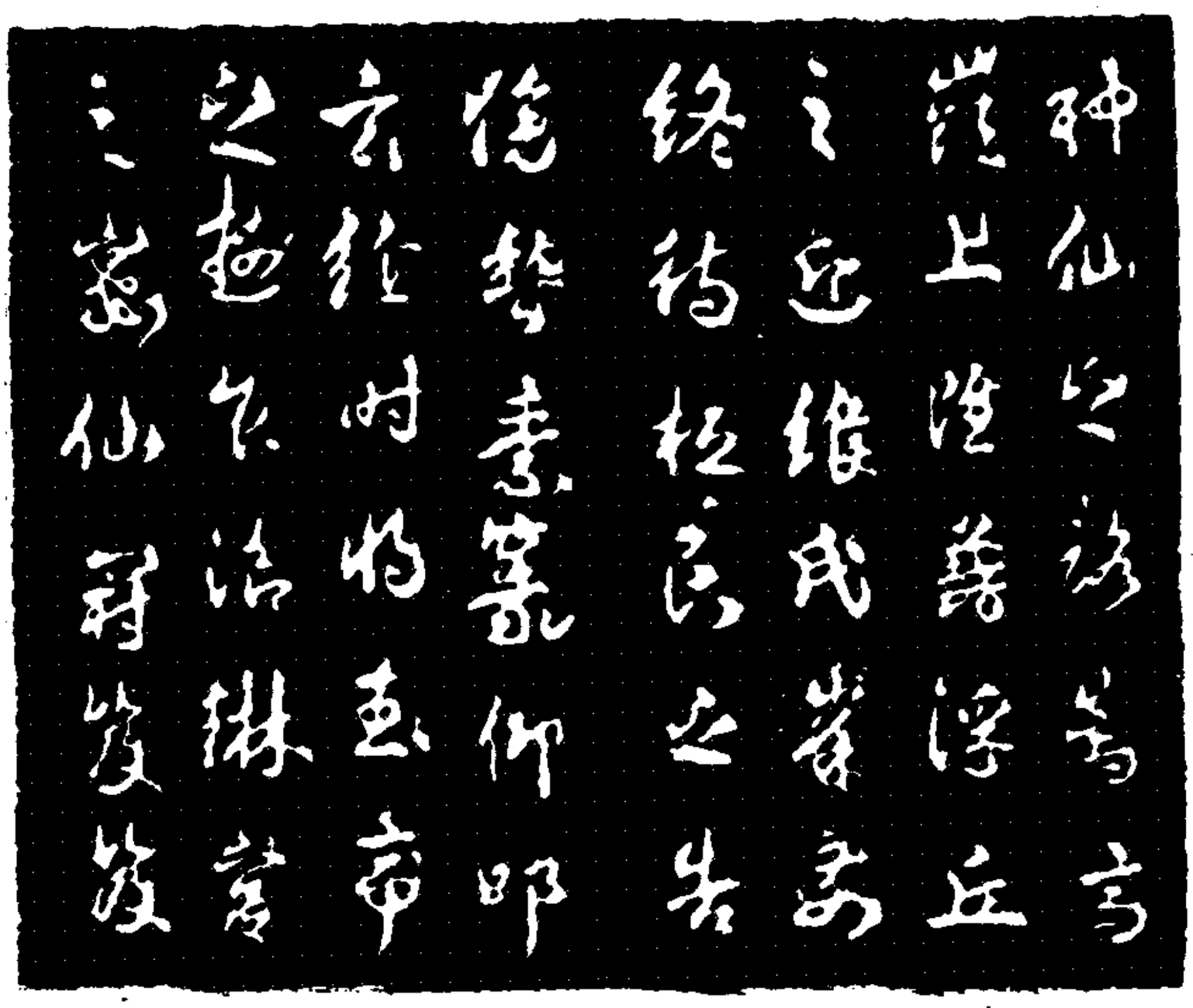


图 3　武则天书迹《升仙太子碑》

以，碑刻是大宗。朱光潜先生对我国书法名碑曾有个独特的评价："我国的书法艺术，发扬光大于尔今，全靠碑石这种不受虫害鼠蚀，不让风毁雨褪的硕大工具。可以这样武断地说，没有碑石就没有书法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光彩夺目的今日文化。"

证史碑

证史、补史，是我国古代碑石的一大功用。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很重视对碑石的研究，因为碑石上所刻文字往往是可靠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具体的说，证史碑功能有四：

能填补空白。比如导游图，有人认为是近代的产物，有人认为是进口货。其实，我国古已有之，有杭州城外白塔桥上一块诗碑为证。碑上刻的是一首七绝："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诗中所说的"地经"即当时的《朝京里程图》，类似今日的导游图。"临安"即今杭州。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在此建都。也就是说我国在南宋时就有导游图了。这张导游图是以临安为中心，把南京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示得非常清楚。据文献记载，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杭州时，也在白塔岭买到过此图。

能释疑解难。南宋诗人刘克庄编的《千家诗》里有一首《答钟弱翁》诗："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署名"牧童"。"牧童"是谁呢？多年来一直是个谜。最近有人在广西宜山县城南龙隐洞里发现了石刻斗大的草书字碑，原来是南宋嘉定七年（公元1198年）冬宜山太守张自明的僚属方信孺的一首纪游诗："南山山北北山南，一洞中分路口三。孤鹤叫立声自远，懒龙惺雨睡方酣。襄公淡墨留苍壁，太守高风拂翠岚。百尺岩前清绝地，道人先我著茅庵。"再查《宜山县志》，"牧童"之谜顿有答案：龙隐洞"东畔石镌余襄公、方信孺墨迹。余靖诗'草铺横野六七里……'。原来，"牧童"即"襄

公”或“余襄公”余靖也。余靖（公元1000—1064年），原名希古，字安道，死后谥“襄”，世称“余襄公”。北宋广东人，曾三次出使契丹。

能判别正误。我国历史上一些有名人物的情况，碑文记载与民间流传大相迥异，如宋朝杨家将里的杨宗保，人们一直以为是个男的。但河南省新安县五头乡童沟村南坡上《杨令公停灵碑》却有此说：“此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入道而为观焉。”花木兰姓花吗？河北省定县城东约一公里处有《木兰祠碑》。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公元1341—1368年）年间，碑文云：“木兰姓魏，名木栾”，并说木兰生于西汉初年，亳地人（河南）。木栾父名魏应，汉文帝年间，匈奴南侵，为抵抗匈奴，木栾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战死后谥孝烈。定县系木栾当年戍守之地。河南省虞城县南35公里周庄村有一块《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碑》，也是元人立，碑文记载与《木兰祠碑》有一些不同之处：“隋木兰魏氏，亳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北方有可汗多事，朝廷募兵，策书十二卷，且坐以名，代父戍，历十二年，除尚书不受，欲纳宫中，死拒之，赠将军，谥孝烈。”两碑内容虽有较大出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花木兰不是姓花，而是姓魏。

碑石的功能还在于能旁证确论。如对一些宗教，有的因史料欠缺，罕为人知；有的因语焉不详而含混不清。如在碑石文字中下一点探幽索微的功夫，不少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西安碑林中有块唐朝《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在我国流行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云：“唐建中二年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利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另外，据朱剑心《金石学》称：“释氏之教（佛教），虽东汉即入震旦，精蓝象设，六朝始盛。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流立碑之始，《嵩显寺》诸碑为梵刹立碑之始”；河南开封犹太寺内有块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立的碑，上述“原教（犹太教，又名挑筋教）自汉时入居中国”；福建莆田市涵江镇还掘得一元代

摩尼教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块摩尼教碑。摩尼教，也称“明教”，由公元二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六、七世纪时传入我国。后不知何因，不知何时，突然消声匿迹。这块摩尼教碑呈不规则形，最长 74 厘米，最宽 53 厘米，上刻“清静光明，大力智慧，至上至尊，摩尼光佛”16 字；四川简阳县有《〇七于公三教道场碑》，刻于唐大历六年（公元 771 年），据清王昶《金石萃编》云：“文内叙三教，先佛，次道，次宣圣，盖三教之目肇于此矣”。通过上述碑文，我们对基督教、佛教、犹太教、摩尼教、道教、儒教等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些碑石弥补了史书之不足，成为我国宝贵的资料库。

奇字碑

苏州吴县东山葑山寺里现在还保存一块清朝乾隆皇帝题的“𠕋二”碑；杭州西湖的湖心岛上原有块宋朝的“𠕋二”碑，不知何时毁了；山东泰山石壁上也有块“𠕋二”碑，……并且，细细一推敲，凡是出现“𠕋二”碑的地方，往往风景秀丽，景物怡人。原来，这“𠕋二”乃脱胎于“風月”二字。“風月”无边，即成“𠕋二”。“風月”本指清风明月，形容美好的景色。如果景色美到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地步，就是“風月无边”。

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里有块刻于清朝嘉庆年代的“文魁”像碑，作者是回族人像画家玫琦。其实，这“文魁”像是用孔子的“正心修身、克己复礼”8个字组成的：“正”——文魁的额、眼、鼻；“心”——文魁的嘴；“修”——文魁的左手和腰，“身”——文魁的右脚；“克”——文魁的右手；“己”——文魁的耳；“复”——文魁的腰带结；“礼”——文魁的左脚。这种用文字来构成一幅画像的怪碑，在中国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也罕见。

“史晨”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两面刻，通常一面称《史晨前碑》，一面称《史晨后碑》。史晨是当时的鲁相。《前碑》记史晨要求祭祀孔子的奏本，《后碑》记祭祀孔子的盛况及祭祀后修治孔子遗迹的功绩。据杨守敬《平碑记》云：“碑下一层字嵌置趺眼，向来拓本难于句读，自乾隆己酉（公元1789年）何梦华将眼凿开，以此全文遂显。”“字嵌置趺眼”，不知是无意还是人为？但不管怎样，何梦华的贡献功不可没。

我国还有一块奇字碑，其内容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干禄

字书碑》。干禄，求福的意思。《诗·大雅·旱麓》："岂弟（恺悌、悦乐）君子，干禄岂弟。"由此可见，古代对祈福禳灾一直比较看重。这块碑将日常求福的文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定为正、通、俗三体。完成这项有意义工作的，是唐朝语言学家颜元孙。唐大历九年（公元774年），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用楷书抄写，并刻石置于浙江湖州墨妙亭。原碑已佚，现存的《干禄字书碑》是宋宝祐年间（公元1253—1258年）陈兰孙临摹而成的。因此，从书法角度此碑是无多大意义的，但是，它在语音学、文字学方面，还是颇有价值的。

西安碑林里还有块刻于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偏旁字原碑》。释梦英书，内容为依刊定说文目录540字。这在我国也许是唯一的一块。

在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西南侧，有一块闻名遐迩、流传千古的名碑——曹娥碑。曹娥（公元129—143年），东汉上虞人，母亲早亡，父女俩相依为命。其父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曹盱在舜江上迎潮神活动中"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当时曹娥仅14岁，她"沿江号哭，""哀吟泽畔"，17天后仍不见父尸，便投江而死。曹娥的孝行传遍乡里，乡人感其孝德，特地为她营墓立碑，并改"舜江"为"曹娥江"。曹娥碑共立过三次。第一次是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令度尚将曹娥的孝迹上报朝廷表为孝女，并命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邯郸淳"年少有异才"，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辞之妙令众人叹服。汉兴平三年（公元195年），蔡文姬之父蔡邕闻讯，千里迢迢特来观碑。因时值黄昏，蔡邕以手摸碑文读之，阅后索笔书"黄绢幼妇外孙齑臼"8个字于碑阴。据《三国演义》记载，汉建安二十三年魏王曹操问起这8个字的意思，主簿杨修解释说："'黄绢'者，色之丝也。'色'旁加'丝'为'絶'字；'幼妇'者，少女也。'女'旁加'少'为'妙'字；'外孙'者，女儿之子也。'女'旁加'子'为'好'字；'齑臼'者，受五辛之器也。'受'旁加

‘辛’为‘舜’（辞）字。”至此，人们才知道，“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是蔡邕赞誉曹娥碑文“绝妙好辞”的一个隐语。这是历史上的第一块曹娥碑。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中有“江之道南有曹娥碑”的记载，这就说明这块曹娥碑在南北朝尚存。但从唐人刘长卿《无锡东郭送友人游越》中“碑缺曹娥宅”之句，以及唐人赵嘏《题曹娥庙》中“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等记载看，这块闻名天下的曹娥碑在唐代就已丢失了。晋开平二年（公元 358 年）书圣王羲之到曹娥庙用小楷书曹娥碑文，后由新安吴茂光将小楷碑文刻于石碑存放庙中。唐朝韩愈在文边题字，僧怀素又草书其中。这是第二块曹娥碑。但是，不知何因，这块历代视为珍宝的晋碑也早已不见，现只有拓本传世。现在我们可见到的曹娥碑，是宋元祐八年（公元 1093 年）由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根据旧时碑文重新书写的。此碑高 2.3 米，宽 1.4 米，行文 18 行，每行 30 字，字体为行书，文笔生动流畅。

唐朝大诗人李白来浙江上虞曹娥庙时曾留下一首千古绝唱：“人从月边去，舟从空中行。此中人延伫，入剡寻五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娟语。”诗写得飘逸空灵，意境深远。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如去寻访这一古迹，不是也可从中吸收到一些有价值的营养吗？

诗　碑

将诗刻于石碑上最早是哪个朝代？现有资料表明，最早刻于石上的是在北魏时期，最早刻于碑上的是在唐朝女皇武则天时。

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西峰有块摩崖石刻，高3尺2寸，宽5尺，楷书12行，字径约4寸，因首行题“诗五言，登云峰山观海童，郑道昭作”，可知此为北魏时刻。郑道昭，北魏时著名书法家，作品传世不多。这首五言诗，是郑道昭自咏自书，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清朝书法家叶昌炽认为，以诗题刻于石，怪哉妙哉！

但摩崖石刻与单立的一块碑有别。现见最早将诗刻于一块石碑上，当为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刻的《天后御制诗书碑》。唐高宗永淳二年二月，武则天随高宗去河南嵩山少林寺。游兴颇浓的武则天即兴吟诗作序，并命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王知敬抄写。武则天不仅把自己的诗刻于石碑，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她在临汝温汤设宴招待大臣们，席间酒酣之际，还命群臣作诗，这些诗后刻于碑。这就是有名的《流杯亭侍宴诗碑》。武则天是位敢作敢为的女政治家，敢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也算是一首诗的话，武则天的《天后御制诗书碑》又谈不上“之最”了。江苏省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那里有块《歌风碑》，高1.7米，宽1.23米，由东汉大文学家蔡邕手书。碑文即《大风歌》歌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古人常云：“诗言志”。吟诗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宋朝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满江红》词就曾多次被人刻于碑，以传后世，激励人心。在岳飞的故乡河南省汤阴县岳庙里就有一块这样的诗

碑。此碑刻于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 1458 年）。全文如下：

满　江　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日，生王熙书。

关于岳飞的《满江红》词，许多人都会背诵。对明朝文人文征明慨叹岳飞遭遇的《满江红》，熟悉者就不多了。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旁有一块碑上刻着文征明的一首《满江红》：

满　江　红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仗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古人以诗抒怀，今人亦常如此。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的《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要足论。”诗歌高度赞扬了刘、杨二烈士的献身精神。1917 年秋，青年周恩来由天津赴日本留学时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诗，现已刻碑立于日本的京都。

我国散见于各地的诗碑很多。江苏省常熟市北麓有个兴福寺，因寺前山岗崖断石裂，岩谷奇秀，故又名“破山寺”。寺内东院珍藏着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手书唐朝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苏州寒山寺里有宋、明、清三代名人书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1987 年冬，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又以豪放凝重的笔墨，谨严老练的章法，将张继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书于碑，填补了现代空白。

有的诗碑还蕴含着一些趣闻轶事。晚唐岭南诗人廖有方一生写过好多诗，但流传在世的也只有一首：“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这首词写于公元 815 年，廖有方长安考试落第后，在宝鸡一客栈里听到一同命运人因病呻吟，不禁顿生同“病”相怜之情。后此人病死。廖有方无钱买棺木，就将自己乘坐的马卖给了村里的一个富豪，才安葬了这个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廖有方触景生情，悲从中来，就写下了上面这首诗，并将这首诗刻碑立于死者的墓前。也许是好心有好报，多年赶考均名落孙山的廖有方竟在这件事的第二年考中了进士。

“丘八”碑

“丘八”诗为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所创。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冯将军性格爽直，生活朴素，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有伟大的爱国情操，这些高尚的品德从冯玉祥将军所写的“丘八”诗中可略见一斑。

冯玉祥的“丘八”诗在当时脍炙人口，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冯玉祥反对内战，蒋介石就夺其兵权，逼他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去美国。1946年8月31日，即冯玉祥出国前夕，上海全国文艺协会在红棉酒家设宴招待他。出席的有郭沫若等100多位文化界人士。席间，应诸人要求，冯玉祥当场赋“丘八”诗一首：“冯玉祥，退了伍，到各处，说和平民主。看我好朋友，已经作了古。手抚着木棺，热泪流如注。回想前九年，战败失国土。此次又回来，觉得颜面全无。父老对不起，姐妹对不住。今天文化界，朋友欢送吾。能说什么话？觉得真痛苦，可查中外和今古。几句丘八诗，不知有何补？”诗中，作者怀着满腔激情，既有对往事的回顾，又有对文化界的期望，同时又表达了自己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诗句浅显明白，朗朗上口。

冯玉祥将军1946年出国考察，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轮船失火，伤重身亡。他的尸体现葬于山东泰山。墓前，有一冯将军的头像，大理石碑上刻着他的自题诗：“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自题诗，也是一首“丘八”诗。这首诗采民歌和打油诗之所长，词

多粗俗俚语，运用白描手法，虽不合格律，但诙谐有趣，朴实自然。正如周恩来1941年11月11日祝贺冯玉祥60寿辰时所说："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确实，这首自题诗犹如一条巨谷深沟，表面平静无波，沟底里却奔涌着一股激流。这种风格与冯玉祥的性格是吻合的，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文如其人。"

由于冯先生的诗以"丘八"而著名，所以凡他的诗碑，人们习惯统称为"丘八碑"。

对话碑

在石碑上刻人物对话，在我国还是不多见的。因为对话这一形式较为灵活，而碑文一般是严肃凝重的。现在介绍两则石碑上的对话。

一块是南宋庆元三年（公元 1197 年）在江西省上饶出土的唐碑上。这是一位妻子替丈夫写的墓志铭："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人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夫，其死也夫，苟达此理，哀复何言。'"

从元朝开始，碑文采用白话的现象也渐渐多起来，内容有圣旨、懿旨、令旨等丰富的元代历史资料，统称为"元代白话碑"。当然这种"白话"属古代白话，与现代白话还有很大差别。但这些元代白话碑里均无"对话"形式。在"白话碑"里保存有对话形式的一块碑在孔府里，它记载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与当时的"衍圣公"的对话。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马上要孔子的第 55 代孙、"衍圣公"孔克坚前来朝见。因朱元璋是造反称帝，所以孔克坚假托有病，派儿子孔希学前去朝见。朱元璋非常恼火，于是写诏给孔克坚说："我虽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接到诏书，诚惶诚恐，如坐针毡，惊慌中日夜兼程，急忙赶往南京朝拜。

洪武元年 11 月 14 日，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仍然

对其极力笼络。接见时，朱元璋问："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孔克坚回答："臣53岁也。"朱元璋又说："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给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好不好。"同年，朱元璋一次就赐给孔府2000大顷田地（约合60万亩），又拨派115户农民作为孔庙、孔林的洒扫户，同时还给"衍圣公"封官加爵。

洪武六年，朱元璋召见孔希学时，问："尔年几何？"孔希学说："臣三十又九。"又问："今去尔祖孔子历年几何"？孔希学答："近二千年。"朱元璋说："年代虽远，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朱元璋又说："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欤？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内铨注，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也。尔若不读书，违朕意矣。且人年自八岁至弱冠，多昏蒙不开，不肯向学；自弱冠至壮年，有室，血气正盛，百为营营，亦无暇好学；尔年近四十，志虑渐凝定，见识渐老成，正好读圣人之书，亲近明师良友，昼夜讲明道义，必期有成学。学成之后，四方之人知尔之能，俱来执经问难，且曰此无愧孔氏子孙者，岂不美欤！然四体之动乃德之符，步履进退亦必用安详，不可欹斜飞舞，久久习孰，遂为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尔，尔其自择，还家亦以此教子孙可也。勉之哉！勉之哉！"从此开始，"衍圣公"不兼地方官，爵阶相称，专主孔子祀事。

这些对话均刻在石碑上。本文中的标点符号是笔者加的。从这块"对话碑"可以看出，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要借用孔子思想这根精神支柱。而将对话刻于碑石，也是明代碑石文化的一大创举。难怪有人戏称"对话碑"是"小说碑"，因为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人物的形象、个性和特点，还有情节的推进。

三绝碑

绝，《辞海》解释为“极，最，独特”。三绝碑，即碑中的三个内容与一般碑不同，颇为独特。

唐宋时三绝碑最多，这主要与唐、宋帝王重视书画蔚然成风有关。四川成都南郊武侯祠内有一块一丈多高的“诸葛亮祠堂碑”，此碑刻于公元809年，碑文为唐朝名相裴度所撰。行书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所写。刻碑者为当时有名的石匠鲁建。名相、名家、名匠，此为“三绝”。

湖南祁阳浯溪的绝壁上有一块“文奇、字奇、石奇”的三绝碑。此碑名“大唐中兴碑”，由元结文，颜真卿书。此碑是平息了安史叛乱之后刻的。元结，字次山，唐朝文学家，因组织义军抗击叛将史思明而立有战功。由于亲自经历了平叛战争，所以文章写得颇为感人，加之颜真卿的厚重雄劲、气势开张的“颜体”楷书，难怪宋朝大文学家黄庭坚要柱着拐杖细读这篇碑文。颜真卿不仅楷书写得厚重雄劲，而且行、草书亦刚劲利索，遒劲多姿。南京钟山和苏州玄妙观里有两块画像碑，碑上的文字均由颜真卿所书，即是这种风格。碑上画像，均由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绘的是长眉长须、额头硕大的太上老君像。除书绝、画像绝之外，南京的画像碑由大诗人李白题赞，苏州的画像碑由唐玄宗李隆基题赞，这也算得上是一绝。

广西柳州柳侯祠内有一块宋朝刻的荔枝碑也为三绝：“韩诗苏书柳事碑”。即颂的是柳宗元轶事，韩愈吟的诗，由苏东坡书写。湖南郴州苏仙岭上也有北宋刻的三绝碑，由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词，大文学家苏轼跋，大书法家米芾书。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

年）刻的“狄梁公碑”也可称为三绝碑。狄梁公即为唐朝大政治家狄仁杰。此碑由范仲淹撰，黄庭坚写。明朝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中云：“昔人谓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

外国也有“三绝碑”。美国哈佛大学校园内有一块哈佛纪念碑，上为雕像，下为碑文：“创始人约翰·哈佛，1638年。”此碑的“三绝”为：一、雕像并非哈佛其人。因雕塑家没能找到一幅清晰的哈佛画像来作参考，故造了一位年龄相当、仪表端正的绅士画像来充数。二、哈佛并非是哈佛大学的创始人，而只是该校早年殷实的赞助人。因哈佛于1638年把自己的图书馆和半数家产捐赠给该校，所以就“抬举”他为创始人。三、碑的一侧刻着哈佛大学校徽图案，上面刻着“诚实”二字，说了“谎”还称之为诚实，这大概也可谓“绝”。

三绝碑的产生，乃是文人相亲的表现。不过画、诗、刻文都是一代名人，确实不易。一是要有缘相会，二是要共同求趣，三是要个性相近。即使不是同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创作，亦要三者之间情趣相投，有一定的情谊和缘份，还要有共同的艺术观方能将他们的作品连接在一方石碑之上。

一字碑

一字碑即在碑上只刻一字。如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内有一块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一笔写成的“鹅”字碑，此碑已昭名天下。一字碑中，刻得最多的字大概是“寿”字，其次要数“佛”字。

希望长寿富贵，这是每个人的心愿。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寿比南山”的祝福语。那么，南山在何处呢？寿与南山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在山东省益都县云门山顶峰上有一个红色的“寿”字。笔锋若龙跃天门，气势雄伟，异常壮观。字很大，字首直指云端，字脚踏在壁底，真可谓：山有一“寿”字，“寿”是一座山。因云门山在县城的南面，故又俗称南山。这就是“寿比南山”一词的来历。此“寿”字出自明朝嘉靖年间衡王府管家周全的手笔，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石刻“寿”字。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属于摩崖石刻，算不得碑。另外，江西省九江市三国时周瑜点将台故址——烟水亭内也有一块长 1 米，宽 0.5 米一笔写成的“寿”字碑。此碑刻于唐咸通年间，为当时浔阳（九江）县令吕洞宾所写。福建省福州市鼓山也有一块宋朝大理学家朱熹题刻的丈二“寿”字碑。山东青州云门山有块高 7.5 米，宽 3.7 米的“寿”字碑。清朝的慈禧太后一生喜写“寿”字，每逢她高兴之时，即手书一笔“寿”字送人，因而传世不少。山东曲阜孔府内宫衙二门旁就有一块慈禧手书的“寿”字碑。

只写一个“佛”字的碑也不少，厦门南普陀寺后面有一块清朝“佛”字碑。四川省潼南县大佛寺左侧也有个高 9 米、宽 5 米的“佛”字碑。但这还算不得中国之最。中国最大的石刻“佛”字在福建省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附近。这个字高 11 米，宽 9 米，最

粗笔划达 1.4 米。当然，这个“佛”字也属摩崖石刻。

不过，现代有些人创作的一字碑，已发展成两字或多字碑，所谓“一”，是指一笔呵成而已。

“碑上一个字，碑外磨十年。”有些书法家一生写的字难以计数，遗留后代的仅仅只有一个字。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但“一字值千金”，这种一字碑带给观赏者多么宽广的想象空间和终生难忘的艺术享受。所以，一字碑颇为中外古今游客喜闻乐见，也为祖国河山增添了无限的诗情和画意。

集字碑

在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块奇特而珍贵的碑。该碑刻于唐咸亨三年（公元 672 年），因碑首刻有七佛像，所以叫《七佛圣教序》碑，记载的是唐朝初年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事。

玄奘（公元 602—664 年），姓陈名祎，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 岁出家，21 岁受具足戒，研习《涅槃经》等各种经论。因在研究过程中发觉对经义的解释不统一，分歧颇大，所以他曾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求法。但不知何因，未获批准。公元 629 年，河南一带发生大饥荒。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方准许老百姓自求生路，玄奘才得以从长安出发，出敦煌，经新疆、中亚诸地，抵达中印度的摩揭陀王城，入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拜名僧戒贤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等多种佛家经典著作，并遍游印度四方数十国。公元 645 年，玄奘返归长安，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此后 20 年里，玄奘专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经卷，共译成大小乘经论 75 部，计 1335 卷。唐太宗亲自为之撰写了序言，皇太子作记。唐太宗的序，皇太子的记，再加上太宗答敕，皇太子戕答和玄奘所译《心经》，五者同刻于一石——这就是著名的《七佛圣教序》碑文的全部内容。

其实，《七佛圣教序》碑的奇特而珍贵，倒不仅仅在于有唐太宗的序、皇太子的记、玄奘的《心经》等，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块碑的文字全是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

聪明的读者对此会产生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生于公元 321 年，379 年去世。即王羲之生活在这块碑刻成之前 300 年左右的东晋时期，他怎么会替 300 年后的唐朝书写

碑文呢？原来这全是唐朝和尚怀仁的功劳！他花费了 20 余年的时间，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而成。所以，这块碑又叫做《集字圣教序》碑。碑高 9 尺 4 寸 6，宽 4 尺 2 寸 4，行书，30 行，每行 80 多字，共计 2000 多字。要收集这么多的“王体字”，可见怀仁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王羲之的真迹，不要说现在，就是 1000 多年前的唐朝，也是不易多得的。所以，此碑一出，极受当时士林重视，对书体的发展影响颇大。清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亦称赞道：“唐朝怀仁集《圣教序》，古雅有渊致。”

自怀仁开创“集字”一格后，后人纷纷仿效。在唐朝，就有著名诗人贾岛的弟弟无可和尚集柳公权字，而成《寂照和上碑》（唐大和三年刻，现存陕西咸阳）；唐朝大雅和尚的《吴文碑》（又叫兴福寺半截碑，现也存西安碑林），也是集的王羲之的行书，更可与怀仁媲美。二人所集，真可谓均具特色，各有千秋。安世凤《墨林快事》称：“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俨如生动，不比怀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谭之趣而已，是以书家重之。”刘熙载也在《艺概》中作如此说：“唐人善集右军（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故后人又称之为王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有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则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制《王羲之传》曰：‘势如斜而反正。’观此，乃益有味其言。”由此可见，大雅和尚的成就当不在怀仁之下呢。

自唐开创集字一格后，宋、元时期亦有人乐此不彼。宋朝大文学家苏轼曾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字，而成《集归去来辞诗碑》（现存陕西西安）；在河南安阳城外北 12 里武官屯有一块《许熙载神道碑》，刻于元至元四年（公元 1338 年），是元朝书法家茅绍之集当时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此碑刻时，赵孟頫已去世 16 年，碑文虽非赵孟頫亲书于石，但由于文字工整、遒健，不少人还误认为是赵孟頫亲笔呢。

图　碑

在碑石上可刻各式各样的图。

有“天文图”。江苏灌云县大伊山有块50平方米的星象石，上面刻有200多个圆窝窝——表示太阳、银河系、星斗等，有人考证为2000多年前商朝作品。山东肥城孝堂山有一块东汉时的星象图石。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里有块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的敦煌星图。图上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绘出1350多颗星。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元瓘墓及其次妃吴汉月墓里有两幅用笔工整的石刻星象图，它绘有二十八宿和拱极星（如勾陈、北斗）等部分星宿，星座位置准确，星象刻画逼真。另外，就是闻名海内外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此图高2.16米，宽1.06米，上半为一圆形全天星图，下半部为说明文字。这幅星图由南宋宁宗时代黄裳所绘，公元1247年王致远所刻。星图直径约91.5厘米，它以天北极为圆心，刻画三个同心圆，外圆直径85厘米，是南天星斗可见的界线；中圆是天球赤道，直径为52.5厘米；永不下落的星辰用直径为19.9厘米的小圆界开。黄道与赤道斜交，并按二十八宿彼此间的距离从天极引出宽窄不等的径线。外圈又绘有二同心圆，两圈间交叉密注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12辰、12次和州、国分野等各12个名称。全图共有1400多颗星星。碑下部镌有2091个不到1厘米的译文，内容是叙述天体、地球、北极、南极、赤道、白道、日月星辰及日月食的成因。这一碑文，是一篇古代介绍天文知识的科普文章。

有“地形图”。在苏州博物馆内有一块绘有明朝时苏州平面的《平江图碑》。

有“世系图”。山东曲阜孟母林内，有元代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立的“亚圣”45世孙孟宁之墓碑。亚圣即孟子。此碑碑阴刻的“世系之图”，记载了孟子后世繁衍的情况。

有“建筑图”。浙江绍兴有“兰亭图”碑。兰亭位于浙江绍兴西南14公里的兰渚山下，晋代已是著名风景区。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绍兴）兰亭“修禊”。他们临流赋诗，各抒情怀。大书法家王羲之为之作序并书，其书法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所以，兰亭之名日隆。兰亭图碑有数块，最有名的为明周宪王（朱有燉）所刻，图中题名人之诗，具前后之序。

有“数学图”。这主要见于外国数学家墓碑。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有“数学之神”的美称。因他在《论球和柱体》一书中宣称：“以球的大圆为底，以球的直径为高的圆柱体，其体积为球的体积的$\frac{3}{2}$，其全面积为球表面的$\frac{3}{2}$。”因此，在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一个“圆柱容球图”。

古希腊最后一位数学家刁番都（公元246—330年）的墓碑上刻的是一道数学题：“过路的人，这儿埋葬着刁番都，请计算一下，便可知他一生经过多少寒暑。他一生的$\frac{1}{6}$是幸福的童年，$\frac{1}{12}$是无忧无虑的少年，再过$\frac{1}{7}$的年程，他长了胡须，其后建立了幸福的家庭。5年后儿子出生。不料儿子竟先在父4年而终，年龄不过父亲终年的一半。晚年丧子，老人真可怜，但他在数学研究中寻找慰藉。请你算一算，刁番都活到几岁才和死神见面？”这道数学题是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frac{x}{6}+\frac{x}{12}+\frac{x}{7}+5+\frac{x}{2}+4=x$，答案是84岁。

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范·冠勒恩（公元1540—1611年）一生钻研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35位，为当时的世界纪录。因此，他的墓碑上刻的是圆周率图。人们称为“鲁道夫数”，这个数为：π

=3. 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瑞士数学家雅各·贝努里（公元 1654—1705 年）的墓碑上刻的对数螺线。旁边还刻了一句话：“虽然改变了，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对数螺线是贝努里一生最得意的研究成果。

德国数学家高斯（公元 1777—1855 年）一生酷爱数学。据说一次他在思考一道数学难题时，仆人通知他夫人病重，他嘴里连声答应：“马上就去，”可就是坐着不动。当仆人急忙来报“夫人快要断气了，”他却盯着仆人的脸，平静地说：“你去告诉她，请她再等一会儿！”由于高斯如此入迷，数学研究成果举世瞩目，被人们誉为“数学王子”。高斯墓碑上刻的一个正 17 边形。这是高斯 19 岁时，用直尺和圆规作出来的，解了数学界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一个谜。

有句读的碑

我国石碑上的碑文一般是不加句读的，这是因为古代文字通常没有句读的缘故。但也有特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的两块石碑上就有句读：一块是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城西南 5 公里处的中都皇陵内的凤阳皇陵碑，一块是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北面板仓村里的中山王徐达碑。

凤阳中都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朱元璋称帝后第二年，就在他父母坟墓上兴建皇陵，洪武十年（公元 1377 年）竣工，历时 10 年。据《明实录》载：洪武二年时，朱元璋就诏令立皇陵碑。碑高 7 米，宽 2 米，螭首龟趺，气势壮观。碑文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写。但碑文写成后，朱元璋不够满意，认为"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子孙戒"，于是亲自撰文。朱元璋在碑文中，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以及参加起义军、东渡大江、建立明王朝的峥嵘历程，文字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浓烈，是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献。由于朱元璋本是文盲，做皇帝时，才粗通文墨，所以，为断句方便计，他在碑文中使用了句读——小圆圈。

中山王徐达的神道碑碑文也是朱元璋亲自撰写，明朝开国功臣中受此殊荣的，仅此一人。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农家出身。元末随朱元璋参加起义，英勇善战，封为大将军。在北上灭元，南下平定张士诚等战争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朝建立后，又连年出兵，横扫蒙古残余势力，军功显赫，死后追封中山王。朱元璋曾称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与凤阳皇陵

碑相同，中山王徐达碑中也有句读。

我国古代标点的历史可上溯到秦朝。在挖掘到的秦代量器铜质半斗量——两诏铜椭量上有标点“∠”，称为“勾识”。至汉朝，汉简里也有“勾”，还出现了“句读”。“读”读如“逗”，故又称“句投”“句度”。“句”，用在“文辞语意已尽之处”；“读”，用在“意未尽而须停顿之处”。“句读”的位置是“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这种“句读”的好处是“开卷了然，于学者方便”。由此可见，在文章中加句读并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专利”。但是，在碑上刻句读，却是朱元璋首创。

现代碑继承了古代石碑的传统，也是“文不加点”。对现代碑是否加标点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均持肯定态度。郭沫若也曾将标点比作人的五官。因此，在刻碑文时加上标点，对现代人来说，一定颇受欢迎！

化石碑

南京乌龙潭公园有块石碑，碑中斜横着一块几厘米长的白色的化石，很象一段竹笋，公园据此命名为“笋化石碑”；南京栖霞山栖霞寺山门右侧有块距今1300多年历史的“明征君碑”，上面布满豆粒状白色斑点，有人称之为“梅花碑”；山西永济县有块“栖岩道场舍利塔碑”，石质斑驳，也满是白色小点，当地人俗称“鱼子碑”；等等。

其实，上述这些碑都名不符“实”。它们不是“笋”、“梅花”、“鱼子”，而都是几亿年前海洋里的动植物。

乌龙潭公园的“笋化石”，实际上叫“角石”，是4亿多年前生活在海洋中的鹦鹉螺类的一种。这种鹦鹉螺就是现在乌贼类海洋动物的远亲，属于软体动物门头足纲。具体地说，这类化石叫中华震旦角石，是我国特有的。栖霞山的那块“梅花碑”，“梅花”之多，令人惊诧：100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就有六七十个，整块碑上大约有两万多个。这些“梅花”原是生存在深海里的一种植物，叫海百合茎。这块碑石，据专家考证，应为“二叠系栖霞灰岩”，距今约两亿多年。“鱼子碑”与此差不多。

正如乌龙潭公园化石碑两边的题联所云：“化石万寿天地生，物华天宝宇宙成。”这些原为深海里动、植物的化石碑，历尽沧桑，万劫不灭。碑石与考古学、动植物学相关相联，亦是我国碑石的一大奇观。

雾　碑

在我国的碑林中，最有趣也最神秘的，莫过于山西省灵丘县城东南的“雾碑”了。

“雾碑”是大自然给与碑石艺术的造化，建碑者一定要相当了解地形地势，并且结合当地气候规律，方能构成碑石的传奇。

灵丘县是山西不起眼的小县。离城 15 公里的觉山寺，却依山傍水，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寺内楼台壮丽，殿阁重重。一座八角砖塔，飞檐叠壁，直指云霄。该塔与位于它西南的小石山上砖塔，均为 13 丈高。另外塔下有一深井，深度也是 13 丈。“三齐”为“三奇”。故有“塔井三奇觉山寺”胜景之称。

觉山寺东隅是悬崖峭壁，隔唐河相望，丹崖怪石相竞秀，奇峰绝壁透云霄。每当烟云飘渺，雾气盘旋，便可窥视到一座石碑，巍然矗立在云海之中。高大挺拔的形象，酷似刀砍斧劈。纹路交错的石壁，仿佛刻满了遒劲的文字。而当云雾散尽，丽日当空时，石碑便隐没于崇山峻岭之中了，映入眼帘的依旧是那万丈悬崖，千层峭壁。

雾碑可望不可达。笔者曾向觉山寺主持僧谷一方丈探询。谷一笑曰：“有雾就有碑，无雾却是山，确实神乎！怪乎！其实，雾碑并非海市蜃楼，是宋代一名石匠，带了他的几十名徒弟，进行了为时 8 年的粗加工。石匠便是觉山寺的创始主。雾碑上刻有‘四大皆空’几个字。故几代出家人，都称雾碑为空碑。”

谷一还是“少年和尚”时去那里采过药草。其实近看，并无什么可欣尝。“四大皆空”早已剥落模糊，加之云漫雾腾，颇难辨认。而来去往返，步履艰难，爬山涉岭，满目皆石，所以谷一戏

笑曰："我庙佛主，确是世上罕见的艺术大师。雾中看碑，却有四大皆空之感觉也！"

1984 年日本碑石艺术大师田园先生参观觉山寺时，雄心勃勃要去观赏雾碑。他想动用直升飞机，驾驶员先是谈雾生畏，后来只在"雾碑"上空迴旋了几趟。回寺后，田园先生感慨万端："雾山之神奇，使我领略了四大皆空之真谛。"

动物纪念碑

世界上除了给人竖碑立传外，还有不少地方为动物立碑纪念。

我国为动物立的碑不多。比较有名的一块在江苏省扬州市平山堂里。读其碑文，原来记载的是一对白鹤的动人“爱情”故事：“清光绪十九年，星悟和尚在平山堂鹤池放养白鹤一对。后，雌鹤因足疾而亡，雄鹤见状，昼夜哀鸣，绝粒而死。星悟感其情，葬鹤于此，并立碑，示世之不义、愧斯禽。”江苏镇江也有一块纪念鹤的碑。那就是著名的《瘞鹤铭》。（瘞：埋的意思）。广州虎门越秀山顶镇海楼上也有一块纪念一匹战马的石碑。鸦片战争中，沙角炮台陆军三江协副将陈连升为抗击英军，英勇阵亡。他骑的黄骝马俯首于陈连升的尸体旁，发出阵阵哀鸣。英军见了这匹毛光鲜亮，滚瓜溜圆的战马，就将它掳往了香港。谁知，这匹黄骝马到港后，天天朝着北方嘶叫。据碑文记载：这匹马谁也征服不了它，“近则蹄击，跨则堕摇。”这匹战马不到半年就死了。后人为赞颂它的“节操”，特勒石刻碑。可惜的是，这块石碑已断为数截。另外，江西省南昌市警犬训练基地里也有一块纪念狗的墓碑，上书“坦克之墓”四个字。这是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副主任王更生替一条名叫“坦克”的战功赫赫的警犬而立的。不过，这仅仅是块小小的木碑。

另据清王士祯《陇蜀余闻》云：“成都府署，有吴道子画龟蛇碑。每端午，辄有龟蛇聚碑下至屋瓦庭树皆满。麻城人梅朗中为守，厌之，凿其目，自后遂少。”此碑未加验证，姑妄录之。

在德国柏林市郊的一座狗坟里，埋着一头被载誉史册的军犬，墓碑上用俄文写着“烈犬文尔内之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文尔内”随苏军战士斯达罗一起服役，抗击德国侵略者。有一天，斯达罗带着一个班在临近德国边境的山林里警戒时，突然遭到德军的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博战，斯达罗牺牲在一个德寇的枪口下。“文尔内”见状，嘶嚎着扑向凶手，一口咬下那个德寇的三个指头，并带伤逃回驻地，然后又带着苏军来到烈士身旁，把凶手的三个指头放在烈士的胸前，伏卧在主人的身上，默默地舔着。德国投降后，苏军奉命驻守柏林市区。5 年后的一天，“文尔内”随新主人亚历山大上街。当一个身着便服的德国人从身边走过时，它先是一愣，旋即愤怒地扑过去，死劲地咬着那个人的脖子，任凭亚历山大奋力制止也无法抑住文尔内的狂怒。几分钟后，那个德国人被咬死，“文尔内”也因过度狂怒引起脑溢血，倒在亚历山大脚下，再也没有起来。原来，被咬死的德国人少了三个指头。经多方证实，他正是杀死斯达罗的凶手。

美国人喜欢狗，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这一爱好连一些伟大人物也不例外。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国独立战争之际，每当从波士顿前线视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将那只洁白活泼的“哈里”小狗吻了又吻。他曾对夫人说过：“人世间的战争太残酷了。我想从动物身上寻觅点没有任何观点的情感。这是我最好的休息。”1789 年 4 月，华盛顿宣誓就任联邦政府总统那一天，“哈里”不幸夭亡。华盛顿闻讯后，心情十分沉痛。他命将“哈里”葬在花园里，并在墓前竖起一块大理石碑。碑文是华盛顿自己设计的：5×5×5。这道没有符号的数学题，根据华盛顿夫人的解释，它包含的内容可

图 4　吴道子绘镇宅龟蛇碑

丰富呢："哈里这个小精灵活了5岁，却给我们这个5口之家，解除整整5年痛苦的战争阴影。"如此说来，"5×5×5"的得数确实是不能用具体数字能表达出来的。

还有一个例子。在吴伦斯堡，有位波登先生养了一只名叫"老鼓"的猎犬。有一夜，"老鼓"跑到邻居杭斯贝先生的后院中，不幸被杭斯贝射杀。二位先生本来是好朋友，但为了"老鼓"事件，硬是将官司由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中，参议员弗斯特代表波登先生，向陪审团宣读了一篇千古难得的奇文——《狗的礼赞》。陪审团深受感动，便宣判波登先生胜诉，由杭斯贝先生赔偿损失500美元。由此，弗斯特的演讲词——《狗的礼赞》成了全世界爱狗人的经典，当地人为"老鼓"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狗的礼赞》全文。

给动物建碑纪念，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法国巴黎郊区塞纳河畔的一座动物陵园了。这是法国动物学家哈莫华于1899年建筑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公墓。现在里面共葬有55000多只猫、狗等类的动物。陵园入口处有一用名贵大理石雕成的石碑，造型之精美超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墓碑，这是为了纪念狗烈士"巴利"的。"巴利"是一条救援狗，它曾在阿尔卑斯山里救了40名遇难者，但却被第41名遇难者误杀而死。法国政府授予它"雪山救星"的光荣称号，并在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它救了40人，被第41人杀死了。"陵园里还有一"鸽子"碑。1942年，法国一艘轮船在海上出事，在联络中断的情况下，一只信鸽把这一消息传出，使遇难者获救。人们感激这只鸽子，为它立了一块碑。

为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动物歌功颂德，那是情理中事。然而，巴黎的这座动物陵园中的绝大多数动物并不在此列。现在西方人养动物自娱已成癖好，而当这些"宠物"一旦死去，他们就会感到无比的悲伤。从巴黎的这座动物陵园中的碑文里，我们就可略见一斑。如，有一只猫的碑文是："你的逝去让我茫然若失——爱玛——你是我一生中最亲爱的知己啊！"一头狮子的碑文是：

“你的夭折使我失去了你的庇护，于是我天天只能在颤栗中过日子。”一条狗的碑文是：“这里安葬着迪克，它是我精神上的寄托和忠实的朋友。它的一生是忠诚的典范。它的死使我极度悲伤，我时刻都在怀念它。我后悔：在它活着的时候曾粗暴地对待它。我应该受到加倍的惩罚。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生活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消磨时间。我的确是真心地爱它，这就是我唯一的安慰。”至于称呼死去的动物为“我的好朋友”、“我可爱的小皇帝”、“我的美丽甜蜜的伙伴”等等的碑文就比比皆是了。

除法国外，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替那些对人类带来好处的动物竖碑纪念。1848 年，美国西部犹他州蝗虫成灾，从圣地亚哥的盐湖上飞来千万只海鸥吞吃了蝗虫，当地人就用花岗岩立了一块碑，碑顶上是两只展翅欲飞的海鸥雕像。美国波士顿还有一座“麻雀”纪念碑。因为1860 年以前，美国没有一只麻雀，农作物经常受到虫害。波士顿人从欧州引进了麻雀后，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一伤脑筋的问题。苏联列宁格勒实验医学研究所里有一块“狗”碑，这是应著名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的要求于 1935 年建立的。石碑上镌刻着巴甫洛夫对狗的高度评价：“因长期对人友好、机灵、耐心和驯服，狗能多年乃至终生为实验者效劳。”列宁格勒的高尔基公园里还有一块“骆驼”碑，那是苏联旅行家感谢他们考察中亚细亚时的得力助手——骆驼的。猪是丹麦的主要出口商品，所以在奥尔弗斯市有一青铜碑，上面浇铸了 1 头大母猪和 70 只小猪。奶牛是荷兰的骄傲。荷兰人称奶牛为“我们的妈妈”，他们在弗利斯兰省的列兹瓦尔登市替奶牛也竖了一块碑。澳大利亚的仙人掌繁殖速度极快，已成当地的公害。而有一种飞蛾，偏偏喜食仙人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仙人掌的生长。于是，澳大利亚人为飞蛾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希腊在多德卡尼斯州首府罗德岛港口为“蜈蛇救人”的两只鹿立了一块青铜雕像碑。另外，在日本本州新湾的“天鹅”碑，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鹤”碑，在加拿大北部海滨一条公路干线上的“野雁碑”，

都是当地人民喜爱这类动物而建造的，表达了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还有的动物“因祸得福”，因其有害而被人们竖碑纪念的。例如英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科菲县就有一块“圆英象鼻虫”纪念碑。圆英象鼻虫是一种害虫。1916 年，它将当地的棉花吞噬一尽，人们只好因此而改种花生。谁知，当年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丰收。以后，种花生使该县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县份之一。英国人很富有幽默感，于是，就花了 3000 美元竖了一块碑，还在碑上调皮地刻上了这样一句话：“献给圆英象鼻虫和它的功绩。”

最奇特的动物纪念碑要算“百蛇墓碑”。1882 年，荷兰“司白脱勃”号货轮在北海驶向苏格兰途中，突然撞上了暗礁。幸亏船长机智，使船脱离了礁区，但船右侧底部被撞了一个大洞，海水迅速从洞中涌入，眼看货轮会很快沉没。船长密朗斯比召集全体船员，作出紧急命令，准备弃船逃离。突然，轮机长报告说：“船舱进水停止，我们的货轮不知为什么又能安全行动了。”船长等人火速来到舱里，只见一个长 4 米、宽 2.8 米的裂缝里，绞塞着许多条长蛇，有的长蛇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原来，这是产于北海东北部的一种叫“斯卑”的水蛇，它们头大、体长、尾尖，在海的中底部生活。“斯卑”蛇有一种特性，在栖息时往往是数十条绞合在一起，而且蛇的外体上会分泌出一种水不能溶解的粘液让蛇体临时粘合。当它们分离时，只要用蛇舌舔去粘液，即可化整为零。“司白脱勃”号撞礁遇险之处，正是“斯卑”蛇繁殖、栖息最多的地方，堵洞的蛇是被一个大浪打进来的。近百条“斯卑”蛇将这个大洞堵住了，并粘合在船壳的外壁上，将漏洞堵得严严实实、滴水不进，使“司白脱勃”号奇迹般从沉没的边缘得到了新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船长为了感谢救船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斯卑”蛇，就在苏格兰建了一座“百蛇墓”，竖立了碑石，碑文叙述了海船遇难呈祥的经过。现在这座“百蛇墓”已成为苏格兰的一处旅游名胜景点。

后　记

《碑石探幽》完稿后，最迫切的期望，是能得到碑石行家和读者的指正。

我是学中文的，之所以喜欢上碑，那是10年前就读于南京某高校的时候。一次春游，我们来到了阳山，登上那举世闻名的碑材，俯视山下的如蚁人群，心里不禁油然而生“世界真奇妙”之感。于是，收集、整理世上的名碑、奇碑、怪碑这一念头从此暗藏于心。

之后，与同学程方银结伴而游，探访了金陵城许多人迹罕至的古迹。

之后，广泛浏览名人传记，并将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有关文章剪辑、摘录，最终加工整理成为本书。

在多年的心血即将付梓之际，我深深感谢我的师友们。没有他们，这本书永远只能是我脑海里的一个梦。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陶思炎博士，他自始至终关心、指导着这本书的写作，并为本书选配了一些精采的插图。我的文友徐磐主动向我提供了数则关于碑的有趣的小故事，并参与了部分书稿的修改，饶海蕴、李新民认真抄写、清理了全稿。还有，江苏省管理干部学院的沈利华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的绪论，为本书增色不少，无疑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弥补了我囿于学识而造成的缺陷。

恳望海内外有识之士对本书的错误及疏漏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何松山

1995年9月18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碑石控幽
作者＝何松山
页数＝１７４
ＳＳ号＝１０１７５３８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形制篇
碑型探原
墓志
巨碑
袖珍碑
卧碑
四面碑
双色碑
石刻文字
毁碑
碑林热
现代碑石
风土篇
官箴碑
法典碑
路规碑
水则碑
学规碑
界碑
环保碑
养生碑
告示碑
药方碑
教坊碑
石经碑
计时碑
画像碑
植物碑
戒碑
记灾碑
巨字碑
人物篇
音乐家纪念碑
尊师碑
爱情碑
感恩碑
海外华人碑
异国使节碑
理入地下的墓碑
供奉在家的墓碑
遗嘱碑

豫让碑
记错碑
记罪碑
虚假碑
墨碑
耻辱碑
奇珍篇
改革感恩碑
无字碑
书法碑
证史碑
奇字碑
诗碑
“丘八”碑
对话碑
三绝碑
一字碑
集字碑
图碑
有句读的碑
化石碑
雾碑
动物纪念碑
附录页